

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毛澤東與日軍的絕密合作
中共軍隊是如何壯大的？

毛澤東 勾結日軍的真相 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

◎（日本）遠藤 譽



Mao: The Man Conspired with Japanese Army

by ENDO Homare

Published in 2016 by Mirror Books

©Chinese Copyright by Mirror Books

All right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o. 978-1-63032-817-7

Publisher: Pin Ho

Cover by New Yorker Design Studio

P. O. 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Phone: (516) 338-6976

Web: <http://www.mirrorbooks.com/>

E-mail: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真相》系列 99

書名: 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

——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

作者: (日) 遠藤 譽

出版人: 何頻

責任編輯: 于正曉

校對: 李湘蘭

書籍裝幀: 紐約客設計所

監印: 明鏡出版集團

出版: 明鏡出版社

網址: www.mirrorbooks.com

電子郵件: mirrorbooks@mirrormediagroup.com

mirrorpublishing@yahoo.com

twitter.com/MingJingNews

facebook.com/MingJingNews

意見、稿件聯絡: news@mirrormediagroup.com

訂戶、廣告聯絡: info@mirrormediagroup.com

通訊地址: P.O.Box 795,

Deer Park, NY 11729-0795, USA.

電話: (516) 338-6976

國際統一書號: 978-1-63032-817-7

定價: HK109 NT399

版次: 2016 年

日本新潮社(新潮新書)擁有日文《毛沢東 日本軍と共謀した男》版權

新潮社(新潮新書)授權出版中文版

明鏡出版社出版品受國際版權公約保護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轉載, 複印, 違者必究

本出版品並不代表本社立場
本出版品缺頁或裝釘錯誤, 請寄回更換

目錄

- 9 寫在中文版出版之際
- 13 序言 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 25 第一章 從屈辱中誕生的帝王之術
 - 早年生涯
 - 對革命的覺醒
 - 憎恨知識分子的原點是北京大學
- 43 第二章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
 - 從湖南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 採用寄居蟹戰略成為國民黨幹部
 - 和汪精衛之間的友誼
 - 蔣介石的直覺
 - 蔣介石的苦惱和皇姑屯事件

一山不容三虎——在井岡山的大規模殺害
建立“國中之國”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的紅軍
內心深處對共產國際的憎惡

79 第三章 利用抗日戰爭——西安事變和國共合作

日本軍鴉片政策幫助長征成功
圍繞綁架蔣介石的陰謀
“百分之十對日作戰”
毛澤東是怎樣看待“南京大屠殺”的？

112 第四章 與日本間諜機關“岩井公館”同謀

由中共做出的完全相反的歷史解釋
岩井英一和中共間諜袁殊
“共產黨員也沒關係”
毛澤東的間諜潘漢年
潘漢年為什麼向岩井提交了中共的資料？
潘漢年向日軍提出停戰
提供情報的報酬是多少錢？

150 第五章 與汪精衛政權同謀

在岩井公館鳩占鵲巢的廖承志
支持著汪精衛政權的日本軍人們
被近衛內閣的“南進政策”所救
針對特務機關 76 號的李士群
和汪精衛之間的密約，另一個證言
潘漢年和汪精衛再次會面

178 第六章 與日軍同謀以及政敵王明的手記

和日本陸軍都甲大佐的密約
中共和岡村寧次大將進行接觸
潘漢年被逮捕的經過
與政敵王明之間爭論的記錄
王明對毛澤東的看法
知道真相的人全都被封口

200 第七章 我感謝皇軍——歡迎舊日本軍人的原因

蔣介石太過專注於讓日本軍民回國而落入被動
“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

毛澤東和舊日軍軍官遠藤三郎之間的對談
受夠了左翼的“謝罪”
毛澤東和蔣介石，爭奪岡村前大將
關於對歷史的認識

240 尾聲 毛澤東到底殺害了多少中國人民？

250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日文文獻

寫在中文版出版之際

2015年11月13日，日文版《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由日本新潮新書所出版。第一版在3天後即售罄而再版，在一周後又再次售罄，加印了第三版。加印了第五版的時候，英國BBC中文網駐東京特約記者童倩女士採訪了我，發表了文章《日本學者：中共與日軍共謀對抗國軍》。童倩女士是非常聰明而優秀的記者，而這篇文章獲得了很大的反響，世界各地的不少的華人華僑邀請我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本。

其中最早找到我的是紐約的明鏡出版集團(Mirror Media Group)，於是在敲定出版社之後馬上就開始了翻譯工作。

這本書本來是為了不太了解(也有完全不了解)毛澤東的日本人而寫的，所以從毛澤東的前半生開始書寫。對中文圈的各位讀者來說，前半部分也許並沒有多少新的東西。但是，後半部分，特別是中共間諜如何接到毛澤東的命令而和日方接觸一事，基於日本方面的內部資料給出了許多證據，也許是迄今為止的毛澤東研

究所沒有提到過的角度。

尤其是關於中共間諜潘漢年和袁殊二人的所作所為，筆者從他們所接觸的日本外務省一派、以岩井公館而聞名的岩井英一入手，發掘了稀有的私人著述——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並且在本書中介紹了迄今為止在世界上還沒有被公開過的許多證據。按照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所述，潘漢年不僅為了削弱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的軍力，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國軍情報賣給了日方，而且还向岩井英一提出中共軍和日軍之間“停戰”這一提案。因為岩井英一不太了解日軍內部狀況，才只好把他介紹給梅機關的影佐少將（日本陸軍），並且讓他前往汪精衛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室。

和影佐少將見面後的潘漢年又由影佐介紹和汪精衛見面。而這一連串的事，卻與由中文所書寫的資料大相徑庭。

關於當時的情況，謝幼田先生曾經於 2002 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抗日戰爭真相》這一巨著，而本書則從日方資料對其進行了一些補充。

潘漢年當時也向岩井英一提供了中共方面的情報（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中載有他向岩井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書），值此中文版出版之際，筆者正好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機密情報”中，發現了應該就是這份報告書的資料。這一情報在出版日文版時

沒有來得及查到，所以出版中文版時進行了增補。

在翻譯本書中文版的過程中，筆者得知了基於被公開了的共產國際資料所撰寫的《毛澤東 真實的故事》（亞歷山大 潘佐夫、梁思文著，林添貴譯，聯經出版社，2015 年）一書出版了中文版。然而在閱讀完了這部書之後，卻發現其中完全沒有關於本書中所描寫的，毛澤東和日軍同謀的部分。筆者於是強烈地感覺到，從更多的國家發掘很多新的資料，互相補充對照，來探求毛澤東真相的必要性和意義。如果本書中文版的問世能對此做出一些貢獻的話，筆者深感榮幸。

我在中國出生長大，經過國共內戰，在中共軍受毛澤東之命斷糧封鎖長春時，有家族成員因此而餓死，並且在餓殍遍野的卡子（國共兩軍之間的真空地帶）中露宿，有著因為極度的恐懼而喪失記憶的經歷。

所以很長時間，我的心中充滿對故鄉中國的愛和懷念的同時，又對一直不承認那段歷史的中共懷恨，這讓我生活在愛恨交織的苦惱之中。然而現在，在追逐挖掘日本侵華戰爭中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之後，我內心的矛盾終於能夠畫上句號了。

毛澤東其所為乃是“帝王之術”。

並且，“我們偉大的開國領袖毛澤東”為了成為“帝王”，為了

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擇手段而已。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稱他為“偉人”也不為過。

在此，對為本書中文版出版而盡力的明鏡出版社 Claire Ko 女士、對高伐林先生等本書編輯、裝幀團隊，獻上發自內心的感謝，並且對讀到 BBC 中文網的文章後馬上做出決斷、積極聯繫我出版中文版的何頻總裁，表示敬意和由衷的感謝。

遠藤 譽

2016 年 4 月

序言 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

中國建國之父——毛澤東。

長久以來，中國人民都被告知，在抗日戰爭中是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中共）的軍隊勇敢地和日本軍戰鬥，並擊退了日本的侵略。而在此期間，國民黨軍則在賣國賊蔣介石的領導下消極抗戰。

而到上個世紀 80 年代以後，因為和台灣和平統一的必要性被提上檯面來，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漸漸被修正成“國民黨軍多少也進行了一些抗戰”，最近製作的電視劇中則有了“國民黨軍和共產黨軍的抗戰程度半斤八兩”的描寫。

儘管如此，在 2015 年 9 月 3 日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大會”中，依然是把中國共產黨軍定位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共對自己在抗日戰爭中的評價日益高漲，正因為如此，才會舉行盛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的閱兵式。

然而，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不但並沒有和日軍進行大規模的戰鬥，反而和日軍串通，拖與日軍正面戰鬥的國民黨軍的後腿的話，會怎麼樣呢？

中共不但會喪失因擊退日軍侵略而建立起來的巨大聲望，甚至會動搖到習近平政權的基石。

當然，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多少和日軍打過一些游擊戰。但是對毛澤東來說，最大的敵人一直是國民黨的蔣介石。毛澤東正是打著這樣的算盤：讓國民黨軍和日軍正面作戰並被消耗，然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擊敗大傷元氣的國民黨軍，以奪取中國政權。

正因如此，1939年，毛澤東派遣中共間諜潘漢年潛入了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關“岩井公館”，並和日本外務省的岩井英一有了親密來往。潘漢年向岩井英一提供關於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而作為提供情報的報酬，岩井英一則向潘漢年支付了大量的金錢。最讓人驚訝的是，潘漢年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向岩井英一提出了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停戰的請求。

1937年，國共之間在表面上達成了合作關係（即第二次國共合作），而正因為如此，中共能夠比較容易地獲得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日本進行侵華戰爭的敵方國家是中華民國（蔣介石政權）。

故而對日本來說，想必很高興能夠獲得可以給戰局帶來優勢的關於國民黨的軍事情報。

毛澤東利用張學良於 1936 年所發動的西安事變（詳見第三章），讓國民黨不再圍剿共軍，並以“合作”為由從國民黨政府獲得軍備武器，卻在背後把國軍的軍事情報出賣給日本間諜機關。出賣了中華民族、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正是中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本人！

毛澤東是如此天縱奇才的偉大戰略家！

潘漢年受毛澤東之令所接觸的不僅僅是日本外務省系的人。他同時還和日軍陸軍參謀影佐禎昭私下見面，並且和汪精衛傀儡政權的特務機關“76 號”也暗通款曲。一切都是為了讓共軍和日軍私下議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沒多久，潘漢年就於 1955 年被毛澤東下令秘密逮捕。潘漢年對毛澤東的策略知道得太多了，所以才被打成“內奸”而封口，並於 1977 年病死獄中。雖然文化大革命於 1976 年隨著毛澤東的死亡而終結，但是被毛澤東親自逮捕的潘漢年卻遲遲沒有得到平反。直到其死亡 5 年之後的 1982 年才被中共正式恢復名譽。

於是，潘漢年的許多朋友為了能夠慰其在天之靈，開始收集與他相關的各種資料。此後，潘漢年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受毛

澤東的指示”、都是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這一真相終於開始為人所知。諸如《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尹騏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潘漢年傳》（尹騏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也陸續在中國大陸出版。

不僅僅如此。

不知是否因為已經無法掩蓋，中國最權威的官方電子網站“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於2005年發表關於潘漢年的文章，於2011年發表關於和潘漢年同樣潛入岩井公館的另外一名著名中共間諜袁殊的文章，宣稱他們入獄是冤枉的，並肯定了他們的功績。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這些文章中，都被把當時的事件描繪成“潘漢年和袁殊和日本之間進行的間諜活動，都是為了能夠獲得日軍情報，打敗日軍並引導中國共產黨軍走向勝利”。

然而共產黨和日本的資料所呈現的事實卻恰恰相反。

譬如岩井英一在其親筆回憶錄《回想的上海》（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員會發行，1983年）中明確地指出，潘漢年毫無疑問，是“給日方提供情報的人員”。他驚訝於潘漢年向他提出“中共和日軍停戰”這一提案，並把其記錄在回憶錄中。

另一方面，在《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和《潘漢年傳》中，記載了作為提供情報的報酬，潘漢年等人每個月會從岩井公館獲得2000元港幣，這個金額相當於1939年一個香港華人警官五年的工資。

如果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所說的一樣，中共的間諜和岩井英一接觸是為了讓在延安的毛澤東獲得關於日軍的情報的話，那麼從日方獲得巨額的情報的報酬就很奇怪了。這樣是說不通的。如果潘漢年和袁殊的間諜活動只是為了獲得日軍的情報的話，毛澤東也沒有必要因為他們“知道得太多”而把他們投入獄中。

毛澤東的戰略，說到底，都是為了奪取天下而削弱蔣介石所帶領的國民黨軍。為了這個目的，不管是和日軍還是和汪精衛傀儡政權，都可以進行合作。

必須認識到，這正是毛澤東的“帝王之術”。毛澤東所信仰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帝王之術”。對毛澤東來說，重要的不是人民，而是共產黨和自己。只有自己獲得了天下才有意義。為了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潘漢年在上海進行間諜活動的時候，中共在香港設置有地下特務組織的辦事處。廖承志和潘漢年等人奉毛澤東之命在此從事工作，並且與在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外務省特務工作人員小泉清一合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算是形成了一個中共和日軍協力的間諜組織。

而這位廖承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曾經擔任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和國務院外交辦公室副主任等職位，與諸如日本的高碕達之助合作，於1962年簽訂了《中日長期貿易綜合協定》等等，

與戰後的日本也有很多聯繫。當時中日之間的貿易活動被稱為LT貿易，正是取自廖(Liao)和高崎(Takasaki)二人英文名字的首字母。

毛澤東之所以沒有對像潘漢年和袁殊一樣，把廖承志也投入獄中(文化大革命時期除外)，原因之一大概是廖承志並不像潘漢年一樣知道太多毛澤東和日本暗中勾結的現場內情，還有一個原因則是廖承志出生於東京並曾經在早稻田大學就讀，能操一口日本人也比不上的流利日語。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之後，打著再利用一次日軍的算盤。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聯合國並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的代表權，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也非常少。其原因之一是中共建國後很快就爆發了朝鮮戰爭，成為了美國等西方諸國的敵人。

因此毛澤東盡量維護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意圖讓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毛澤東所選定的對象正是抗日戰爭中日軍的將領們。

甚至邀請大將級的日軍將領來中國。

對日本人來說，很容易產生這一疑問：為什麼要邀請曾經不共戴天的日軍將領？這其中有著很深層次的原因。

實際上，在抗日戰爭中，日軍最後的中國方面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因為蔣介石勝利宣言的內容和戰後協助超過 200 萬的日本軍民能夠迅速地返回日本，對蔣介石產生了敬意。兩人之間產生了深厚的友情，而岡村寧次宛如走鋼絲一般無罪返回日本之後，為蔣介石秘密地組建了軍事顧問團“白團”，並試圖幫助逃到台灣的蔣介石“反攻大陸”。而知道這一件事的毛澤東，想盡辦法要讓岡村倒向自己這一邊。所以才會意圖招聘大將級別的舊日軍將領。

因為岡村拒絕訪問中國，所以作為舊軍人代表團代表訪問中國的是遠藤三郎（舊陸軍中將）。當時擔任日語翻譯的正是廖承志。

1956 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招待遠藤三郎中將等人時，就曾經說過“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侵華）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此後，因為每次有日本人來華見到毛澤東的時候都要謝罪，毛澤東感到很煩，於是多次發言表示“感謝日本皇軍”以及並不在意過去的事情。

對於毛澤東的這些發言，中國方面的解釋非常牽強，然而如果考慮到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毛澤東就一直有和日軍合作的行為

的話，反倒是字面上的意思更容易說得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心理層面上的“國共內戰”中，日本乃是雙方爭奪的對象。

毛澤東並不打算多談“南京大屠殺”，在實際的教育活動中也基本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這固然是為了抑制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仇恨，讓日本民心倒向毛澤東一方，但是最大的原因則是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毛澤東等人正逃到延安鑽山洞，並沒有和日軍發生太多的衝突。一方面大力宣傳抗日運動，另一方面則和日軍合謀來削弱蔣介石的國民黨軍。注目於“南京大屠殺”就會暴露這一事實。毛澤東擔心的也許是這一點吧。

中國教科書中出現“南京大屠殺”，則是在毛澤東逝去，改革開放之後的事情。這件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衝擊。所以從80年代起，開始出現抗議活動反對參拜靖國神社。

現在和毛澤東時代比起來，情況改變得太多了。指責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變成了中國的基本姿態，甚至成為了一張外交牌。

帶來這個轉換點的正是江澤民的愛國主義教育。

江澤民的父親是日本所操縱的汪精衛傀儡政權的宣傳部副部長。這件事情無法被掩蓋的時候，江澤民就將愛國主義教育變成反日教育，以此來向中國人民顯示自己反日的立場。江澤民和抗日戰爭時代的中共沒有任何關聯，自然也無法知道毛澤東的深謀遠慮，所以才試圖表明自己不是人人喊打的漢奸。而因此被煽

動起來的反日情緒，也讓此後的胡錦濤政權及習近平政權，為了不被國民罵作“親日政府”“賣國政府”，一直展現出強硬的對日政策。

實際上毛澤東在其生前，一次也沒有紀念過所謂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因為他很清楚紀念這個日子等於承認蔣介石的功績。開始在全國範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依然是江澤民。第一次是於1995年9月3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一起舉行了慶祝。

而習近平政權大打歷史牌的原因，則是為了對抗以美國為中心的民主國家的“普世價值”所組成的對中國包圍網。大概是想在國際社會上形成“日本沒有正視歷史”的輿論，對強化日美同盟的美國進行批判，以達到削弱美國的目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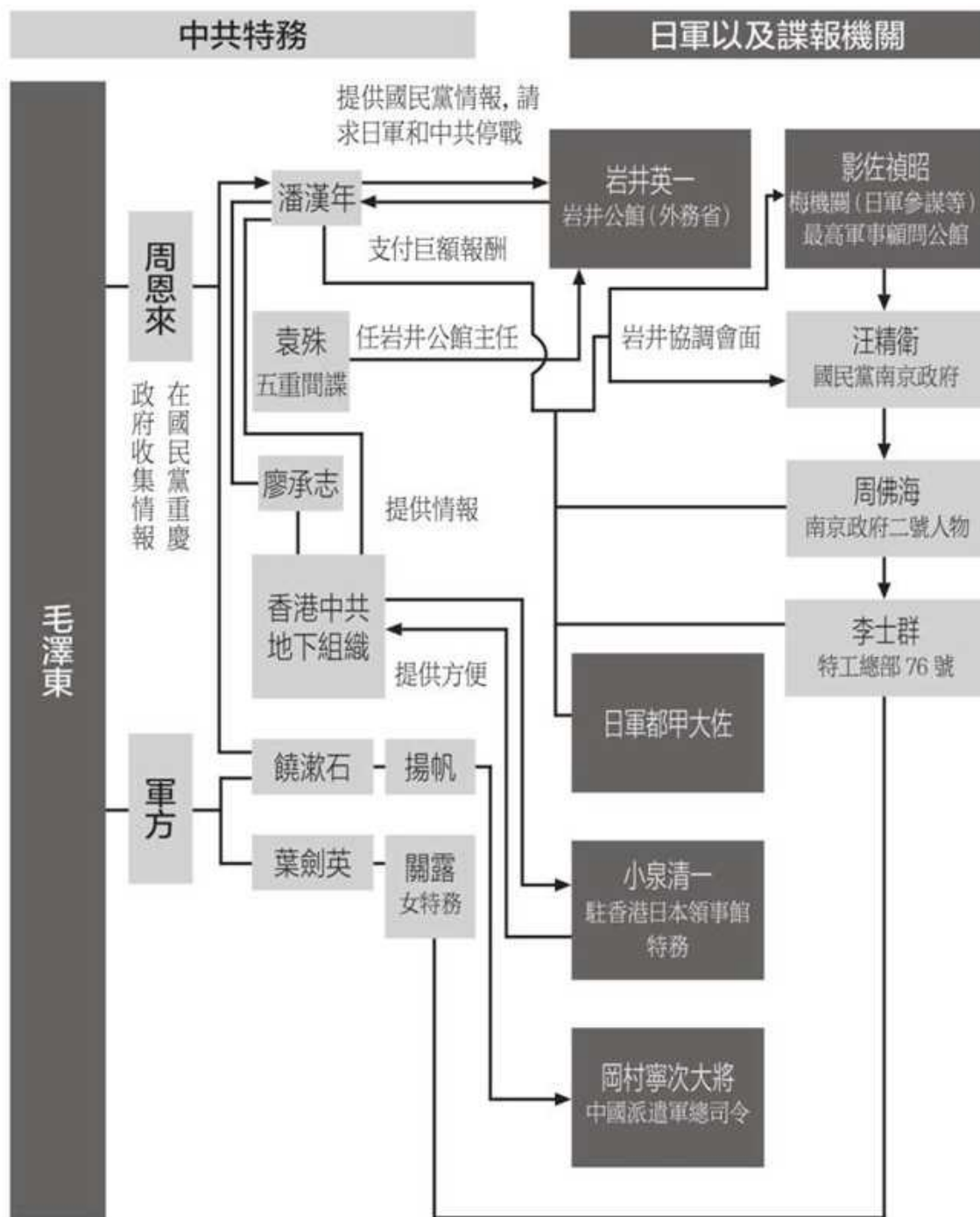
本書將以毛澤東是如何和日軍合作並利用日本為中心線索，解讀毛澤東為何會具有能被稱作帝王之術的大膽戰略，其執念和野心究竟源自何方，並試圖描繪毛澤東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形象。我堅信只有明確了究竟是誰沒有正視歷史，才能為現在中日兩國之間越來越深的鴻溝畫上休止符。

作者附注：儘管毛澤東在戰略上讓共軍迴避與日軍發生正面衝突，但是為了共軍士兵的名譽，我必須在此說明，他們在參加戰鬥的時

候是十分勇猛果敢的。

“國民黨軍”這一稱呼，準確地說，在 1924 年到 1947 年間的正式名稱乃是“國民革命軍”，於 1947 年後改名為“中華民國國軍（簡稱國軍）”。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其稱呼又有所變化，為避免混亂，除了關於國民革命軍誕生過程的部分之外，本書中把國民黨蔣介石所率領的軍隊統一稱為“國民黨軍”。而關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則基本上是稱之為共產黨軍或中共軍，有必要的時候，也會按照不同時期使用“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等稱呼。

中共特務和日軍的共謀



中共間諜通過多條渠道與日本、汪精衛政權多個機構和人物聯繫。



岩井英一晚年出版回憶錄《回想的上海》，披露毛澤東和中共與日本情報機構勾結的祕辛。

停戰事件と騒がれた二人の関係はこのとき以来のものようだ。
ある日、貴族主幹を通じて潘漢年から華北での日本軍と中共軍との停戦について談話がしたが日本側は連絡して欲しいとの要請があった。私は軍事のことは何もわかっていないが、華北での日本、中共両軍といつても、戦線は極度に入りくみ錯綜している筈だし、停戦の線引きその他技術的な問題だけでも困難が多く、実現は至難だろうと思ったが、當時、人から物ごとを頼まれた場合、どんなに難しいとわかっていても頭から駄目だと断らず、出来るだけのことをしてやるのが私の流儀だったので、この潘からの要請について、着目して影佐少将に頼んでみよう、そして事の進否は影佐の判断に任せようと考え、影佐に連絡の上、貴族の案内で南京の最高軍事顧問公館に影佐を訪ねさせた。結果は案の定何の結果もなかったようだ。尚その際、潘は影佐の口利きで汪兆銘主席にも会っている。汪主席との間でも恐らく汪政府和平部隊との停戦の話が出ただろうが、これまた何等実りある結果はなかったようだ。
それにしても、さきにも書いたように、上海で密かに張子良と会ったり、蔣介石を抗日民族統一戦線に引張り込むために敵地南京に参込み陳果夫に会ったり、また現在戦争の相手方である日本側の懐ろにとび込むために興隆運動の貴族、陳季本を通じて、この私に接近したり、更にまた華北における停戦話合いと称し、ついに現地日本軍の要員の地位にある影佐に会い、更に新政府最高の汪主席にまで会う。その八面六臂の活躍ぶりには、あの物珍かだった潘のどこにこのような勇氣がひそんでいたのかと感心させられた。このような潘の潘であったらこそ、さきの朝工作の重慶側代表張子良の役面をはぐ位朝飯前といったところだったのである。

165

《回想的上海》第165頁。
岩井英一披露：潘漢年向日方
提出日軍和中共軍之間停火。

第一章

從屈辱中誕生的帝王之術

早年生涯

對革命的覺醒

憎恨知識分子的原點是北京大學

早年生涯

毛澤東是從何時、是如何掌握了帝王之術的呢？我們需要先從他早年的生涯找出蛛絲馬跡。

毛澤東，字潤之，1893年（光緒十九年）12月26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父親乃是富裕的農民，也就是所謂的地主。毛澤東是五兄弟中的老三，然而因為之前的兄長們都早逝，實際上是作為長男而被養大的。

毛澤東的父親是從窮人白手起家成為了富農，對於花錢非常的嚴格。毛澤東的祖父曾經因為欠債，在湘軍中呆過一段時間，受過一些教育，能讀能寫能算數。毛澤東從6歲起就開始幹如放牛、撿牛糞、拔草等農活。8歲的時候他開始上私塾，但是剩下的時間還是要幹農活。

說是私塾，也不過是毛家親戚所開設的農村的私塾，所傳授的僅僅是讀寫能力而已。但是考慮到他的母親不識字，能夠讀寫就已經很厲害了。

漸漸的，每天會有兩小時左右用來朗讀學習《三字經》《六言雜詩》乃至《論語》《四書》等書。毛澤東對詩產生了興趣，但是對其他硬梆梆的教育卻並不感冒。吸引他的是《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等當時清朝的禁書。

13歲的時候，父親讓他出席招待大主顧的宴會，幫忙進行接待。毛澤東表示不願意的時候，其父當著眾人的面訓斥他懶惰无用和不孝。也許是因為早就看毛澤東整天讀閒書不爽了吧。

毛澤東則當著客人的面，用《禮記》中的“父慈子孝”來回敬他。這大概是毛澤東對沒學過儒學的父親的最大限度的反抗。

而這句話更加激怒了其父，要像平時一樣狠狠地打毛澤東一頓。毛澤東跑出家門，其父就追趕他。毛澤東跑到了池塘邊上停下，威脅父親說：“你要打就打吧！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這時候其母就出來打圓場——母親雖然沒有學問，但是卻心地善良，非常疼愛毛澤東。

然而父親卻找不到台階下來，壓住雷霆之怒要求毛澤東跪下磕頭認罪。毛澤東考慮到母親的立場，最後只好不情願地跪一條腿、磕了半個頭謝罪。在頭觸地的那個瞬間，毛澤東心中一定燃起了熊熊的反抗之火。

對方強硬的時候，自己也要威嚇進行反抗；但是力量不足的時候則要“隱藏起來積蓄力量，等待報復的時機”——這就是所謂的“韜光養晦”。也是之後毛澤東所發明帝王之術的基本中的基本。

在跪下的黑暗之中，毛澤東大概已經看到了“韜光養晦”這四個大字了吧。而其帝王之術最初的萌芽也許便是由此而來。

此後，毛澤東不再被允許去上私塾，被命令專心幹農活。白天在田間勞動，放牛、撿牛糞，晚上則整理父親的賬本。然而毛澤東並沒有接受教訓，一有空就偷偷地讀書。自然也被父親責罵為懶惰。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沒有停止讀書。晚上為了不讓燈光漏出窗外，用被子擋住窗戶挑燈夜讀。毛澤東一輩子經常熬夜，床邊也堆滿了書，大概就是這個時候養成的習慣。

14歲的時候，他接觸到《支那分割之命運》一書。

這本書的第一句話便是“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描寫了以大日本帝國佔領朝鮮和台灣為始，大英帝國佔領緬甸、法國佔領越南等事件，喚醒了毛澤東的國家意識。他於是開始閱讀關於明治維新的書。

毛澤東的求知慾望難以抑制。

他拜託親戚說服了反對的父親，終於進入了小學校。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設在毗鄰的湘鄉縣，所以毛澤東離開了出生之地湘潭縣。離別時他模仿漢詩《將東遊題壁》，題了一首《改西鄉隆盛詩贈父親》給父親以表離別之情——本詩實為枳月性所著，當時毛澤東誤以為是西鄉隆盛所著，故有此題。不管怎樣，毛澤東的確是非常憧憬明治維新。

建立新的國家！

讓毛澤東決心成為“建國之父”的原因之一，可以說是明治維新吧。來到湘鄉東山小學後，又遇見了日本留學歸來的教師，再一次學習了明治維新和大日本帝國革新的精神。這時候被教授的歌頌日本在日俄戰爭勝利的歌曲《黃海之戰》，讓毛澤東感受到大日本帝國的強大，並鼓舞起他心中的勇氣。

的確，從 1840 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戰敗之後，英法等歐美列強不斷地染指亞洲，以中國為首的諸多東亞諸國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這時候的日本即使變成歐美列強的殖民地也毫不奇怪。

然而亞洲這個彈丸之國的日本，卻為何能夠逃脫淪為歐美列強殖民地的命運呢？從歷史長遠來看的好壞姑且不論，這難道不應該歸功於明治維新以來的富國強兵政策，使自己轉入了攻擊的一方嗎？

當時對日本來說威脅最大的是俄羅斯帝國（1721 年～1917 年）。匹敵大英帝國的俄羅斯帝國為了追求不凍港而南下，從清朝租借了遼寧省的大連和旅順並將其變成了殖民地。俄羅斯可以說是控制了中國東北部（滿洲）一帶。接下來如果獲得了朝鮮半島的話，日本淪為殖民地也就近在眼前了。日本無論如何都要阻止這種局面。

當時正好俄羅斯和法國結成俄法同盟，法國投資著手建設西

伯利亞鐵道。而和法國在地球上每個角落爭奪殖民地的英國，為了壓制法國的發展，則和日本締結了日英同盟。對日本來說，日英同盟顯然是避免讓日本淪為殖民地的最佳選擇。

日本提出表面上讓朝鮮半島“中立化”的主張，挑起甲午中日戰爭（1894年～95年），並獲得了勝利。其後日本與清朝簽訂了馬關條約，而俄德法三國介入，要求日本將“遼東半島還給清朝”。

說白了，俄羅斯不願意放棄旅順和大連的不凍港。嘴上說的是“還給清朝”逼日本讓步，實際上日本將旅順還給清朝之後，卻被俄羅斯拿來當作自己的軍事基地使用。並且1896年，俄羅斯和清朝締結秘密協議，獲得了西伯利亞鐵道延長後橫斷中國東北三省的部分東清鐵路的鋪設權利。俄羅斯在中國的野心讓日本感受到“日本也許會被俄羅斯侵略”的威脅。

於是日本便和俄羅斯開戰了。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竟奇蹟一般地獲得了勝利。也許是因為對清王朝的批判，毛澤東並沒有對甲午中日戰爭投入過太多關注，而對日俄戰爭則表現出強烈的關注，並且高度評價其為“亞洲人對白種人的勝利”。

他也很喜歡讀美國喬治·華盛頓和俄羅斯帝國彼得大帝等人的偉人傳記，這一階段也許已經開始有了奪取天下的志向吧。

而在中國國內，則深受清朝末年發起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維新改革思想的影響。

對革命的覺醒

1911年，18歲的毛澤東考入湖南省會長沙市的湘鄉駐省中學，並從革命黨報紙上讀到孫中山（孫文）所帶領的反抗清政府的革命運動——黃花崗起義的新聞。

這是孫中山為了推翻清政府，以1905年在東京創立的中國同盟會的成員為中心，1911年4月在廣州發動的起義。毛澤東知道這場起義之後，覺得自己也應當對推翻清王朝做出一些貢獻，做出了第一次的政治行動。他在學校的牆壁上張貼“推翻滿清，樹立民國！”的海報，並且作為抗議的一種象徵行動，他帶頭剪掉了被清王朝強制留起的辮子。

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一部分革命家前往長江流域活動，於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省武漢市武昌發動了武昌起義。辛亥革命拉開了帷幕。

武昌以三國時代公元208年，曹軍和孫劉聯軍之間的赤壁之戰而聞名。在武昌的革命軍起義則刺激了青年們的熱血。

長沙革命黨率先響應起義，毛澤東也投入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的一名士兵。當時也有學生組成的學生軍，而毛澤東加入湖南新軍而不是學生軍，據說是因為每月能領到7元軍餉的緣故。在軍中毛澤東受到了一些軍事訓練，這在之後發揮了作用。

1912年2月，清朝最後的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退位，清朝到此告終。

毛澤東參加革命軍是為了推翻清朝，而既然清朝已經被成功地推翻，他就認為自己已經達成了參軍的目的，打算回到長沙的中學繼續學業。然而對於超過18歲的青年來說，回到比自己小6歲的少年們就讀的中學，讓他的自尊心難以接受。並且，毛澤東覺得自己不是中學這一池子所能容納下的人物。他絕對不要被規矩所束縛，再學一遍已經學過的東西。於是基本沒有去上課並因此被退學了。

毛澤東試著考了一下高中，卻因為數學和英語都是0分而沒有考上。最後只好在長沙的圖書館裡埋頭讀書。在這裡他閱讀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等著作，並受到深刻的影響。

而平生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圖則給他帶來了最大的衝擊。那幅地圖就掛在圖書館的牆壁上。本以為無限廣闊的中國只不過是世界的一部分……

在這新鮮的衝擊的同時，他大概也立下了即使不能稱霸世界，也要把世界地圖中的中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志向吧。每天去圖書館的時候，都要抬頭看一看。駐足仰望之後，則好想下定決心一

般繼續啃書。

然而來自父親嚴厲的消息打亂了毛澤東這樣的日程。父親認為毛澤東每天不去學校，懶惰度日，便拒絕繼續供給學費。

毛澤東只好考入了不需要支付學費的湖南第四師範學校。第四師範雖然沒過多久就被合併到湖南省立第一師範，但是還是不收學費的。靠著親戚和東山小學堂的恩師資助的生活費，他總算安定下來，也開始正常上課學習。

但是，不管是第四師範還是第一師範，都只是中專而已。第一師範是5年制學習，學完後相當於日本高中第二年為止的學習程度。

這件事情則對毛澤東的一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是毛澤東成為建國之父的源頭之一，也是他建國後迫害知識分子，形成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基調的原因，必須對其進行仔細的研究。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的時候只喜歡社會科學，特別是對倫理學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這也是因為決定毛澤東一生命運的楊昌濟（1871年～1920年）在此教授倫理學。

楊昌濟於1902年至1908年留學日本，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攻讀教育學。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也就是之後的東京教育大學，也就是筑波大學的前身。對曾經在筑波大學任教的筆者來說，也是非常有趣的。

楊昌濟在日本留學後又去了英國留學，並且在英國阿伯丁大學學習哲學、倫理學及心理學，並獲得了文科學位。此後又考查了德國及瑞士的教育制度，終於與 1913 年回到了故鄉的湖南省長沙市。歸國後先是在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執教，1914 年湖南公立第一師範學校和湖南第四師範學校合併成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後，也兼任第一師範的教員。而他的學生中就有毛澤東。

楊昌濟十分中意毛澤東，而毛澤東也非常的喜歡聆聽楊昌濟的教導。楊昌濟的教科書用的是德國人費里德里希·包爾生(1846 年~ 1908 年)所著的《倫理學原理》，這本書是由後來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16 年~ 1927 年)的蔡元培從日語翻譯成中文的，蔡元培也曾在日本留學。先是從德語翻譯成英語，1900 年日本人的蟹江義丸將其翻譯成日文出版，而蔡元培又將其翻譯成中文，乃是環繞了地球一圈的著作。毛澤東把這本書反復讀了許多遍。書的空白處寫滿了毛澤東的批註，並且引出了他在日後“現實主義”的理論。

關於“現實主義”，毛澤東認為，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不能脫離現實去追求虛幻的理想和價值，要爭取在有限的時間裡“實現自我”。

這也是之後毛澤東思想所提倡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基礎。所以說《倫理學原理》在毛澤東的頭腦中，不光是引導他走向馬克

思主義的橋樑，也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的基石。

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在被摧毀的俄羅斯帝國的基礎上，蘇聯誕生。

當時的中國還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中華民國於1912年好不容易成立，孫中山擔任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卻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凱逼其退位自己當了大總統，並於1916年稱帝，其政權非常的不穩定。1916年袁世凱死後，各地軍閥陷於混戰。

而毛澤東所在的第一師範，也被捲入了這軍閥的內戰。

1917年11月，被擊敗的北洋軍閥逃進長沙市，市民一片恐慌，第一師範也打算讓學生們進行避難。而這時毛澤東向校方提出讓受過軍事訓練的學生們組成志願軍，一起打退潰軍的提案。

實際上第一師範所在的長沙一帶是鐵路交通要地，曾經多次遭到軍閥潰軍的蹂躪。所以正好在1916年增加了軍事管理等課程，開始進行了軍事訓練。

而毛澤東則有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的一段時間在湖南新軍從軍的經驗。他利用當時受到的軍事訓練和所閱讀的諸多書籍中的兵法組織起學生們。把200人左右的學生志願軍分成幾隊，潛入到聚集了3000多名潰軍的山附近，拿著木刀、點燃爆竹，大聲喧嘩。另一方面又懇請當地的警察幫忙，用真槍向敗軍開火。

趁潰軍誤以為被大軍所包圍而心驚膽顫的時候。不進行正面交戰而派出使者進行交涉。這個戰術獲得了成功，3000 名敗軍投降，並把武器全部上繳給了學生志願軍和警察。

而這次成功，便是下一章進行詳細描述的毛澤東游擊戰戰略的開始。毛澤東因為這次壯舉中而被稱讚為“渾身是膽”，成為了長沙的英雄。

同一年，宮崎滔天（1871 年～ 1922 年）來到湖南進行演講。

宮崎滔天是孫文等人在日本逗留期間，支持他的生活和思想，並且幫助辛亥革命成功的日本人。宮崎提出了“想要拯救被歐美國列強殖民地化的亞洲，必須維持亞洲文明中心的中國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自由”的“亞細亞主義”。他於 1891 年首次來到上海，此後多次往來於中日兩國之間。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把逃到香港的康有為帶到日本的也是他。

毛澤東深為宮崎滔天的演講所感動，更加尊敬起日本來。

他的同學中有後來為成立中國共產黨做出貢獻的蔡和森，毛澤東和他一起於 1918 年 4 月成立了新民學會。

憎恨知識分子的原點是北京大學

1918 年夏天，毛澤東從第一師範畢業。當時的楊昌濟已經是

湖南大學設立的準備委員，同時也被邀請到北京大學執教。

當時青年中流行到法國去勤工儉學。這是法國發起，由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所組織的項目。周恩來和鄧小平都靠這個項目去了法國留學。

1918年8月，毛澤東和二十多名有志青年奔赴北京，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邀請毛澤東留法的，正是在北京大學的楊昌濟。

北京大學的校園內充滿了活力，中國的最頂尖的知識分子在這裡展開關於國家大勢的熱烈討論。毛澤東以前在書本和新聞中才能見到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對他來說該是怎樣的興奮和刺激！

楊昌濟雖然希望毛澤東能夠考入北京大學，然而毛澤東只是相當於中專的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學歷，卻成為了瓶頸。

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之後，教育部發布了規定。其中有關於參加大學入學考試資格的規定，按照這個規定，中專程度的學歷是不能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

所以，毛澤東並沒有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資格。唯一的方法，是要進行相當於普通高中畢業的實習或者研修之後，可以被認定為相當的學歷。於是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

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

毛澤東親眼見到了知識分子最崇拜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被進步文化人尊為神人的陳獨秀等著名人物。李大釗頻繁使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詞彙，熱情稱讚列寧所發起的十月革命。

而對毛澤東來說，本來自己應該站在時代的最先端，卻和年少時被迫幹農活一樣，幹著打掃衛生的工作！

毛澤東帶到北京大學的“非專科高中”畢業的青年考進了北京大學預備班，靠著勤工儉學制度去了或者準備去法國，為了籌措資金四處奔走，而這時的毛澤東又在幹什麼呢？

強烈的自卑感和挫折感，定然是點燃了毛澤東無可抑制的復仇心。筆者是這麼看的。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回到長沙擔任小學的歷史教師。在中共的毛澤東傳中，是這樣解說的：“毛澤東覺得這樣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同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加強聯繫，直接投身到社會活動之中”。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離開北京大學的時期，正好是在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發起的“五四運動”前一個月。他錯過了這場改變中國走向、促進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運動。

要參加社會活動的話，那麼也許留在北京大學，參加五四運動會更好一些吧。在那個時候沒有比這更能改變時代的潮流了。

當然筆者並不是說小學教師就一定不行，但是站在世界地圖前發誓要主宰中國的人，卻在改變世界歷史的五四運動時期偏於長沙一隅當著一個小學教師，這也算是造化弄人了吧。

也許正是對中國最高學府的抵抗和強烈的自卑感帶來的反彈，才讓他能夠走向更大的目標。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毛澤東就開始了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提倡長期的階級鬥爭，把多數的知識分子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逮捕羞辱了他們。

而在發起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關閉了大學，撤銷了研究生院，只留下了革命的熱血工農兵上的專科學校。他完全破壞了重視學歷的學校教育制度，讓所有有高中以上學歷的知識分子全都下放到農村和邊疆，接受勞動人民再教育。

所謂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就越要讓他們受到人民群眾的暴力和羞辱，而在他們臨死之時，毛澤東才能感受到報復的快感。

難道不是這樣嗎？

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時候，需要在入口填表寫上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單位。教授們寫上自己的名字的時候，只是對著表填寫，

而表究竟交給誰，對教授們來說並不重要。換句話說，毛澤東在教授們的眼中並不存在。

做這項工作的一段時期，毛澤東住在楊昌濟在北京大學附近的家中。毛澤東後來和楊昌濟的女兒結婚，而北京大學的教授們也經常來到楊昌濟家裡。是為了拜訪楊昌濟。

毛澤東在楊昌濟家負責開門。而來訪者們卻不記得這個開門的人是誰。

毛澤東在延安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時候，來訪延安的人中，有曾經拜訪過楊家的人在。不願意談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職期間的事情的毛澤東，親自詢問那位來訪延安的人是否記得自己。對方說不記得。

是啊——

我就是當時給你開門的人，當時在你們的眼中無足輕重的人！

毛澤東的復仇心究竟壓抑了多久，發酵到多麼的強烈，等到中共建政之後我們就可以看到了：宛如火山中噴發出熔岩一般，以迫害知識分子和破壞教育制度的形式爆發出來。

然而，五四運動的起因之一是抗議日本提出的對華 21 條。

日本在締結日英同盟之後，響應英國的希望，於 1914 年參加

發生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末),並且於1915年對中國提出了對華21條,作為承認袁世凱當皇帝的條件,逼迫其接受21條。其要求實在太過分,就連袁世凱也只願意承認其中的16條,於是最終簽署了這16條的《中日民四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要求廢除與日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卻遭到拒絕,並根據《中日民四條約》之一的《關於山東之條約》,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華民國和日本同為戰勝國,卻要在其講和條約中接受日本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實在是不合道理,於是在中國引起了強烈的反日運動。

這個關鍵時刻自己卻不在北京,這給毛澤東內心帶來非常複雜的感受。對毛澤東來說,他所憎恨的不是向中華民國提出21條的日本,而是在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之前把自己趕出北京大學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才是敵人。

為了雪恨,毛澤東在此後的抗日戰爭中和日軍聯手,說是自然的結果也不為過。甚至可以說,讓毛澤東和日軍同謀的原因之一,正是北京大學。

曾經在北京大學某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的筆者,在一次進入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時候,從一位退休老教授那兒聽過關於毛澤

東的事情。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那位老教授低聲喃喃道：“如果當時北京大學的人有更好的看人的眼光的話，現在中國的歷史就會完全不同了吧。”

第二章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

從湖南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採用寄居蟹戰略成為國民黨幹部

和汪精衛之間的友誼

蔣介石的直覺

蔣介石的苦惱和皇姑屯事件

一山不容三虎——在井岡山的大規模殺害

建立“國中之國”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的紅軍

內心深處對共產國際的憎惡

從湖南運動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回到湖南省長沙市的毛澤東在擔任小學歷史老師的同時，也以新民學會為中心，在1919年7月14日創刊了進步雜誌《湘江評論》。然而卻苦於沒有原創稿件，只好自己來寫稿填補空缺。

另一方面，毛澤東對魯迅的弟弟、作家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介紹的日本新村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就在湖南開始著手進行新村建設。

新村主義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白樺派）於1918年所提倡的，“建設自己的村莊，建房耕田自給自足，像人類一樣生活”的社會活動。曾經在日本留學並和日本女性結婚的周作人對此運動非常贊同，並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呼籲建設新村的北京支部。

毛澤東看到後十分感動，也在湖南省的岳麓山計劃建設同樣的新村，並且作為他改革社會的一種構想，於1919年12月1日把建設計劃的一章公開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然而毛澤東這個建設新村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嘗試，就被當時控制著湖南的北洋軍閥督軍張敬堯所打斷。

當時的中國各地軍閥割據。

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之後一時稱帝的袁世凱從清朝開始就

掌控著北洋軍閥，其軍力大大高於其它人。1916年袁世凱死後，構成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基礎的北洋軍閥分裂成幾派互相競爭。其中包括：

直系軍閥——馮國璋、吳佩孚等人（英美扶持）：長江中下游流域

皖系軍閥——段祺瑞等人（日本扶持）：安徽省、浙江省、山東省、山西省等地

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等人（日本扶持）：熱河省（包括現在的河北省、遼寧省、內蒙古自治區等地一部分的地區）、黑龍江省、吉林省等地

晉系軍閥——閻錫山等人（日本扶持）：山西省
等等派別。

中共建國後，筆者在袁世凱設立北洋新軍的天津長大，住在馮國璋的舊居，對面是袁世凱為小妾建的豪華公館，故而對北洋軍閥有著彷彿親眼見過一般的親近感，想要更多地了解他們。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軍閥名字後面括號中所寫的國家。您會注意到有很多是日本。日本在當時試圖把中國變成殖民地的列強國家中，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後，其侵略性之強遠超其他列強。

日俄戰爭的確是亞洲人擊敗白人的壯舉，讓日本沒有變成白人的殖民地這一點也許值得評價。然而日本卻在這基礎上，於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大肆進行擴張，引發了國際社會的警戒。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講和條約凡爾賽條約的基本精神是“帝國主義不再進行擴張”，然而在國際社會看來，日本卻罔顧這一點繼續追求霸權的擴張。

1921年11月12日至22年2月6日間，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了國際限制軍備會議，參加國有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中華民國、日本、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九國，因為在華盛頓舉行，故稱為華盛頓會議。

華盛頓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阻止日本的軍備擴大。同時也有美國警惕締結了日英同盟的英國霸權的因素。其結果是在會議上以終止英日同盟為主，強制日本做出了許多讓步。被稱為“九國公約”。

儘管如此日本還是沒有停止在中國擴大利益的步伐，為什麼呢？

其原因之一是日本雖然贏得了日俄戰爭，卻因為龐大的軍費陷入了巨額的債務之中。因此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陷入了經濟衰退。而擴大在中國的利益則多半是打著靠這個來填補負債造成的經濟衰退的算盤。其結果就是，在中國群雄割據的軍閥背後基本上都有著日本的身影。

毛澤東在湖南的對頭張敬堯和當地的青幫紅幫等黑社會組

織勾結，作惡多端。毛澤東所創刊的《湘江評論》在一個月後就被禁止發行。

被激怒的毛澤東利用直系軍閥和皖系軍閥的不合，發起了“驅張運動”。不光是組織起當地的勞動者和群眾，還引印發了大量“打倒張敬堯”的傳單，在上海廣東及北京等雲集了進步人士的地方分發，並在各地舉行抗議請願。他打算以湖南省的改革為契機，把同樣的運動擴展到全國各地。這次運動被許多新聞媒體所揭載，傳達到了全國各地的進步知識分子手中。

自然，也傳達到了他在北京的恩師楊昌濟那裡，日益病重的楊昌濟特意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的章士釗，說：“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毛澤東也在這一段短暫時期內，頻繁的來到北京上海，宣傳打倒地方軍閥的運動。期間也遇見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人物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

張敬堯於1920年6月被免去了湖南督軍的職位。也許因為這些功績，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毛澤東以長沙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會議，也就是說，毛澤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創立者中的一員。

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一共有13位。而全國的黨員則只有50人左右（也有說是30人左右）。當時出席的也有北京代表、上海代表、武漢代表等，所以如果毛澤東留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話，因

為周圍有太多知識分子而不被推選為北京代表的可能性也很大。可以說是因為回到長沙才成為了這次創立大會的代表成員。

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寧為雞頭，不為牛後。如果回到長沙的目的中，包括到這一步計劃的話，那實在是令人驚嘆。

不過毛澤東在這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基本沒有發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傳》（（主編金沖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中也這樣描述毛澤東在會上的沉默寡言：“他不像在座的……等（其他代表）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不少人常常引經據典，涉及許多理論問題”。毛澤東變得太過沉默，甚至有些與會者認為他是“書呆子”“神經質”。

筆者認為，毛澤東在北京圖書館受到的侮辱在被壓抑在他心中成為了動力，而中共中央文獻的這些記錄則從另一方面加強了這一觀點。

在這13位代表之中，有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在內。他後來成為了本書後半部所介紹的汪精衛傀儡政權的二號人物。不光拋棄了共產黨成為了國民黨員，而且還在日本參謀本部所派遣的對華特務工作部門的影佐禎昭旗下任職。這些都會在後面詳細描述。

採用寄居蟹戰略成為國民黨幹部

這時候的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了渾然一体的側面。

國民黨是由孫中山所建立的中華革命黨於1919年10月10日改組而成。中華革命黨是1914年7月，孫中山流亡於東京時建立的革命團體，以1906年所發表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作為綱領。共產黨成立之時，中國的國號是“中華民國”，而國民黨的實力遠為雄厚、地盤更為龐大。所以共產國際對孫中山執拗地提出國共合作的要求。

共產國際乃是1919年由有關國家的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組織所創建的國際組織，又稱為第三國際，直到1943年解散為止，其總部一直都在莫斯科。列寧所率領的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在共產主義領域擁有了壓倒性的力量，早期試圖通過“世界革命”把世界各國都變成共產主義國家。

1922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誕生之後，因為在先進的歐洲各國的活動不盡如人意，所以就盯上了中國。這固然有當時的中國無論從文明程度還是從政治體制來看都不夠發達，方便蘇聯背後操縱的原因，但是其最大的理由應該還是因為日本的存在。早就知道日本盯上了西伯利亞的蘇聯，大概認為利用與自己之間擁有漫長邊境的中國，乃是阻止日本侵略蘇聯的最聰明的辦法吧。

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本身也是由共產國際所操縱的，讓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加入共產國際，並在莫斯科的指導下成立中國共產黨。故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說是“共產國際的傀儡”、“蘇聯政權的傀儡”也不為過。1924年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掌握了共產國際和蘇聯，而中共則要仰其鼻息。

儘管如此，共產國際於1921年成功組建中國共產黨乃是很大的一步，然而，中共黨員還是太少了。實際上，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開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只有195人（毛澤東沒有出席這一次會議）。而相比起來，當時的國民黨黨員人數已經達到了13萬5千人。

這樣的話，要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政權，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共產國際進行了認真的討論，認為中共只能先寄生在擁有強大力量的孫中山所成立的國民黨身上，再從這裡開始發展壯大。於是就決定了寄居在國民黨身上、從內部吃空國民黨，吸收宿主的養分讓共產黨不斷成長的陰謀。而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共產國際在詳細檢討了從說服孫中山的方法到寄居之後共產黨員的行動方針這一整套方案之後，去找了孫中山。

孫中山起初強烈地反對，但是在共產國際代表越飛提出“蘇聯放棄對中國的一切特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並且支持中華民國的統一和完全的獨立等條件後，終於被說服，同意了

國共合作並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國共合作，指的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合作關係。這次是第一次合作，故史稱第一次國共合作。其並肩戰鬥的對象，本應該主要是群雄割據禍亂國家的軍閥、以及他們背後的帝國主義列強。

1923年6月12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了國共合作的方針。

儘管孫中山同意了共產國際的條件，但是在國共兩黨的內部還是有不少人無法贊同這一決定。在中共的大會上也為此爭論不休，最終決定採取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一妥協方案。這也是共產國際一開始就計劃好的。

然而孫中山並不知道這一切，心中只有要統一中國的革命熱情。1924年1月24日，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當時新加入國民黨的人數為9018人，召開大會時國民黨黨員人數為14萬5700人）。

這次大會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基本原則，並且為了國共合作，決定了聯蘇、容共、扶助工農的綱領。

這次大會上有許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他的座位是39號。大會期間，在國民黨右派提出針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議題時，李大釗

率先駁斥了對方的論點，廖仲愷等人起而支持。在大會氣氛有利於國共合作的情況下，毛澤東趁機發言：“主席！主席！39號發言，本席主張停止討論，即付表決。”結果國民黨右派提案被輕易否決了。

接下來在討論“請採比例選舉制為大會政綱之一”的議案時，39號的毛澤東再度舉手發言說：“現時比例選舉制係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利於革命的可採用，有害於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制有害於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少數派以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以為不能討論，不能表決。”

多數代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大會沒有通過這個提案。

毛澤東在會上的表現，震驚四座。

多麼的堂堂正正，邏輯清晰的發言啊。

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幹部注意到毛澤東的存在。所以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其中就有毛澤東。毛澤東受到國民黨執行部的高度評價，馬上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這又是為什麼呢：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基本沒有發言的毛澤東，為何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上卻突然發揮了本領呢？

筆者認為這更加體現了他在北京大學的心理陰影的巨大。

當然，這也有參加國民黨大會的共產黨員採取接二連三的發言來奪取議題的戰術這個因素，但是即使如此，毛澤東在國民黨大會上加入了這一戰術也是值得注意的。

和汪精衛之間的友誼

這時候國民黨的上海執行部有好幾個部門，其中一個部的部長就是汪精衛。孫中山和汪精衛都很看重毛澤東，大會結束後，就讓他擔任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中共中央也效仿國民黨，設置了組織部、宣傳部等部門，而毛澤東則擔任了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部長一職。

國共合作一開始雖然還算順利，但是國民黨右派還是非常討厭共產黨員，特別是針對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任職的毛澤東的活躍做出種種刁難。毛澤東因積勞成疾，在1924年12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毛離開沒多久，孫中山就於1925年3月去世。

失去了孫中山後，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龜裂再也難以被壓制，1925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遭到暗殺遇害。廖仲愷正是後來在毛澤東指揮下進行間諜活動的、操一口流利日語的廖承志之父，也是孫中山的好友。

國民黨左派失去了領袖孫中山和廖仲愷之後，絕對不允許共

產黨存在的國民黨右派勢力開始抬頭。其代表就是蔣介石。

然而國民黨左派還有元老汪精衛在。汪精衛在孫中山亡故之後，擔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一職。

實際上他這個主席背後也有共產國際的黑手。共產國際一開始就做出了在國民黨內部分出左派和右派，讓左派和右派之間在主義上分裂的安排。這也是讓國民黨內部發生分裂的作戰。其結果就是，這時候國民黨內主要職位都由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員所擔任，一步步地實施共產黨鳩占鵲巢的戰術。

1925年，毛澤東從湖南回到廣東之後，被汪精衛任命為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汪精衛因為擔任主席職務太過繁忙，無法兼顧宣傳部長的工作，就把這個職位讓給了毛澤東，這是多麼奇妙的錯位現象啊。毛澤東在和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攜手的同時，也著手進行國民黨政府的宣傳工作。

後來成為日本傀儡政權主席的汪精衛，對毛澤東好像對弟弟一樣疼愛，兩人的關係非常的好。汪精衛生於1883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正好相差了10歲。而這期間兩人的交情，正是後來汪精衛傀儡政權和毛澤東之間的同謀的基礎，希望大家記住這一點。

蔣介石的直覺

1887年生的蔣介石，於1906年在河北保定軍官學校接受軍事教育，1907年被選送到日本東京振武學堂接受訓練後，於1909年加入了日本陸軍。一直到1911年為止都在陸軍第十三師團高田聯隊的野戰炮兵隊（新潟縣）任職。而孫中山來到日本也正是在這段時間。知道孫中山前來，蔣介石從新潟來到東京去拜見孫中山，對孫中山所提倡的中國同盟會深表贊同，表示要在軍事上支持孫中山。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回國參加了革命。

此後他和孫中山之間的關係複雜。孫中山缺少軍事力量，所以重視蔣介石，然而他又非常信賴蔣介石的競爭對手陳炯明，於是便導致孫中山和蔣介石之間出現了嫌隙。然而就像蔣介石所警告的一樣，陳炯明最終對孫中山舉起了反旗，孫中山才終於注意到蔣介石的重要性。

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去莫斯科觀摩蘇聯紅軍的軍事體制，一看之下，反而激起了蔣介石對共產黨強烈的警戒心。共產國際非常歡迎蔣介石，反復地勸誘他加入共產國際。並且蘇聯雖然嘴上說著“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蔣介石卻在視察中感覺到其無時無刻不流露出對中國領土的野心。

蔣介石對蘇聯是否真的打算幫助國民黨建立自主獨立、三民

主義的國家產生了疑問。

他看穿了共產國際只是嘴上說得好，心裡打著是利用國民黨來壯大中國共產黨的算盤。這時候蔣介石就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背後的共產國際，產生了寄生蟲、寄居蟹的印象。

蔣介石的直覺比孫中山更為敏銳。

蔣介石回國後，馬上對孫中山報告了共產國際的危險性，然而孫中山卻認為其顧慮過分。

事態已經無可挽回，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在廣州召開。並且在不經意之間，危險的共產國際代表已經受孫中山的邀請，擔任了國民黨的最高顧問。

而在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之後，蔣介石對共產黨越來越不信任。蔣介石也出席了大會，然而卻沒有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及其候補委員。不過，這場大會上決定成立國民黨革命軍，並設立為其培養軍事人才的軍官學校，而蔣介石則被委任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並兼任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及廣東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儘管中間經歷了一些波折，1924年5月3日，蔣介石還是當上了設立在廣州的黃埔軍校校長。共產國際在黃埔軍校召集學生的時候出手，把周恩來、葉劍英等，為共產主義政權所培養的骨幹分子送入了黃埔軍校。蔣介石費盡心力建立的黃埔軍校，就這樣

被共產黨員所佔據，更加激起了蔣介石的警戒之心。

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已經如同一張廢紙。比起孫中山的樂觀，反而是蔣介石的警覺更準確地預見了事態的發展。而國共合作也漸漸分裂成汪精衛的政府、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和中共的勞動階級三塊。

1925年5月30日，發生了後世稱為“五卅運動”的勞資糾紛。以上海某日資製棉公司的勞資衝突中共產黨員的工人的死亡為契機，對列強在租界行為產生的不滿迅速爆發，並擴散到全國各地。而北洋軍閥及其背後的日本軍對運動進行鎮壓，更導致發展成全國500多處、超過25萬勞工的罷工活動。

五卅運動後的1925年9月，在湖南的毛澤東來到汪精衛主席身邊並擔任宣傳部代理部長這一職務，並且在1926年1月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繼續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蔣介石則被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成為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槍桿子裡出政權。這是中國歷史上不變的規律。共產國際對蔣介石掌握軍隊產生了警惕。共產國際的目的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共產主義政權，並且在中國也紮根下去。而蔣介石則成為了莫斯科達成其野心的障礙。

這時候爆發了中山艦事件。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如此描述當時的情況。

……(民國)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我(蔣介石)從潮汕回到廣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張。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Kissarka)忽在軍校會議中，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知道他們的計畫，就是要在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其詳情在緊急逮捕李子龍之後才被發現，同時也明白了背後主謀是季山嘉。

中共方面的資料認為綁架是蔣介石捏造出來的，但是蔣介

石在自己的著作中是這麼說的，同時在其日記中也有著詳細的記錄。

汪精衛因為蔣介石沒有通過軍事委員會而獨自發起了中山艦事件而對其抱有不滿，蔣介石則向汪精衛請罪，表明如果自己沒有連夜先下手為強的話就已經被綁架了，並且於3月23日以蔣中正的名義向軍事委員會提交了要求處分自己的報告，卻沒有受理。這一天，汪精衛也銷聲匿跡了。

對相信共產黨的汪精衛來說，中山號事件造成的打擊十分巨大。

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整理黨務案》的提案，並獲得了通過。根據這個提案，共產黨員無法在國民黨執行部門裡擔任部長級以上的職位。

當時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和毛澤東等共產黨員一起反對蔣介石，並把政府搬到了武漢，但是因為《整理黨務案》獲得了通過，毛澤東於1926年5月25日卸任了國民黨宣傳部長代理的職務，並和曾經關係良好的汪精衛被迫分開。受到重大打擊的汪精衛秘密離粵赴法養病去了。

另一方面，上海也發生了多起工人武裝起義。

1926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的時候召開了勞動者大會，其人數達到124萬人。同年10月23日在上海爆發了工人的武裝起

義，並且在 1927 年 2 月 22 日和 3 月 21 日連續舉行了三次起義。

1926 年 6 月 15 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於同年 7 月 4 日宣布開始北伐，並且於 1927 年 3 月 24 日進入南京。這時候突然發生了南京民眾襲擊包括日本在內外國領事館和居民的事件。也就是“南京事件”。這是共產國際為了嫁禍蔣介石的陰謀。而看到這些動作之後，蔣介石認識到中共勢力想要奪取政權，所以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發動了“四一二”事件，這是用武力肅清中共勢力的行動，而中共一方和勞工組織則遭到慘敗。

毛澤東深感中共在軍事力量的不足，同時認識到不光要動員工人階級，還要團結中國人民中最多的農民階級才行。這也是毛澤東的武裝鬥爭和“以農村為根據地”戰略的開端。

蔣介石的苦惱和皇姑屯事件

在分析毛澤東戰略之前，需要先看一下蔣介石的苦惱和日本的舉動。

1927 年 7 月，一直和中共協力的國民黨左派汪精衛的武漢政府，在得知中共背後有共產國際，中共不過是蘇聯野心的傀儡之後，突然和中共斷絕了關係。儘管如此，卻無法拋棄和中共一樣的“打倒蔣介石”的口號。

蔣介石的夢想是消滅軍閥割據，建立統一的中華民國，實現民族的獨立。僅僅如此。

1926年7月4日蔣介石宣布北伐，對日本來說，中華民國越亂越好，軍閥被消滅則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在1927年5月，強硬派的田中義一首相強行第一次出兵山東，名義上是為了保護日僑安全，實際上是和中國軍閥勾結，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為阻止北伐成功。因為日本出兵山東的緣故，蔣介石於1927年6月23日停下了北伐的步伐，並駐守南京，第一次北伐結束。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策劃了南京事件之後，打出了“推翻蔣介石”的口號，並於同年8月1日在江西省南昌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動了武裝暴動，這就是“南昌起義”，8月1日這一天也被定為中共的建軍節（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上的“八一”二字便源於此）。起義軍一開始並沒有採用中國共產黨的名義，而自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吸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等國民黨內部的兵力。也充分利用了當時擔任南昌公安局長的朱德（共產黨員，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國家副主席）的地位——不愧是“寄居蟹作戰”。

為了實現孫中山的理想一直努力的蔣介石，也因這件事心灰意冷，於同年8月13日宣布辭職回到故鄉。並且周遊世界來擴展自己的眼界，首先訪問了日本，並且和田中義一首相進行了會談。

然而，他因為田中首先對中國強烈的侵略野心而失望，並且中國國內也有許多人邀請他返回政界，所以在 1928 年 1 月重新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並且一鼓作氣準備完成北伐。田中內閣於同年 4 月及 5 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兵山東，而蔣介石則一邊對抗一邊繼續北伐，終於將奉系軍閥的首領張作霖逼到了絕境。6 月 4 日，張作霖避開和蔣介石北伐軍的戰鬥從北京撤退。看上去北伐也到此大功告成。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皇姑屯事件”。

這天，在從北京返回奉天（現遼寧省瀋陽）的列車上，張作霖被炸彈炸死。奉系軍閥本來就是日本所扶植的。然而蔣介石北伐的攻勢凌厲，英美所扶植的直系軍閥被消滅後，張作霖從日本倒向美英，和歐美諸國，特別是美國急速接近。

該拿這張作霖怎麼辦呢？當時日本的田中義一內閣和關東軍之間發生了分歧。田中內閣主張保留張作霖，而關東軍則打著“建立滿洲國”的算盤試圖幹掉張作霖。

儘管美國和田中內閣都認為炸死張作霖的是關東軍，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說是共產國際陰謀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由俄羅斯的歷史作家多米特里·波羅赫洛夫所提出）。田中義一因為這件事情引咎辭職。皇姑屯事件影響深遠，也是後年的“九一八”事變的原因之一。

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在得知父親被日軍害死之後，決定和國民黨的蔣介石進行合作。此後，蔣介石的北伐終於大功告成，而國民黨也算是統一了中國。

國民黨所建中華民國政府的正式稱呼為“國民政府”，本書中有時會稱之為“國民黨政府”。隨著時期不同，國民政府的所在地也有所變動，除開1940年日本扶植的汪精衛政府（南京）以外，有廣州政府（孫中山，1925年～25年）、武漢政府（汪精衛，1927年、1937年～38年）、南京政府（蔣介石，1927年、1937年～38年）、重慶政府（蔣介石，1937年～46年），以首都所在地來區分不同的政府名。

一山不容三虎——在井岡山的大規模殺害

1927年8月7日，中共在湖北省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深深反省中共缺少武裝力量的問題，而定下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念，並且提出了軍隊要掌握在黨的手中的“黨指揮槍”的基本方針。這場會議被稱為“八七會議”。

現在的中國軍隊還是歸黨所指揮。中共中央委員會下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其主席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任。現在的習近平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同時，也兼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其間雖有波折，這個基本方針從 1927 年的“八七會議”上確立以來，近 90 年沒有改變過。

這時候中共還完全沒有掌握軍事力量，卻也在各地舉行武裝起義和國民黨軍進行作戰。毛澤東於 1927 年 9 月 9 日中秋節率領超過 5000 名工農革命軍舉行了秋收起義，並以失敗告終。10 月，帶領約千名敗軍逃到江西省臨近湖南省的井岡山上打算躲起來，然而井岡山上已經有了“山上的規矩”。

這裡過去長期有“山大王”，現在有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袁文才，擔任了寧岡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另一人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兩人互相呼應管理著井岡山。在險峻的山中有水田和村莊，靠農村經濟來維持軍隊的開銷，時不時下山劫富濟貧。他們本來是土匪馬刀會出身，勇猛果敢無出其右，又講義氣幫助窮人，在當地有相當的社會基礎，許多群眾擁護他們。

工農革命軍要在井岡山落腳，不得到這兩位“山大王”的允許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兩位並不認識毛澤東，對這支外來部隊抱有戒心。然而在毛澤東熱心的遊說下，兩位終於同意和工農革命軍進行合作。“山大王”終於點了頭，讓毛澤東等人進入了井岡山。

如果這時候沒有講義氣的“山大王”的許可和支持的話，中國也就不會有“毛澤東”這號人物了吧。當時的他已經無路可退，

能夠在井岡山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據地，是因為袁文才和王佐已經在那裡建立起了根據地，是離不開這兩位的幫助的。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作為毛澤東最早開闢的革命聖地，有許多電視連續劇、電影、芭蕾舞對其進行描寫，在中國有著很高的評價。然而在其背後，實際上有著謎一般的殺害上萬戰友的大肅反。之所以鮮為人知，大約就像很多中國歷史學者所說的一樣，是因為其真正的執行人正是毛澤東吧。

在中共黨史中，把罪責推給了“黨內有 AB 團間諜偽造情報”。“AB”是“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的簡稱，1926 年 11 月，蔣介石為了北伐來到南昌，卻發現國共合作中共產黨掌握的軍事力量完全佔領了南昌，於是為了打敗他們而成立了這個組織。

1930 年 2 月 24 日，本是革命大恩人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被毛澤東當作 AB 團的間諜處決。

為什麼？因為一山不容二虎。

因為害怕兩人部下的報復，於 1930 年春開始，全部將他們處決。而在這年年末在江西省富田發生了反對虐殺的兵變。反對者喊著“打倒毛澤東”的口號，史稱“富田事變”。

國民黨建立的真正的 AB 團，是從 1927 年 1 月開始，只活動了 3 個月就在 1927 年春天結束了活動——因為 4 月 12 日發生了“四一二事變”，不再需要靠 AB 團了。而在其結束活動 3 年後的

1930年，AB團居然在中共組織內部潛伏有上萬人！這完全是天方夜譚。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承認了袁文才和王佐是“殺錯了”，卻若無其事地沒有承認是誰殺了他們。也許是因為心中有愧，所以才對袁文才的遺孀表示了悼念之意。

而到1993年，富田事變發生地的中國共產黨江西省委員會黨校黨史研究室主任戴向青教授發表了揭開富田事變真相的論文，並於1994年和羅惠蘭一起出版了《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因為是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出版，本書中充滿著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最後以“富田事變是冤案”做結。1999年，南京大學教授高華撰寫了相關論文，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明確地指明了“當事人是毛澤東”。這也是因為在香港出版，所以才得以實現吧。在這之後，“當事人是毛澤東”為大家所接受。而在日本，則有《中國一直隱藏的毛澤東的真實（中国がひた隠す毛沢東の真実）》（北海閑人著、廖建龍譯，草思社，2005年）等書，對AB團有詳細的描述，明確寫到“當事人是毛澤東”。

高華等的結論是，毛澤東為了穩固江西蘇區，為在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政府打下權力基礎而實施了這一連串的殺戮。很難想像袁文才能成為毛澤東的競爭對手，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毛澤東

當時缺少權威，和共產國際關係也不大好，為了讓自己更加醒目的緣故，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自他戒心太過強烈的弱點。袁文才講義氣幫助窮人深得人心，這也是毛澤東自許的理想形象，他很難容忍有他人匹敵，袁文才這些品質，反而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寫到，有1萬多黨員和人民遭到殘酷殺害（498頁）。

在俄國歷史學者亞歷山大·潘佐夫、梁思文所撰寫的《毛澤東 真實的故事》裡，也有目擊者的如下證言（264頁）。證言中的李韶九是最效忠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

李韶九高喊：“你們應該曉得中農一向可能造反。你們唯一的路就是坦白認罪……黨，毫無疑問會給你們機會改過。”……然後他們被用煤油、燈芯動刑。他們一邊被刑求、一邊被訊問。這不是訊問，這根本就是刑求。他們被追問：“你招不招認加入AB團？你什麼時候加入、它是什麼樣的組織、它有什麼詭計、誰是首腦？從實招來！？如果不招，再加強動刑……同志們的手指被打碎、整個身體點火燒……只聽見受刑人不斷尖叫……他們遭到最野蠻的刑求。幾位領導同志的太太也被捕，包括贛西南黨委書記白芳同志的太太（譯按：李白芳）。他們被動刑、剥光衣服、用尖器打臂膀、全身點

火、燙陰戶、用刀子削下乳房，這些不人道的刑求，光是講，都讓人戰慄。所有被捕的人，不論是否被審問，都手腳捆綁起來。衛兵上刺刀、持長槍，將他們團團圍住。士兵們上刺刀時，大家都不敢出聲。被捕的人被餵吃殘羹剩飯……有五十個人被拉出去處決。

連根據共產國際的內部資料撰寫的《毛澤東 真實的故事》也寫到毛澤東扮演了主要角色。

而在這一系列事件之中，毛澤東學會了靠恐怖來統治的獨裁帝王的手法。不是打倒敵人（日軍），而是對中華民族舉起屠刀，特別是不斷地將對革命做出貢獻的共產黨員、革命同伴處以極刑來維持自己的權威，這一手法貫穿了他整個生涯。

靠著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一戰略，毛澤東在農村擴大了勢力範圍，不斷推進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農的土地革命。當時的中國的貧民就像農奴一樣，反抗地主就難保性命，而知道這一點的貧農們，已經沒有了退路，只能加入中共的軍隊。字面意義上的“拼命”，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利用恐懼的心理吧（筆者稱這種心理為“大地的心理陰影 (trauma)”）。關於這一點，將在第七章的“歷史認識”部分進行詳述）。

建立“國中之國”

這時候，全國範圍內有 10 多個以中國共產黨軍為中心的蘇區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的時候，共產國際打著自稱“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寄居蟹算盤，試圖吸收國民黨左派人士，漸漸地，就暴露出其本性，要求“自稱蘇維埃”，並且命令把軍隊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從宿主中脫出，把紅色放在了前面。中國工農紅軍簡稱紅軍，成為後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與核心。1930 年 2 月，定下了在江西省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草案。按照蘇聯，也就是莫斯科共產國際的命令，在中華民國中建立奉共產國際為領袖的共和國。其方案十分詳細，從共和國的紙幣和進行經濟活動的銀行，到軍隊和警察，以及醫院和學校，包括了所有行政、社會生活方面。

建立國中之國——並且是接受蘇聯共產國際所管轄的國家。

在中華民族需要統一的這個時刻，能夠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嗎？蔣介石馬上試圖殲滅紅軍，於 1930 年 12 月對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圍剿。

第一次圍剿派出了國民黨軍的 10 萬兵力。然而卻沒有殲滅紅軍——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

1931 年 4 月，第二次圍剿派出了 20 萬兵力，給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卻依然沒有殲滅。蔣介石太輕視紅軍的實力，所以失

算了。雖然後來毛澤東和共產國際之間爆發嚴重衝突導致關係惡化，但是當時的中共還是獲得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共產國際當初打算讓國共合作，由中國人代替蘇聯打敗蘇聯真正的敵人日本，這是從俄羅斯帝國開始延續下來的另一個野心，但是國共合作破裂，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中國國內建立共產主義國家，因此也在一直在向中共提供武器支援，朱德的紅一方面軍也大展身手。

同年7月，蔣介石派出30萬兵力進行第三次圍剿，來勢兇猛。紅軍終於還是受到巨大打擊，毛澤東也被迫身先士卒進行苦戰。進入9月之後，蔣介石再次增派了20萬兵力，總數達50萬兵力，打算把紅軍徹底殲滅。

就差一步。有些紅軍部隊被逼到絕境，必須逃跑。然而就在這個當口，第三次圍剿作戰進行中，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紅軍得救了。日軍把紅軍從毀滅的危機中救了出來！

被“九一八”事變所“救”的紅軍

1931年9月18日，日本陸軍部隊之一的關東軍，在奉天（現遼寧省瀋陽）郊外的柳條湖，炸毀了南滿洲鐵路。關東軍是日俄戰爭後，為保護從清朝奪取的關東州（遼東半島）的權益而設置的關東總督府的守備隊，之後滿洲的日軍也被統稱為關東軍。

關東軍說這場爆炸是中國（張學良所率領的東北軍）幹的，並以此為藉口向瀋陽進軍，打算一鼓作氣把整個滿洲地區收入囊中。第二年扶植愛新覺羅·溥儀為執政，建立了偽“滿洲國”（溥儀於1934年登基，就任偽“滿洲國皇帝”）。當時日本政府雖然主張不要在中國進行擴張，卻沒有足夠的實力來阻止軍部的獨斷專行。

關東軍打著“保護滿洲日僑的安全”的口號，而當時正處於大蕭條之際的日本國民輿論也支持他們的行動。日本的意圖，定然也包括佔領滿洲一帶作為蘇聯南下時緩沖地帶的因素。特別是在滿洲有俄羅斯帝國鋪設的東清鐵路，包括橫貫滿洲北部的幹線和在中間哈爾濱向南經長春到不凍港旅順大連的南滿洲支線。甲午中日戰爭後，進行三國干涉的俄羅斯與當時清王朝的李鴻章之間締結了《中俄密約》，東清鐵路是按照本密約所鋪設的鐵路。之後日本贏得了日俄戰爭，俄羅斯被迫於1906年轉讓南滿洲支線的所有權給日本，而日本則建立了南滿洲鐵道（滿鐵）公司，把滿洲一帶變成了半殖民地。而軍部的計劃則是把整個滿洲納入囊中，來阻止蘇聯的南下（1935年橫貫東西的東清鐵路幹線也歸了日本所有）。

“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介石立刻以中華民國的名義在國際聯盟對日本提起訴訟。1932年10月李頓調查團提出調查報告，並在

國際聯盟獲得通過之後，日本為表抗議於 33 年 3 月退出了國際聯盟。日本為國際聯盟支付了大量的資金，而國際聯盟卻成為了批判日本的一方，日本國民對這一點十分不滿，故對退出國聯的行為拍手喝彩。而由於提議建立國聯的美國也沒有加入國聯，更導致了國聯的威信不足，而失去了枷鎖的日本則進一步滑向與中國的戰爭。

得知“九一八”事變的消息的時候，蔣介石正在江西南昌進行第三次圍剿。中共正是試圖在江西省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如果不在這裡徹底殲滅中共的紅軍，就無法實現孫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遺志，蔣介石是為了實現孫中山的革命夢想而進行的圍剿。

打破這個夢想的正是日本關東軍。

如果當時日本政府能夠阻止軍部“暴走”的話，那麼日本的鄰國就將是中華民國，而不是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了吧。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由共產黨所統治的國家誕生的，正是日本軍部和沒有能制御軍部的日本內閣。

毛澤東和共產黨軍隊在聽到“九一八”事變之後高聲歡呼。

這樣就可以按照原定目標，建立由共產國際所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了。這時候，毛澤東為掌握黨內權力的富田事變還沒有畫上休止符。毛澤東正處於擁有強大軍事力的蔣介石國民黨

軍和黨內權力鬥爭的兩面夾擊之中，瀕臨絕境。

和本書的序言中所寫的一樣，毛澤東在戰後（1956年）會見舊日本軍人遠藤三郎時所說的：“是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這番話中的對日本的感謝，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吧。

儘管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但是中共卻好像並不在意這件事，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正式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建立了臨時政府。毛澤東被選為臨時政府的主席，就是靠著他在井岡山的“功勞”，這就是殺害了大量同伴所造成的效果吧。中國被日本侵略，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傀儡政權偽“滿洲國”，而毛澤東卻並不在意中華民族所受的屈辱，而把紅色政權的建設放在第一位。

而另一方面，蔣介石則把中華民族放在第一位，在9月22日的演講中稱“日本敢於公然侵略，實在已視我國民如無物，深可痛心”，“值此民族根本存亡之關鍵之今日，必能一致奮起，共救危亡”。

然而在國內有中共這一內憂的情況下，無法專心和日本進行作戰。如果專心抗日，則會給中共以趁機攻擊國民黨的機會。中共的立身之本是蘇聯共產國際。如果讓共產國際支配中國，變成

蘇聯斯大林所掌控的國家的話，中華民族將會變成蘇聯的附庸，中華民族的驕傲將永遠的被踐踏。所以才“此刻暫且含忍，決非屈服”，蔣介石向國民呼籲“攘外必先安內”。

1934年冬，蔣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之前，曾於病榻中口授陳布雷一文，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題目是：“敵乎？友乎？”，記載了蔣介石這時候對日本的想法。現列舉其中一部分要點如下。

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亦終究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這就是世界大勢和兩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徹底打算的結論。我想日本人士中懷抱同樣的見解的，當亦不在少數。

一方面，因為日本欲遂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面，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之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為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經略滿蒙。

我們在革命期中的國家，與通常國家完全不同，其要素則為“主義、領袖與群眾”。……只要主義普遍深入，領袖健全存在，群眾一致擁護，一時政府的成敗或土地的得失，轉成為次要問題。……日本人以為軍事行動繼續進行，國土日蹙，中國便不能生存，豈知革命期中之國家，不可以尋常國家相視。

日本如果能夠放棄侵略行動，還是希望和日本恢復友好。日本沒有方法消滅中國的存在。

其分析十分透徹。

另一方面，中共卻利用蔣介石艱難的立場，自己不和日本作戰，卻抓住蔣介石沒有馬上和日本作戰這一點，宣傳蔣介石是賣國賊，打出“只有共產黨才是抗日”的口號，煽動輿論。

可以注意到，在蔣介石殫精竭慮地思考中華民族的問題的時候，毛澤東卻把“九一八”事變看作絕妙的機會。對毛澤東來說，重要的不是中華民族而是中國共產黨，而是“誰來奪取天下”的問題。

蔣介石按照“此刻暫且含忍，決非屈服”的信條和“攘外必先安內”的承諾，優先進行“安內”，於1932年6月展開了第四次圍剿作戰。然而第四次圍剿也因為日本入侵熱河省，不得不與之進行對抗而失敗告終。

內心深處對共產國際的憎惡

而讓局勢變化的則是中共分裂的浮上檯面。

毛澤東的基本戰略是不進行大規模正面戰鬥的游擊戰。而

掌握著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王明等蘇聯組則主張正面出擊。共產國際批判毛澤東的游擊戰術只是退卻和逃跑，將毛澤東看成是《水滸傳》中那樣的農民反叛者，並且讓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了人民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系統的留蘇派博古則將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中文名李德)，奉為共產國際給中共派來的軍事顧問，對他言聽計從。

毛澤東如此輕而易舉地被剝奪了權力。

這時候起毛澤東就從心底對共產國際產生了微妙的憎惡。而到了延安之後其對王明的殘忍的迫害更是駭人聽聞。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其紀實書籍《延安日記 1942 ~ 1945》中有著詳細的描寫。毛澤東雖然不得不表現得好像聽從共產國際一樣，心中卻十分討厭蘇聯。

在此列舉一下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初期稱為中共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等)這一中共領袖：

- 陳獨秀(1921年7月~1927年8月)(日本留學，成城學校)
- 瞿秋白(1927年8月~1928年7月)(莫斯科東方大學助教授)
- 向忠發(1928年7月~1931年6月)(留蘇，共產國際代表)
- 王明(1931年6月~1931年9月)(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

共產國際代表)

●秦邦憲(1931年9月~1935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期間的代理)(別名:博古,蘇聯留學)

●張聞天(1935年1月~1943年3月)(莫斯科中山大學,曾任教授)

●毛澤東(1943年3月~1976年9月死去為止)

讀者會發現,毛澤東登上中共中央權力頂峰,耗費了極長的時間。而在他最終執掌中共大權之前,中共黨魁都是日本人乃至中國一般民衆不太熟悉的名字,全都是共產國際所任命的。

毛澤東在心中對把自己看成“鄉巴佬”的共產國際充滿了厭惡。毛澤東知道當時蘇聯的領袖斯大林嘲笑自己是鄉下土包子、人造黃油。特別是,只要留意上面名單後括號裡的說明即可看出,除了毛澤東以外,全都是留學海歸人士,並且基本上都是曾在莫斯科深造。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28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自以為是精英的集團,王明、張聞天、博古等人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毛澤東究竟有多麼討厭蘇聯(特別是共產國際),多麼從心底憎惡知識分子,只要看這個名單就可以想像了吧。這也可以列為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之後、徹底迫害知識分子的原因之一。也許比

北京大學圖書館所受的屈辱更加影響深刻。

這時候軍事顧問李德和博古放棄了毛澤東的游擊戰術，而提倡“短促突擊”的陣地戰。

然而，在改變戰術之後沒多久，瑞金蘇維埃政府就輕而易舉地被國民黨軍所摧毀。紅軍中有數支番號為“第×方面軍”的軍隊，在各方面軍中又有很多“紅×軍”。雖然《毛澤東年譜》中記錄了許多按軍隊系列動身轉移的日期，但是至少確實的是，毛澤東等人是跟隨在瑞金的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0月18日最終離開了瑞金。

毛澤東和紅軍放棄了瑞金蘇維埃政府，開始了一個勁地逃命。留在這裡的話大家都難保性命。這就是中共後來稱之為“偉大的長征”的戰略轉移的開始。蔣介石對此一定十分後悔：當國民黨軍殺到瑞金的時候，瑞金蘇維埃政府中已經空無一人，毛澤東等人已經揚長而去。

然而，戰爭還沒有結束。

第三章

利用抗日戰爭

——西安事變和國共合作

日本軍鴉片政策幫助長征成功

圍繞綁架蔣介石的陰謀

“百分之十對日作戰”

毛澤東是怎樣看待“南京大屠殺”的？

日本軍鴉片政策幫助長征成功

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所率領的江西省瑞金蘇維埃政府的約10萬名紅軍被稱作“紅一方面軍”。此外還有四川省和湖南省的紅四方面軍等武裝散落在各地，都接到共產國際的指示，向西再向北開始逃離。

長征結束後統計，其距離為一萬兩千五百公里。這支軍隊是徒步逃離。

毛澤東等人後來雖然稱這場大撤退為“北上抗日”，然而逃到西北的山溝裡，指望的是國民黨軍不再追過來。這種偏僻地帶，連一個日軍也沒有——跑到離日軍最遠的地方，究竟要怎樣“抗日”呢？

這時候的“抗日先遣隊”共有6000多名紅軍士兵。其中的倖存者，先遣隊的軍團參謀長粟裕（中共建政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在其回憶錄《粟裕戰爭回憶錄》（粟裕著、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中，寫到自己也不知曉抗日先遣隊的目的。他在書中寫道：“後來我們才知道，當時中央派出這支部隊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圖以這一行動威脅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並沒有抗日的因素。就連先遣隊的參謀長粟裕也不知道逃亡的目的地，其他的紅軍領導人在描述長征的時候，也是用逃亡、征西、退卻等詞彙，

並沒有包含“抗日”的因素。但是作為宣傳的一環，則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文件，印刷了《一致對外——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等大量傳單，總數達 160 萬份以上。中國人民相信了這些傳單。

來自共產國際電文的內容是逃向沒有日軍的西北部。甚至有著實在不行的話就逃到蘇聯去的計劃。所以逃跑的時候不光帶著武器，還帶上了無線電和印刷機等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絡用的工具。逃跑彈盡糧絕，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逃走途中都有著躺在追隨的農民所扛的擔架上的時刻。

國民黨政府軍沒有放棄追擊，在湖南、貴州、廣西等地配置了軍隊繼續進行圍剿。但是毛澤東逃到深山老林之中，利用險峻的地形和國民黨軍周旋，終於讓國軍功虧一簣。儘管如此，對紅軍的打擊也是難以估計的。

終於跑到國民黨政府軍兵力稀薄的貴州省遵義縣的時候，10 萬紅軍已經只剩下了 3 萬 5 千人。

從 1935 年 1 月 15 日到 17 日，在一座佔領的樓房內舉行了“遵義會議”。

雖然也有紅軍要休整一下的理由，但是對毛澤東來說，想必也有要盡快和來自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進行鬥爭一較高下的意圖。在遵義會議上，批判了按照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陣地戰的失敗，

共產國際派來的布爾什維克喪失了權力。在會上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體制，形成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的新三人團體制。而周恩來則因為反省自己贊同共產國際路線而導致被迫放棄瑞金政府的錯誤，決心讓出自己在軍事委員會的職位並督促讓毛澤東任軍委的指揮。其結果就是，毛澤東被增選為政治局常委，參加中央軍事指揮的領導工作。因為參加遵義會議的黨幹部並不是非常的齊全，所以也不是沒有黨員質疑本次會議的合法性，但是不管如何，掌握了實權的毛澤東獲得了勝利。

在遵義休整之後，紅軍再次向西北出發。毛澤東打算和在四川省建立蘇區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有7萬兵力，根據《蔣介石秘錄》（日文）第11卷19頁所載，紅四方面軍得到共產國際通過空運的武器援助，擁有較強的戰力。

兩軍會師之後，紅軍將會變得更強大。國民黨政府軍想盡一切辦法試圖阻止這次會師，從四川省和湖北省對紅軍進行夾擊。蔣介石自己坐鎮四川進行指揮，而湖北省武昌行營則由前東北王張學良統領。

毛澤東知道四川省有蔣介石軍隊嚴陣以待，所以突然放棄北上，從貴州向南進發。貴州省和雲南省一樣是鴉片的黃金三角地帶。蔣介石雖然從重慶坐軍機飛抵貴州，但是毛澤東更加技高一籌。國民黨的貴州軍多吸鴉片，軍隊紀律渙散。紅軍持有為了接

受共產國際指示的高性能無線電台，被鴉片毒害的貴州軍錯誤地發出了能被紅軍截聽和破譯的密碼通信，國民黨軍的情報洩露給了紅軍。毛澤東躲過追擊，成功地逃到雲南省。

說到鴉片，自然就是由英國帶到中國引發 1840 年鴉片戰爭的那個鴉片，而在這之後，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的時候，也有組織地實施了鴉片戰略。東條英機和岸信介等人轄下有毒品特務機關（裡見甫的“裡見機關”等），以當時的熱河省為起點，在天津和上海，以及貴州、雲南等地都有很大的影響力。其詳情可以參見千賀基史所著的《鴉片王一代》（阿片王一代）。按書中所載，命令裡見甫“把鴉片掌握在關東軍手中”的，正是當時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少將和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這兩位。

筆者的父親當年就是為了治療鴉片在中國蔓延的中毒患者而來到中國，然而偽“滿洲國”雖然允許父親製造他發明的治療鴉片中毒的藥物，卻不讓父親進行宣傳。這是因為日本私下裡在中國推銷毒品來獲得巨額活動資金，卻又在表面上打著“滿洲國正在實施麻藥斷禁計劃”的旗號（詳情請見筆者的《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中文版一書）。

毛澤東一直都在閱讀各種新聞書籍，其情報量的豐富無以倫比。而且在龐大的情報中挑出有用的情報的直覺也十分敏銳，因

為他總是帶著問題去看情報。在捕捉秘密情報和民間情報方面也十分擅長，能夠利用這些情報，在危機中抓住一線生機，實在是令人欽佩。

這時候向貴州、雲南的戰略性南下，對於這場決定未來天下歸屬的戰爭，說是決定性的轉折點，也不為過。如果沒有立刻做出南下的決策的話，紅一方面軍就會在這裡被國民黨所殲滅吧。而從毛澤東的立場來說，他又被日軍（的毒品政策）救了一命。

儘管如此，當毛澤東終於和他所期待的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時候，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已經只剩下1萬餘人，傷痕累累身心俱疲。

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在看到這一切之後，居然對毛澤東等人表示了蔑視。並且批判遵義會議是不合法的。二人的分歧不僅如此，張國燾主張繼續南下，而毛澤東則打算北上前往陝西省西北部。因為國民黨軍難以追到陝西省西北的黃土高原，在《毛澤東年譜》1935年9月10日的記錄裡也寫道，中共中央發出了《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同日毛澤東指示“迅速北上，創造川陝甘新蘇區去”。9月12日，他說“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10天之後的9月22日，毛澤東從舊報紙上讀到陝北也有紅軍的新聞報道，知道了陝北有劉志丹和習仲勛。

習仲勛是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和劉志丹早早

就以延安一帶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快要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時候，習仲勛和劉志丹等人被王明一派的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等人逮捕入獄，馬上就要被處決。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毛澤東馬上要求釋放，習仲勛等人才得以活命。所以當 1935 年 10 月 20 日左右，遍體鱗傷的毛澤東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之後，習仲勛則對其伸出援手，並且一生都效忠於毛澤東（儘管如此，習仲勛還是在文革前被康生巧妙地陷害，文革中更一度被批鬥、被監護，失去 16 年的自由）。

要確定毛澤東到達陝甘蘇區的準確日期非常困難。因為西北革命根據地橫跨陝西省西北部和甘肅省，形成了陝甘蘇區，而毛澤東在到達這個革命根據地之後，為了尋找更好的地點還在繼續移動。按照《毛澤東年譜》中所記載，到達的時間是從 1935 年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上旬之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在出發前所率領的 10 萬中央紅軍，在到達的時候已經只剩下幾千人。而整個紅軍也從長征前的 30 萬人銳減到長征後的兩萬五千人左右。初期是在國民黨之間的戰鬥中喪命，途中還有飢餓和疲勞及逃走造成的減員。而紅二方面軍及紅四方面軍的一部分全部到達延安的時候，則是約一年後的 1936 年 10 月 22 日。長征被視為到此徹底完畢。

習近平現在把自己定位為“延安人”，假借毛澤東的威信，打

算回歸毛澤東路線，就是源自於此。

此後，張國燾在 1937 年 3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到批判，於 1938 年 4 月離開延安投靠國民黨，4 月 18 日被開除黨籍，在國民黨的間諜機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BIS）從事反共間諜活動。

圍繞綁架蔣介石的陰謀

在貴州因為軍隊鴉片中毒導致情報洩露，讓毛澤東再次逃走，蔣介石卻依然沒有放棄對中共的圍剿。

1936 年 2 月，毛澤東雖然在陝西省北部的山溝裡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卻因為缺乏糧食，打著“抗日東征”的旗號向山西省的農村出擊，而蔣介石則派出山西、陝西兩省的國民黨政府軍迎擊。張學良正是當時西北剿匪副總司令。

國民黨政府軍對紅軍作戰，造成了紅軍約 3000 人死傷，劉志丹也在戰鬥中身亡。紅軍在掠奪了山西農民的糧食之後，於 5 月 3 日遍體鱗傷地回到了陝西。用蔣介石的話來說，“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內）”即可消滅紅軍。

然而這時候卻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蔣介石所信任的張學良卻中了毛澤東等人的計謀，倒向了中

共一方。並且在 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西安發動兵變扣押了蔣介石，逼迫蔣介石“停止剿共、一同抗日”，史稱“西安事變”。蔣介石耗費 8 年時間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統一中華民族的夢想，在還差一步就能實現的時候被粉碎。

讓我們來更詳細地觀察這一段歷史的來龍去脈。

國民政府軍的確對紅軍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張學良也喪失了以最信任的師長和參謀為首的許多部下，損失慘重。張學良的心中產生了“究竟要持續圍剿中共到什麼時候”的疑問。

需要抗擊、消滅的對手應該是日本。與其耗費如此多的生命來打倒中共的話，難道不應該把這力量用來抗日嗎？蔣介石的確是基於“攘外必先安內”的信念，認為必須先消滅國內的反政府分子，並且認為現在的戰力不足以和日本對抗，故而讓我們進行對中共的圍剿。但是，雙方為此而付出的代價令人難以承受。如果能夠讓雙方協力來對抗日本的話，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同室操戈的悲劇呢？

張學良心中突然冒出了這個想法。而毛澤東則抓住了他心中微妙的變化。毛澤東的間諜遍布各地，所以能收集到敵方的各種情報。

歸根到底，長城以北（中國東北）的軍隊和人民大多在日本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後，背井離鄉來到長城以南，心中憋

著一口氣，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他們的悲傷。歌詞中多次出現“九一八”三個字。

毛澤東向東北軍呼籲“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提出一起“抗日救國”。

毛澤東的口號抓住了從東北背井離鄉的人們的心。

呼籲的方法也十分高明。並不是讓共產黨員來直接說服國民黨軍士兵，而是做了一個鋪墊，先讓共產黨人說服人民群眾，不是讓他們加入共產黨，而是以人民群眾的身份把毛澤東等人的想法傳達給國民黨的士兵們。中立人士和救國會出面來呼籲更容易獲得民心——不愧是博覽群書，毛澤東深諳兵法之道。

接下來，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和潘漢年（下一章裡會出現的中共間諜），讓他們來說服張學良。這是第二階段。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周恩來等人的手法也很高明。先稱讚蔣介石將其捧起來。接下來“承認蔣公忠誠為國，要抗日必須擁護蔣公領導”。在這基礎上再提出“一起組建抗日統一戰線，爭取中華民族尊嚴”的建議。張學良為二人的說法所感動，同意了中共的說法，並且向蔣介石提出了國共合作。

蔣介石暴跳如雷。中共的背後是共產國際，如果讓中共得了天下，中華民族將會變成蘇聯的附庸國。中華民族必須保持獨立，

不要被欺騙了。

實際上，在這背後確有著共產國際的黑手。1935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大會，決定“在中國建立廣泛的抗日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並且於8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這就是“八一宣言”。

聽上去很好聽。然而其真實目的卻是讓國民黨政府和日本作戰，並且在之後擊敗戰力被消耗的國民黨軍，以圖建立共產主義國家。這乃是共產國際實際上的領袖斯大林的想法（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實際上是一種東西。都是代表莫斯科的意志）。而按照現在的局勢，國民黨政府勢力強大起來的話，中國將不會誕生共產主義政權。共產國際認為，要用盡一切手段阻止國民黨對紅軍實施圍剿。

筆者曾經為了閱讀收藏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的蔣介石親筆日記而造訪胡佛研究所。不允許複印和拍照，只能把所有物品都存入儲物箱，只能使用胡佛研究所提供的便箋和鉛筆，進行抄寫。能選擇的，只有鉛筆的濃淡。

對出生成長在中國，經歷過解放戰爭，在中共建政後受著毛澤東思想教育的筆者來說，“毛澤東是光榮偉大正確的，蔣介石是在抗日戰爭中不抵抗的賣國賊”的教育，被灌輸到筆者身體每一個

角落——完全是洗腦。筆者一直試圖擺脫其影響而鬥爭，而蔣介石日記則帶給這樣的筆者巨大的衝擊。

其志向之高潔，認真思考國家將來的責任感，從毛筆的一字一句中流露出來，令人深深感動。他是認真的憂國憂民，為中華民族著想。蔣介石在這個時候已經看穿了共產國際的陰謀。

讓國共再次合作，是為了讓國民政府軍不再消滅苟延殘喘的紅軍，並且趁國民黨軍和日本作戰的時候，發展壯大共產黨。他看穿了國共合作就是為了這個目的。這一段在《蔣介石秘錄 11 真相·西安事變》（產經新聞社著，產經新聞社出版局，1976 年）中有詳細的記錄。

需要注意的是，蔣介石在這時候和日本的廣田弘毅外相多次磋商，試圖和日本進行和平會談。他並不想挑起戰爭。廣田外相也宣布了“廣田三原則”，努力試圖實現中日兩國的和平。

在這期間，發生了 1935 年 11 月的中山水兵射殺事件、1936 年 8 月的成都事件、9 月的北海事件、漢口射殺日本巡查事件、上海日本水兵狙擊事件等一系列不可解的事件。一般來說被認為是日軍為了挑起戰爭的陰謀。

日軍高層的確是打算在偽“滿洲國”之後，接下來佔領長城以南的華北一帶。這被稱為華北事變。從 1935 年 5 月開始正式實施。然而，如果共產國際並不知道中日之間會正式開戰，想來也

很難提出讓蔣介石和日本作戰的國共合作提案吧。

因為 1935 年 11 月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在講話中提到“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刻，決不放棄和平”，正是因為和日本之間通過外交解決的途徑並沒有完全斷絕；蔣介石又宣稱，若到了和平絕望的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則“當聽命黨國，下最後之決心”。也就是中日之間全面開戰的意思。

但是日本卻沒有響應蔣介石摸索和平解決的期待，對中國虎視眈眈地起草著絕密行動計劃。

日本的絕密情報為何會洩漏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

西安事變發生於 1936 年 12 月，而中日兩國全面開戰，則是要到 1937 年 7 月 7 日的“七七”事變。

如果是中日之間已經全面開戰，那麼還好理解。戰爭爆發之後的話，那麼不再分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一起齊心合力對抗日本就說得通了。然而西安事變卻在“七七”事變之前。先以戰爭會爆發為前提發生了“一致抗日”的西安事變，之後才爆發了戰爭。怎麼想時間上也有問題。筆者一直都很在意這一點矛盾。的確紅軍馬上就要敗亡，情況十分緊急，但是在這矛盾之間，一定要存在能夠得知日本即將侵華，並且能夠把這一點傳達給共產國際的人物。

在這個矛盾的延長線上的，是佐爾格。考慮到這位著名蘇聯

間諜的存在，才終於填補上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之間在時間順序上的矛盾。

佐爾格於1930年以《法蘭克福郵報》記者的身份被蘇聯派往上海租界收集情報。在上海認識了曾經向毛澤東取材過的美國著名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史沫特萊又將佐爾格介紹給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尾崎秀實。

1933年，佐爾格以《法蘭克福郵報》東京特派員以及納粹黨員的身份來到日本，並與尾崎再會。尾崎後來成為近衛內閣的智囊，在這之前就和政界及軍部的高官有著許多交流。佐爾格就通過尾崎獲得了許多機密情報。

即便不是如此，日本也充滿了好戰的氣氛。政府已經無法抑制軍隊的橫行。這麼看來，日本即將發動侵華戰爭的情報洩漏到共產國際那兒也就能說得通了。

實際上，將會在下一章中詳述的中共間諜潘漢年於1935年8月前往莫斯科接受間諜特訓，並於1936年5月回國時，就向延安匯報了共產國際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指示和自己回國後的任務。在此之後，毛澤東等人選定了張學良作為目標，並委派潘漢年前往說服張學良。李克能和劉鼎等人為了讓潘漢年能和張學良進行接觸做出了許多努力。

雖然共產國際已經選定了蔣介石這個目標，但是能夠理解其

作為中國人的微妙心態的，還是只有中國人。他們認為張學良會倒向自己這一方。

蔣介石也大致上看明白了這件事情。然而儘管如此，在蔣介石下令“做最後 5 分鐘的努力”的時候，令蔣介石憤怒的是在西安的張學良卻按兵不動。故而他於 1936 年 12 月 4 日，帶著少量的部下前往西安。儘管周圍人都阻止他，但是蔣介石認為自己並沒有做錯，所以沒關係，力排眾議近乎隻身前往西安，卻被張學良所綁架。

張學良把中共所提出的八項主張轉達給蔣介石，提出如果接受這些條件就放蔣回南京。而蔣介石憤怒地拒絕了這些條件，聲稱如果不送自己回南京就死在西安。

雖然當時的報導眾說紛紜，說蔣介石打算接受八項主張中的四到六項，但是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他一項也沒有接受。

在《蔣介石秘錄 11》等書中有記錄說，張學良在此時閱讀了蔣介石的日記，“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並因此而深深後悔。蔣介石每天都會寫日記，故而前往西安時也定然隨身帶著日記。張學良應該閱讀了所繳獲的蔣介石日記。

雖然張學良心中充滿悔恨之念，痛苦萬分，然而為時已晚。

當時毛澤東認為現在正是殺害蔣介石最好的機會。然而，從

共產國際傳來了指示，要求釋放蔣介石。共產國際知道全面抗日戰爭馬上就要開始。有日本這一敵人在，如果蔣介石不領導對日本作戰的話，那麼共產黨也難以發展。何況斯大林也知道日本對蘇聯的西伯利亞虎視眈眈，打敗中國之後定然要入侵蘇聯，故而為了不讓日本進攻蘇聯，想方設法都要讓蔣介石和日本作戰，希望能夠由中國來阻止日本對蘇聯的進攻。

蔣介石於 1936 年 12 月 12 日被綁架，於 12 月 25 日下午 3 時恢復自由，26 日返回南京。蔣介石回到南京時，市民歡聲雷動，點燃鞭炮在街頭互相傳達這一消息，並且懸掛出蔣介石的巨大肖像，高呼“蔣介石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來歡迎蔣介石。蔣介石因此知道自己的重要性，深受感動。

果不其然，1937 年 7 月 7 日，北京爆發了“七七”事變，中日兩國陷入了全面戰爭。

“百分之十對日作戰”

讓我們先來看看毛澤東在西安事變之後，“七七”事變之前的行動。

1937 年 1 月，中共馬上致電國民黨，要求讓中共保留五萬兵力並由國民黨每月支付 50 萬元軍費——果然，軍費正是目的之一。

我們能夠看出，紅軍正是因為瀕臨絕境，彈盡糧絕了所以才提出了國共合作。

蔣介石堅決反對這一要求。提出不允許中共保留 15000 人以上的兵力。討價還價後，最終決定讓中共保留 25000 人的兵力，由蔣介石向中共每個月支付 20 到 30 萬的軍費。

多麼的厚顏無恥。

按照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的數據，1937 年，上海勞動者的平均月收入是 12.18 元。蔣介石付給毛澤東等人的經費，不光包括士兵的軍費，還有衣食住行等生活費，估計總額在每個月 50 萬元以上。

假定每個月支付 30 萬元。這金額相當於當時上海勞動者 2050 年的收入。毛澤東每個月從蔣介石手中獲得了如此巨額的金錢。

蘇聯的斯大林正忙於對抗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抬頭。共產國際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有餘力能夠在金錢上支援中共。

所以才要讓中共和國民黨合作，食國民黨之俸祿，讓國民黨出錢擴大中共的軍隊，這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張學良是何等的罪孽深重啊。

實際上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軟禁蔣介石期間後悔，蔣介石被

解除軟禁到達機場後，張學良提出自己也要和蔣介石一起飛往南京。筆者在讀到這一段的時候還以為他要在飛機內暗殺蔣介石，然而他卻向蔣介石低頭承認了自己的罪行。

正是因為張學良，才導致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並且逐漸實現了共產國際“讓日軍和蔣介石互相消耗對方的實力，並且藉機實現共產主義革命”的野心。蔣介石被囚禁的西安事變之前的1936年12月7日，毛澤東取代朱德正式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而於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之間爆發了全面戰爭。中國則以日期為名，稱其為“七七”事變。

日軍中國駐軍第三大隊及其步兵炮隊從前一天的7月6日開始進行軍事演習。北京城內也進駐了異常多的日軍坦克，氣氛非同一般。在夜間演習中，日方稱“中國士兵發射了實彈”。而中方則稱是日軍的陰謀，也有說是共產國際的陰謀的。不管如何，日軍在別的國家發動戰爭，是確鑿的事實。

本書並不想在此深究其原因或者“罪魁禍首”。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此，而是把重點放在中日兩國因“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戰爭後，共產黨軍和國民黨軍在抗日戰爭中是怎樣的戰鬥/不戰鬥上面。

收到“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一手情報後，毛澤東表示：“蔣介

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張聞天也很得意的說：“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無力危害我們。”關於這些，到1938年4月4日為止一直呆在延安的張國燾在其回憶錄《我的回憶》中有詳細的記錄。毛澤東一開始很耽心日軍太強，南京不能堅持抗戰，導致中共沒有藉機壯大自身，但是到當年8月初，“中日戰爭正在華北大規模進行，於是毛澤東等放心了”。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陝西省洛川縣馮家村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並在會議上通過並發表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內容諸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日的民族團結”等等，強烈煽動起中華民族的熱情。

然而這不過是為了掌握人心的宣傳而已，在許多中共前領導人的傳記中，坦言當時發出過“不要和日軍正面衝突”的命令。比如說曾經擔任過國防部長的徐向前，同樣是共和國元帥卻在文革期間病死獄中的賀龍，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聶榮臻，都在他們的自傳中用各種表現方法記下了這一點。

特別是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記錄了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使用“避實就虛”一詞來說明“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以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

抗日英雄”等言論。

和其他中共前領導人的回憶錄一樣，總而言之就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不要和日軍正面戰鬥，進行游擊戰並大肆宣傳共產黨軍隊的偉大深入人心，以讓廣泛的人民倒向中共一方，以在抗日戰爭期間發展壯大共產黨軍隊為第一目的。一定要有在日本敗退之後則一鼓作氣打敗國民黨軍成立新中國的革命理念”這一思想。

所以才以讓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作戰，削弱國民黨軍作為重中之重。

這完全是違反承諾的。國共合作的基本前提就是不要互相扯對方的後腿。然而毛澤東等人只是想讓蔣介石停止剿共，並且在此後利用國民黨壯大自身。

蔣介石於 1937 年按中共的要求訂下了每個月支付的軍費金額，共產黨軍則在晚些時候被編入國民黨軍隊的編制。

在洛川會議的第一天，蔣介石公佈了把在陝北的主力紅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來的第十八集團軍）。此後被稱為“八路軍”，並和“新四軍”（南方八省的紅軍）一起在日本戰敗後的國共內戰後期被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此外在偽“滿洲國”內還有東北抗日聯軍，下轄第一路軍、第二路軍、第三路軍等部隊，其中還包括有共產國際旗下的金日成等軍隊，構成了現在北朝鮮的部隊，其成份複雜，這裡不再詳述。

在洛川會議後，對八路軍發出了絕密的口頭命令。然而卻有人把這一密令洩漏了出去。

其人名為李法卿。曾經在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下騎兵連擔任共產支部書記。據說他在 1940 年逃離八路軍後對外說出了這些密令。當八路軍由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對八路軍之幹部曾作如下的具體指示：

“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為使我們的同志明瞭其工作，即使在和總部聯絡斷絕的時候，仍能向共同目標努力起見，我樂於為同志們指出下述的政策。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妥協階段，在此階段中，應藉自我犧牲，表面上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並奉行三民主義，但事實上只是掩護本黨的生存發展；

第二、競爭階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黨的政治與武力基礎，並繼續發展至能與國民政府抗衡而破壞之為止，同時極力消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

第三、進攻階段，在此階段中，深入華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割斷中央軍在各地區的交通，使他們孤立而失去聯繫，直至我們反攻力量已準備成熟，然後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地位。”

多麼戰略性的，多麼對蔣介石充滿欺騙性的決定啊。

這些情報在 1977 年梅良眉所著的《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戰策略之研究》（正中文庫）的第三章第四節“毛澤東對八路軍秘密指示”（41 ~ 41 頁）有所記錄。

書中記載這些情報是從以下兩冊文獻中引用而來。

●《剿匪戰史》第 11 冊、1035 頁（“剿匪”是討伐中共的意思。在蔣介石看來中共的行為是對政府的反叛，故稱之為“匪”，比如“共匪”。）

●《中共黨的策略路線》、張浩之講演原稿附錄。

不管是何種情報，都要去找到其出處去確認其來源。不能引用二手文獻。這是筆者的基本立場。一定要找到最初的資料而不是引用二手文獻，在只能找到二手文獻的情況下，也會在寫的時候給出所參考的文獻。所以，筆者想盡一切辦法來尋找這兩本書。

然而在日本卻無論怎樣也找不到這兩本書，連作者和出版社名也沒有。在尋找了很久之後，終於在台北的國家圖書館找到了同名的書籍。與造訪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一樣，筆者也曾經多次造訪台北國家圖書館。筆者再次飛往台灣，來到在日本時實行聯絡的負責人處，筆者還獲得了能夠多次進入國家圖書館的通行證。

有了!

把《剿匪戰史》和《中共黨的策略路線》捧在手中時,筆者彷彿在遙遠的異國寶島上發現了寶物一般興奮。

等不及翻頁,先看作者的名義。於是發現《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編者正是“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也就是說,本書由中華民國司法行政部所編纂。出版日期是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即為1956年。這裡詳細地記錄下毛澤東在國共合作和發出的戰略和秘密指示。

那個時代,國共兩軍之間的情報活動已經密切到不能用“背叛”、“欺騙”和“間諜”這些詞語來形容的程度。所以獲得中共內部的機密資料也不奇怪。特別是因為在國共合作期間,需要互相關知道對方戰略的情況下。

李法卿的證言則以演講的形式被記錄在本書第68頁的附錄中。

然而卻是以“獨立十八集團軍某部共產黨支部書記xxx君”名義,名字的部分被打上了馬賽克以“xxx君的談話”的形式詳細記錄下了李法卿的證言。也許是因為1956年李法卿還活著,為了防止他的真名被暴露後本人或者其子女親屬遭到暗殺等危害,所以沒有公開真名。這也是筆者一直以來都採取的方法,所以能夠理解。

李法卿估計是在 1970 年代中期逝世。也許是因為不再懼怕受到危害，而梅良眉自己也快到年紀了，所以想要在有生之年記錄下事情的真相，所以才用真名重新寫了一遍這段證言吧。

想要在自己所剩下不多的時間內把真相流傳給後世的心情，和筆者本人是一樣的，可謂是與我心有戚戚焉。

並且，這一份記錄並沒有參考其他的文獻。

也就是說這份記錄乃是第一手的資料。終於找到了！

接下來看《剿匪戰史》。

其作者為蔣中正，也就是蔣介石本人。由國防部史政局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也就是 1962 年所編纂。在本書第 1035 頁寫道：

“民國二十六年秋，朱德率領第十八集團軍，由陝北出發時，毛匪澤東（蔣介石在提到毛澤東的時候，基本上都用毛匪來稱呼）對其幹部指示謂”這一段。非常具體的指出是由朱德所率領的軍隊。從當時所收集的情報已經可以斷定是朱德了吧。

翻看《剿匪戰史》第 1040 頁的時候，筆者心中一痛。

蔣介石寫道“政府自收編匪軍後，其所編成之三個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均依照國軍同等待遇，按期發給經費，而匪黨從政府領到之經費，並不發與部隊，却就地津貼其外圍組織與文化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容之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工作之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及各地之‘生活書店’，

以及《羣衆雜誌》、《解放周刊》，延安之‘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全係由此軍費開支，但卻誣我政府歧視第十八集團軍，不給與國軍之同等待遇”。並且譬如“山西省凡其軍隊所經之地，金銀糧食均為匪搜刮一空。總計各地有數目可考者，約有黃金五十餘萬兩，銀圓二千餘萬圓，總值在銀圓一億以上”。這些，想來就是像毛澤東所說的進入第三階段的國共內戰之後，用來購買武器的資金吧。

毛澤東對八路軍做出了主要偶爾進行小規模游擊戰，並且大肆宣傳八路軍的奮戰和勝利，讓民心倒向八路軍的指示。同時命令絕對不要在第一線挑起大規模戰鬥。因為如果日軍明白八路軍的強大的話，就會來消滅八路軍。所以才嚴令禁止在第一線進行大規模戰鬥。

但是儘管如此，戰場上的將軍們還是熱血沸騰的想要獲得戰果。

比如說百團大戰。這是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組織了上百個團於1940年8月和日軍進行的正面戰鬥，對日軍的補給線造成重大打擊，戰果巨大。最初只有二十多個團參加戰鬥，而其他的八路軍在看見之後也士氣高漲，誰也不願意作壁上觀，於是紛紛參戰，最終參戰的部隊數達到了百團以上。實際上八路軍戰鬥起來是非常勇敢的，渴望戰鬥。但是毛澤東並不允許正面作戰。儘管如

此，如果戰鬥起來也不落人後。後來擔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大將也為八路軍的勇猛而震驚，並且非常佩服彭德懷。

然而毛澤東卻批判彭德懷，指責其沒有完全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過早暴露了我軍實力。彭德懷在共和國誕生後，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遭到整肅，後來死在囚禁之中。整肅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彭德懷批判 1958 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政策，實際上毛澤東的怨恨在埋藏了幾十年之後通過殘忍的形式進行了報復。

大型戰役除了百團大戰之外還有平型關大捷等戰鬥。但是平型關大捷的情況很特殊。

實際上 2015 年 5 月由俄羅斯歷史學家亞歷山大·V·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在解讀共產國際的機密檔案後所出版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林添貴譯、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書中，就有國共合作後毛澤東不和日軍作戰，一心只想著要打倒國民黨軍，而引起蘇聯斯大林震怒的記錄。因為促進國共合作讓中國和日本作戰，其目的乃是讓日本無法進攻蘇聯。然而毛澤東完全不打算和日軍作戰，最後斯大林沒辦法，只好掏了大筆的錢給毛澤東讓他去和日軍作戰。

毛澤東為了應付斯大林而和日軍進行的戰鬥就是平型關戰役

(1937年9月~10月)。因為這次戰鬥獲得了斯大林和蔣介石的稱讚，所以他接下來就又命令要和以往一樣不要和日軍發生大規模戰鬥。

所以總體來說，八路軍實際參加抗日戰爭時，主要是後方游擊戰和通過宣傳來對一般民眾和國民黨士兵進行洗腦。在前線戰鬥的是國民黨軍，而共產黨則按照計劃一樣，削弱國民黨軍，並且擴大共產黨的勢力。

毛澤東是怎樣看待“南京大屠殺”的？

1937年12月13日，發生了後世所稱“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毛澤東到底是怎樣想的呢？

為了能夠更深的理解毛澤東，我們要繞一下彎路，談一下共和國誕生後的情況。

坊間甚至有傳言說毛澤東在南京大屠殺之後因能夠削弱國民黨軍而舉杯歡慶，即便不是如此，至少毛澤東在生前基本上完全沒有提到過“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中基本沒有相關條目，也沒有在向人民發表演說中提到這一件事。

《毛澤東年譜》一書中，在1937年12月13日這一欄中，也只有“南京失陷”這四個字。在這之前花了整整一頁來寫12月9日

到12月14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在13日的這四個字之後，從14日起又記錄了許多閒雜小事。完全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

這套《毛澤東年譜》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1893年~1949年分為上中下三卷，1949年~1976年分為6卷。記錄了關於毛澤東的每一天的事情。每本大約有650到700頁，總共9本加起來有約6000頁的年譜。每頁按729字來算的話，總字數超過了440萬字。在這龐大的資料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卻只有“南京失陷”這僅僅四個字。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在前線勇敢戰鬥的是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軍隊，而毛澤東的主力軍隊卻在和日軍無緣的延安鑽山洞。在蔣介石的後方動員群眾，赤化他們來增強自己的兵力。

只能說是他們害怕這件事情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抗戰八年，全是中共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還有敵後武工隊，靠著地雷戰、地道戰、游擊戰——打下來的。直到日本鬼子被中共領導的軍隊打敗了，投降並滾回日本後，‘蔣該死’才從峨嵋山下來！開始伸手——摘桃子嘍”，所有人都是被這樣的教育。蔣介石被讀成發音相近的“蔣該死”，其洗腦程度深入骨髓。

現在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出現了許多“毛澤東為什麼不提南京大屠殺？”“毛澤東為什麼隱瞞南京大屠殺？”的文章。例如在大陸的百度上搜索“毛澤東 南京大屠殺”，會出現 200 多萬條條目，大多數都是在問這個問題。筆者反而驚訝這些居然沒有被刪除。

其中有人詳細調查了中國建國以來是如何一直沒有提到南京大屠殺。這種文章有很多，作為證據，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

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自稱為“中國第一軍事門戶網站”的西陸網上，出現了陳中禹名義發表的《毛澤東時代為何不提南京大屠殺——真相讓人害怕》一文。

他指出在 1958 年版《中學歷史教師手冊》“中外歷史大事年表”中，1937 年內容只有“日軍侵佔上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簡單記述，全然不提“南京大屠殺”。而該書在 1927 年大事中，倒有蔣介石“四一二大屠殺”記述（4 月 12 日蔣介石在鎮壓共產黨員及信奉他們的勞動者的事件，造成了 120 人死亡，180 人負傷）。陳中禹對為何 300 人的犧牲就被稱作“大屠殺”，而死者達 30 萬人的南京大屠殺卻被隱瞞，感到疑惑。按照他所調查的結果，一直到 1975 年版《新編中國史》“歷史年表”為止，對“南京大屠殺”仍是隻字不提。

順便一提，毛澤東正是在 1976 年逝世的。按照陳中禹所說，

至 1979 年版中學歷史書中，“南京大屠殺”一詞才首次列出。

此外還有 1957 年的中學教科書中提到，但是 1960 年版中又刪除了這一部分的情報。筆者確認了這一本提到南京大屠殺的教科書，發現是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然而此後這一段歷史卻消失了。

又比如在香港新聞評報網站上有人以 Herzog 的 ID，於 2012 年 3 月 1 日發表了題為“毛澤東時代為什麼很少談論‘南京大屠殺’”的文章，被多次轉載到大陸的網站上。而 Herzog 本人也在大陸開設了博客，並且至少在 2015 年 8 月還沒有被刪除。

Herzog 在文章中介紹了 1946 年到 2012 年 2 月 22 日為止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中出現“南京大屠殺”一詞的次數。其中——

1946 年至 1960 年 5 月：21 次

1960 年 5 月至 1982 年 6 月：零次

1982 年 6 月至今：835 次

據王錦思在《老年生活報》上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發表的文章所說：“儘管 1951 年 4 月 8 日的《人民日報》一篇文章中寫道：

‘人們怎麼能夠設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記 1937 年 12 月 13 日開始達 1 月之久的 30 萬人的大屠殺？’但是這種記憶是零星的，中國開始出現了集體‘緘默’，就連南京人民也未必知道”。王錦思接

著寫道：“儘管如此，1962年，（南京大學歷史系老師）高興祖完成了書稿《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這也是中國大陸研究南京大屠殺最早的書稿。但是直到1979年3月，才從油印本變成了白皮書，是內部出版物”。而按照《南方都市報》的報導，在文革期間提到日軍南京大屠殺的人，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

唯一被允許稱頌的，只有毛澤東。於1950年在南京雨花台建立的雨花台死難烈士陵園，這裡有1927年到1949年期間國民黨屠殺的中國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的紀念碑。這22年中，約有近10萬的共產黨人等在此被殺害。1953年2月22日，毛澤東在共和國誕生後首次造訪南京，此後先後二十餘次造訪南京，卻沒有一次提到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反而也許是想回味從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手中奪取天下的感覺，多次參拜中山陵（孫中山的陵墓），在那兒反復讀了幾次“建國大綱”。他所關心的另一件事則是太平天國（1851年～1864年）的遺跡。反抗清王朝的太平天國，以南京為首都，在進入南京城時屠殺了超過百萬人（全中國有2000萬以上的犧牲者，也有說法認為是5000萬人）。毛澤東腦海中浮現的也許是太平天國的“南京大屠殺”吧。所以於1956年下令設立了“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

順帶一提，在200多萬條條目中，有許多人都提到“1982年，在日本篡改教科書的刺激下，中國一般大眾才開始廣泛地認識到

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比如說《人民日報》於1982年8月首次發表文章詳細描寫“南京大屠殺”中，就以日本文部省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起頭。所以許多大陸網友都諷刺的說“從這一點上，也許，我們還真的要感謝日本極右翼，沒有他們復辟軍國主義的瘋狂叫囂，也許中國人，早就把‘南京大屠殺’扔到爪哇國去嘍！”

再順便一提，“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直到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的1985年8月15日才建成。也許是要把毛澤東一直無視的事實大肆公開，甚至建立紀念館，要不是打著紀念日的旗號，就說不過去吧。

按照中國方面的資料，官方是以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為契機，於1982年成立了在南京市設立紀念館的準備委員會。然而為何不選擇蔣介石決定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9月3日），而選擇日本定下的終戰之日（8月15日）竣工呢？因為他們在這之前並沒有紀念過抗日戰爭紀念日，所以對勝利紀念日的理解並不充分。

《毛澤東年譜》中所記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誕生之後，同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後來改名為國務院）決定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為8月15日，就是證據。然而實際上卻什麼也沒有幹，並且在之後的調查中，發現中華民國的蔣介石把紀念日定為9月3日後，於1951年8月13日又做出了改定為9月3日的決定。而且毛澤東也根本沒有在意這一點，沒

有舉行過任何紀念活動，只是在 1951 年和 52 年的 9 月 2 日向蘇聯的斯大林發了賀電而已。作為同盟國一方戰鬥的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黨軍，而中共作為推翻國民黨成立的國家，對抗日戰勝紀念日只是向“同盟國”發送賀電的立場而已。實際上在 53 年斯大林去世之後，毛澤東更是什麼都沒有做了。正是因為此，“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才會在 8 月 15 日竣工吧。

就像前面所述，毛澤東反而因為日軍打敗了國民黨軍而高興。別說抗日了，反而是相當的感謝日本。而毛澤東死後，中共卻打算隱瞞這一事實。筆者相信，如果讀者看到下一章毛澤東和日軍之間的同謀的話，就會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吧。

並且，從 80 年代後半開始的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批判，也和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看法有關。日本有不少批判者針對中國強烈抗議參拜靖國神社提出“中國直到 80 年代後半都沒有提出抗議”的疑問，卻沒有找到這個疑問的答案。

其回答就在本書所寫的這些事實之中。希望通過這些事實能讓大家能夠更加的看清楚現在的中國。

第四章 與日本間諜機關 “岩井公館”同謀

由中共做出的完全相反的歷史解釋

岩井英一和中共間諜袁殊

“共產黨員也沒關係”

毛澤東的間諜潘漢年

潘漢年為什麼向岩井提交了中共的資料？

潘漢年向日軍提出停戰

提供情報的報酬是多少錢？

由中共做出的完全相反的歷史解釋

在進入主題之前，先勾勒一下事情的梗概，並介紹一下在中國現在正在發生著什麼樣的事情。正是因為中國這樣的現狀，才讓筆者下定決心來寫這本書，所以請允許我在這裡進行簡單的介紹。

中日兩國之間於 1937 年全面開戰之後，為了保護自己國家而要求毛澤東與國民黨蔣介石合作的斯大林，到了 1939 年 8 月，忽然跟最大的政敵希特勒協商，簽約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同年秋天，毛澤東派遣中共間諜前往上海和香港，和日本外務省一系間諜機關“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及設立了陸軍參謀的特務機關“梅機關”的影佐禎昭（1937 年大佐，1939 年少將，之後就任汪精衛南京政府的軍事最高顧問）等人進行了接觸。

按照中共方面的說法，其目的是為了讓抗日戰爭獲得勝利，從日本秘密獲取情報，為共產黨軍（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勇敢戰鬥做出了貢獻。一般來說，中共這些資料的結論，都是說共產黨軍擊敗了日軍，並獲得了勝利。

然而事實上卻恰恰相反，中共的間諜的目的是把通過國共合作獲得的蔣介石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提供給日方，打的是削弱國民黨軍的算盤。

作為不是從日方獲取情報而是向日方提供情報的證據，中共

間諜從日方獲取了巨額的報酬（諷刺的是，這一事實被記載在本應該受到嚴重審查的 90 年代末期中共的資料之中）。毛澤東讓中共間諜去接觸影佐禎昭建立的汪精衛傀儡政權的間諜機關“76 號”，密謀要推翻蔣介石。並且最終和日本陸軍都甲大佐進行了與新四軍之間互不侵犯的談判（這也是出自中國 90 年代末的資料）。

這對毛澤東來說，也與他閉口不談“南京大屠殺”一樣，是難以掩飾的事實。然而最近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威媒體“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和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共享資訊）突然開始主動提到當時的事實。

比如說，2013 年 5 月，刊載了《抗戰期間，中共秘密接觸日軍岡村寧次總部真相》一文。這是在日本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

在文章一開始的辯解中，就提到了《揚帆自述》書中提到的，當年中共（新四軍）和日本陸軍岡村寧次接觸之事，但聲明這“不是去“議和”，更沒有達成過什麼協議”。

為什麼時至今日還要發表關於這一事件的文章呢？

在這背後，有著中共不得不出面進行辯解的理由。

2013 年後，有人在海外中文網絡上聲稱發現了 1947 年 7 月 24 日《時事公報》第二版的文章，並將一張舊報紙照片張貼在網上。其中提到“（毛澤東）與岡村訂有密約”。這一張報紙文章在中文網絡上被不斷轉載，流傳甚廣，並且終於被大陸的百度所轉載。

想來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就是為了否定這一傳言，才會拿出1989年的《揚帆自述》來進行辯解吧。因為在這本書中有描寫岡村寧次和中共間諜揚帆之間是怎樣接觸的。

此後，中國大陸的網上可以搜索到大量的關於“岩井公館”“岡村寧次”“影佐禎昭”及“都甲大佐”的情報。然而在日本的網絡卻完全找不到關於“都甲”的情報，檢索“都甲大佐”才出現一條條目，能搜到這個詞的，全都是中文的文章。

筆者為了弄清楚真相，開始尋找日本方面的相關資料。

然後就發現了寶物！

比如說在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就有關於岩井公館的詳細描述，並且書中還詳細地記錄下了關於中共間諜潘漢年和袁殊的事情，才導致筆者決心要抓緊寫下這些真相，開始執筆本書。

此外，開始執筆本書的時候，得知曾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工作過的美籍華人謝幼田先生（1985年前往美國，並於2005年返回中國）出版了《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国抗日戰爭真相》（明鏡出版社、2002年）。草思社於2006年出版了坂井臣之助翻譯的日文版。這本書分析透徹，描繪了當時的真相，並且義憤填膺地質問“究竟是誰出賣了中華民族”。令人尊敬的同時，筆者發現自己想要書寫的事實在中國知識分子的眼中也是客觀的事實，

這一點令筆者十分欣慰。

但是，無法否認，中國這邊資料有其界限。所以以下第四章到第六章，結合日本方面當事者的回憶和相關人士的筆錄，來驗證前面所說的事件。

岩井英一和中共間諜袁殊

1899年生於愛知縣的岩井英一，在中學畢業後作為愛知縣費派遣留學生，進入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1921年畢業於商務專業之後進入外務省任職。此後輾轉在汕頭、長沙、上海（2次）、成都、廣東、澳門、香港等地駐外公館任職，這裡把焦點集中在他在上海的行動上。

本書接下來將主要依據岩井英一在昭和58年（1983年）出版的《回想的上海》一書，並且也參照來自中共方面的資料來描繪這一段歷史。並且，《回想的上海》上並沒有出版社名，只是以在名古屋的“《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員會”的名義發行。因為是類似於個人出版的書籍，所以直至今日在日本也鮮為人知。

1932年2月5日，岩井作為上海總領事館情報部副領事赴任上海，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戰火正熾、外務省交給我的任務是盡快讓國際關係複雜的上海恢復和平，而為此則需要正確迅速

的知道敵方的動向，來抓住和平的機會”。

雖然日本一方面挑起“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但是在另一方面卻又尋求和平的機會，這顯得非常矛盾。但是失控的軍隊和政府之間的意圖並不一致，而岩井在為和平的目的而奔走乃是確鑿的事實。並且，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岩井認為外務省的情報收集能力太過孱弱，不足以達成他的目的，所以和當時的井口首席領事進行商量，起草了在上海設置外務省情報機關的草案提交給外務大臣。然而重光公使在知道這件事情之後，表示這件事應該讓公使館來幹，最終批复成立了公使館情報部。

最終河相達夫就任第二代情報部長，並且把影佐禎昭介紹給了岩井。影佐於1934年8月被調往上海擔任駐支公使館附屬陸軍武官輔佐官。“駐支”的“支”是“支那”的簡稱，當時日本稱呼中國為“支那”。“支那”一詞源出秦始皇的“秦”被翻譯成的希臘語、拉丁語 *Sinae*，孫中山本人也用“支那”稱呼過中國，但是從把“九一八”事變稱呼為“日支事變”開始，變成了一種蔑稱。這裡作為固有名詞，所以採用和原文一樣的“駐支”和“對支”的說法。

河相讓擅長中文的岩井來擔任會見中國記者的發言人，讓岩井有了和許多中國記者接觸的機會。有一次岩井為加強兩個之間的友誼，邀請了20餘名中日兩國的記者來參加宴會。

其中就有來自新聲通信社的記者袁學易在場。又名袁殊。

他以作為共產國際、中共、蔣介石國民黨等等的“五面間諜”而聞名。影佐也出席了這場宴會，袁殊在宴會上獲得了與其接觸的機會。岩井和影佐的情報當然也通過袁殊被傳給了中共——間諜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存在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也許就是毛澤東等人有意讓袁殊和他們接觸的吧。

袁殊於1911年出生於湖北省，1929年，他18歲的時候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新聞學。和當時許多的中國人一樣，他也被日本左翼思想所影響，回國後參加“左聯”從事左翼文藝活動。1931年10月由潘漢年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中共情報組織中央特科的幹員——這裡的“特”，乃是特務，也就是間諜的意思。

1933年，他作為中共間諜，打入了國民黨間諜組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這個組織是1927年由國民黨中的中央俱樂部組織（Central Club，簡稱CC）所設立，1938年成為了蔣介石手下兩大間諜組織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袁殊在早期的國民黨間諜組織中為中共從事間諜活動，這時候以“新聲通信社”記者的身份和岩井見面。

1935年5月，共產國際的一名成員被國民黨所逮捕的時候，其所持有的筆記中發現了袁殊的名字，所以袁殊也被國民黨所逮捕。其罪名是蘇聯間諜，也就是共產國際的同夥。

岩井發現每天都和自己聯絡的袁殊突然消失了，正感到疑惑的時候，接到了來自袁殊夫人的電話。袁殊因為岩井的努力而被釋放，此後，袁殊大約因為感於岩井的恩情，和岩井成為了真正的好友。岩井本人也很喜歡袁殊的才能和人品。雖然岩井腦中浮現過與蘇聯間諜有關也就等於和中共有關的推測，不過他並沒有在意這一點。此後，袁殊得到岩井的援助再次前往日本留學，並於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後返回中國。

而岩井則於1937年4月暫時返回日本，並於1938年2月再次前往上海赴任。其目的已經是為了“儘早結束（軍隊所引起的）戰爭”，重建中日兩國之間的和平外交關係，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軍隊和政府之間的分歧已經越來越大。岩井為了讓戰爭儘早結束，在上海領事館設立了特別調查班，意圖更好的把握蔣介石政府內部的消息和動向，下決心要盡快抓住講和的時機。

這時候蘇聯的間諜佐爾格的同伴、《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成了近衛內閣的智囊。也許是受共產國際之命，為了讓蔣介石和日本同歸於盡故意讓侵華戰爭長期化，所以讓近衛首相在1938年1月16日作出了“不要理會蔣介石”的發言，給岩井的事業帶來了困難。

岩井在上海就任後，發現在抗日戰爭中站出來的蔣介石已經成為了國民英雄，他認識到近衛的發言帶來的後果是如何的嚴重，

並感到焦急。

如果希望戰爭儘早結束的話，那麼就一定要和蔣介石打交道，而讓近衛做出“不要理會蔣介石”的發言，只能說是蘇聯想要讓中日兩國之間陷入長期戰爭的陰謀了。這也正和毛澤東所希望一樣。沒有比蔣介石在這期間越來越衰弱更讓毛澤東高興的事情了。吧。

在第三章最後所詳述的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前，蔣介石得知日本要進攻南京，所以把中華民國的首都從南京搬到了重慶。這時候想要在南京建立汪精衛傀儡政權的影佐拜託岩井建立“由中國人所組成的政黨組織”。因為當時的平沼首相要求即將建立汪精衛政權不是蔣介石那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而是以汪精衛的國民黨為中心，聯合各黨派各界，以及無黨派人士的政權。而這時候忙於建立汪精衛政權的影佐，為了成立由中國人所組成的政黨組織，就委託在中國交遊廣泛的岩井來幹這件事。

“共產黨員也沒關係”

正好這時候岩井再次前往上海赴任，並且收到了袁殊的聯絡。岩井無條件地信任袁殊，並且拜託他全權負責組建新黨的事務。

其主要的條件就是“為實現全面和平，以構築中日兩國之間合作共榮共存的新關係為理念”“不要建立徒有虛名的黨，而要團結真正理解這一理念並為之奮鬥的人民和知識分子，不拘泥於他們的出身黨派”。這時候岩井對袁殊說“不管是藍衣社、CC 團、其他政黨有關人士、官僚出身、從共產黨脫離的人士、甚至是共產黨員也沒關係”。讓我們記住“共產黨員也沒關係”這句話。這表示在岩井的心裡，充滿了“即使是共產黨員也沒關係，無論如何都想要找到和平的道路”的感情。這也是解讀“毛澤東究竟幹了什麼”的關鍵之一。

順便一提，藍衣社是蔣介石直轄的特務機關，因身穿藍衣而得名。一直到現在的台灣，也稱國民黨為藍營，而傾向台灣獨立和本土化的民進黨等反國民黨團體，則被稱作綠營。

於是袁殊在成立新政黨的時候就塞了許多地下共產黨員進去。而其經費則全部由岩井所屬日本外務省所承擔。按理來說，這是陸軍的影佐所委託辦理的事情，經費應該由陸軍來負擔才對，然而岩井卻忘了和影佐說經費的事情，只好請求上司河相情報部長，讓外務省出了這部分錢。換句話說，本來岩井應該在影佐委託他組建新黨的時候，就問影佐“所需的經費怎麼辦”這個問題，然而影佐拜託他的時候，岩井非常興奮，很高興地就一口應下。而影佐也很感謝岩井能這麼暢快的答應下來，一不小心就把關於經

費的事情給忘掉了。而岩井看到影佐這麼感謝自己，也就不好開口問他關於經費的問題。鬧到最後，就從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費用中掏了這部分錢。

這一段在《回想的上海》中有詳細的記錄。

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影佐來負責建立汪精衛政權這件事，那麼也就不會委託岩井來組建新黨。而如果不是岩井來組建新黨的話，也就不會讓袁殊來幫忙做這件事情。並且，如果岩井不是在接受影佐的依賴時，不小心忘記確認關於經費的問題，那麼也就不會出現後來從外務省的機密費裡掏出龐大的經費通過袁殊和潘漢年轉給毛澤東的事情了。

中共近年來也開始發表關於袁殊的文章（2011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共地下黨主持日特機關“岩井公館”始末》），其中提到岩井公館的經費都是由汪偽政府所出，歸根結底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實際上在組建新黨的時候，袁殊向岩井提出不要用（即將建立的）汪精衛政府所提倡的“和平、反共、建國”的口號，而採用“興亞建國運動”的口號。

當時南京的汪精衛政府雖然還沒有正式成立，但是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已經設立了汪精衛一派的特務機關，也就是令人聞

之色變的“76 號”。而主持此特務機關的乃是汪精衛政權的二號人物周佛海，其人非常討厭袁殊的行動。周佛海開始以“岩井試圖建立共產黨組織”為由來批判袁殊。並且周佛海在組織動員大眾的時候和袁殊的動員發生了衝突，也為二人之間的矛盾火上澆油。

周佛海曾經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作為日本留學生代表出席會議。現在他雖然已經倒向了汪精衛，但是因為曾經是共產黨員，對中共地下組織的行動方式一清二楚。周佛海批判岩井的行動，認為如果讓各種黨派都加入汪精衛政權的話，汪精衛政權將會無法成立。

然而岩井並沒有讓步。特意跑到周佛海家裡質問他：“你不是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黨員之一嗎？”周佛海回以沉默。岩井認為周佛海已經接受，便離開了他家。然而第二天，袁殊卻為“76 號”所逮捕。

岩井衝進“76 號”要求釋放袁殊，然而連在那裡的影佐的部下也不聽他的。

實際上這時候，影佐也夾在周佛海和日本政府之間，左右不是人。周佛海向影佐提出強烈的抗議：“如果打算建立新的政黨並送入汪精衛政權的話，汪精衛政權將會無法成立。”而將組建新黨又是影佐自己拜託岩井的，事到如今也不好讓岩井不幹這件事情。然而岩井也無法讓步，按照岩井所著，當時甚至有了要暗殺岩井的

謠言。

最後岩井對“76號”謊稱要讓袁殊“為影佐效力所以暫時由我來管理”，並把他藏在一間旅館中。

如此這般，汪精衛政權和岩井之間雖然算不上敵對，但是關係十分尷尬，周佛海非常防備著岩井的行動。而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卻說岩井的活動資金出自汪精衛政權，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是多麼扭曲關於間諜問題的事實了。

最後岩井還是聽從了影佐的要求，放棄了組建新黨的活動。而此後這一活動也就演變成了在文化思想領域的“興亞建國運動”。

岩井讓袁殊擔任“興亞建國運動”的主力，並建立了岩井公館。岩井本來打算掛上“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牌子，但是袁殊提出建議：“地處上海市日軍警戒區，又離陸戰隊本部很近，如果太多中國人出入的話會引起日本軍憲兵的懷疑，不如改名叫‘岩井公館’如何？”岩井接受了這一建議。這就是“岩井公館”名稱的由來。

實際經過是如此。不過在中國大陸媒體上，比如在百度百科的“袁殊”條目中寫道：根據潘漢年指令（事實上，是中央的具體部署並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興亞建國運動”的本部，“興亞建國運動”本部於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館成立。潘漢年

借岩井之名，建立了這麼一個機構，除了掩護一個電台外，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

這種說法多麼歪曲事實。只從這一件小事，也能看出來中共是怎樣編造歷史的。

岩井在書中認為，岩井公館並不是特務機關，而是以收集蔣介石國民黨一方情報來促進和平為主要目的的機構。然而就算日本也認為岩井公館實際上就是特務機關，岩井對這一點抱有怨恨。事實上，也的確有自稱外務省特別調查班顧問的團隊常駐岩井公館。其中還有寫出《戰後日本政界和財界著名黑幕》的兒玉譽士夫和岩井的好友朝日新聞社的千原楠藏等人，協助辻政信少佐進行“對重慶思想戰”，並且秘密地沾手重慶情報，無法否定其在間諜方面的活動。所以在本書中稱其為間諜機關。

另一方面，現在中國稱其為“臭名昭著的特務機關”。如果不這樣說的話，“和日本之間進行的間諜活動，都是為了能夠獲得日軍情報，並引導中國共產黨軍走向勝利”的說法就不成立了。岩井在書中憤怒地回憶道，自己並沒有接觸到軍隊的情報，甚至之後連外務省本部的情報也不發給自已了。岩井公館只是收集情報的機關，並沒有持有軍事情報。

這也是在分析毛澤東活動時非常重要的一點。

有一天，袁殊對岩井說想拜託他一件事情。有一個人非常想

介紹給他，讓他去見一面。

其人名為潘漢年。雖然是中共的幹部，但是用的是“胡越明”這一化名，所以請在和他見面的時候稱其為胡越明。雖然聽上去很麻煩，但是因為是袁殊的託付，所以岩井同意了見面。按照袁殊的說法，這位潘漢年（即胡越明）在中共內部是和周恩來地位相當的人物。岩井對此產生了興趣。

袁殊又打算把另一位名叫廖承志的中共高級幹部介紹給他，但是岩井拒絕了。他認為如果潘漢年是和周恩來地位相當的人物的話，那麼見他一個人就夠了。

關於岩井和潘漢年的第一次見面，《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等中共方面資料所記錄的過程充滿了“這時候袁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不得不和岩井見面”等內容，其過程令人生疑，其辯解非常不自然，讓筆者敏銳地看出試圖在隱藏一些什麼東西。

岩井在《回想的上海》寫道，第二次國共合作實際上已經破裂，國共兩軍正在互相爭鬥，但是儘管如此，他還是抱著可能獲得重慶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情報的期待，和潘漢年見了面。

毛澤東的間諜潘漢年

出生於江蘇省的潘漢年（1906年～1977年）本來是從事作家

活動和雜誌的編輯業務，參加左翼作家活動，1925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 年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並且在 1931 年中華蘇維埃政府成立之後，擔任中共中央情報組特科（特務科）第二科科长。也就是成為了共產國際的間諜。在前一章也提到過，他於 1935 年 8 月被派往莫斯科參加特訓，並且接受了向毛澤東傳達抗日統一戰線（國共合作）方針的指示。於 1936 年 5 月回國，並且在同年夏天被派去說服張學良。在引發了西安事變後，潘漢年返回了在延安的毛澤東身邊。

1937 年 9 月，潘漢年被毛澤東派往充斥了國內外間諜的上海。在擔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同時，逐漸開始沾手間諜業務。1938 年暫時返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工作，之後於 1939 年 4 月以治療眼疾的名義前往香港，在這時候接到了毛澤東所發出的和汪精衛政權 76 號的李士群接觸的指示。同年秋天接到了以香港的間諜基地為中心前往上海和日本接觸進行間諜活動的命令，而從這一段起中共方面的資料和日本方面的資料開始出現矛盾。

中共方面的資料經歷過一個複雜的過程。

共和國誕生後的 1955 年，曾經拼命打入敵人內部的潘漢年卻被毛澤東逮捕封口，最終死於獄中。表面上的理由是因為潘漢年沒有向毛澤東匯報他和汪精衛私下見面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原因肯定是毛澤東害怕自己和日軍同謀的事情暴露，所以把所有中共間諜

封口。其證據就是，當時按照毛澤東指示行動的所有中共間諜，都在潘漢年被逮捕前後被毛澤東全部抓了起來。有些人絕望自殺，有些人死在獄中。

毛澤東死後過了一段時間，潘漢年於1982年被恢復名譽，然而這已經是他死在獄中5年後的事情了。再重複一遍，《潘漢年傳》和《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等書是潘漢年的朋友們為了能夠慰其在天之靈所出版的書籍。但是，因為是在中共的審查下所出版的書籍，所以其內容也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便能夠通過審查），注意不要進一步損害潘漢年名譽。

其主線基本上是“中共間諜勇敢地打入敵人內部，從日本獲得情報，為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軍在抗日戰爭中獲得勝利作出了貢獻。而在這段期間內國民黨軍則和日本勾結，消極抗戰”。並且認為中共間諜沒有把任何中共的情報洩露給日本。

筆者雖然非常不想否定這些為了恢復潘漢年名譽而寫的書的內容，但是毛澤東派潘漢年等間諜前往上海，為的就是讓共產黨軍和日軍同謀，打擊蔣介石國民黨，對潘漢年抱有好感的岩井英一在回憶錄裡是這麼寫的，並且中共方面的資料也“不小心”暴露了這一點。

並且本書第六章會詳細描寫，和毛澤東爭奪權力的王明，在自傳中記錄下了自己因為反對毛澤東“為戰勝蔣介石而和日本帝國主

義合作”的方針，二人之間發生激烈爭吵的場面（參見王明自傳《中共50年》）。

我們先來看看岩井的回憶錄。

岩井在見到袁殊所介紹的潘漢年後，對他的印象很好，覺得他是“非常穩重的知識分子，又是幹練的城裡人”。

潘漢年也非常積極地想和岩井見面，第二次以後的見面地點“都由潘漢年所指定”。並且為了潘漢年能夠隨時都能見到自己，特意派了一名叫田中信隆的手下來負責和潘漢年的聯絡。潘漢年想必是非常的積極。

然而，中共審查下出版的基本關於潘漢年的書都寫道，潘漢年因為袁殊的失誤被迫和岩井見面，並且“和岩井在一家日本餐館見面後”，“很快就返回香港了”。

這是和事實不符的。岩井不僅在第一次見面之後，因為潘漢年太過頻繁的提出想要見面，所以特意安排專人負責聯絡，並且還在書中如此描寫潘漢年所指定的見面地點——

見面地點通常是在從外灘進入南京路後走百米左右左手邊外國人開的巧克力店裡。……潘出生於上海附近的江蘇省宜興縣，對上海十分了解，所以利用這些外國人開的店作為安全地點。西安事變前

他和張學良在上海見面的時候也是在上海西郊的餐館之中，喜歡在這些歐式的地方見面，並不光是為了安全考慮，也是因為他這樣的知識分子喜歡這種地方吧。

如此這般，十分詳盡。並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岩井對潘漢年的好意和欣賞。

從這些可以看出，絕對不是因為袁殊的失誤潘漢年才被迫和岩井見面，而是潘漢年想要和岩井見面，所以才有讓袁殊介紹一事。而之所以要混淆這一點，就是因為這裡隱含有毛澤東“和日軍同謀”的意圖在裡面吧。這反而透露出在中共審查下出版的書籍，想要寫下事實是如何的困難。袁殊在書中顯得有些像壞人，令人遺憾。這也是因為關於潘漢年的書出版的時候，袁殊已經不在這個世上了。

中共方面的所有資料都明確表示“當然潘漢年等人沒有把中共方面的情報交給日本”，連謝幼田的書中也寫道，“潘不可能提供有關中共的情報給日本”。

然而岩井在《回想的上海》所記卻和這恰恰相反。

潘漢年為什麼向岩井提交了中共的資料？

有一天，岩井很隨意地委託潘漢年以來自普通情報提供者提供的書面報告的方式，寫一份關於中共內部情況和今後動向的報告書。岩井本以為會被拒絕，但是潘漢年卻一口應下，並且岩井在不久之後收到了很長的一份報告書。

為了知道這一報告中寫了什麼，筆者在外務省和防衛省的內部檔案中拼命翻查，卻沒有找到有“岩井英一”“潘漢年”及“胡越明”等詞的檔案。在日本出版《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的時候，出於出版時期的限制，無法耗費更多時間來查找，所以就先放棄了。

而在本書出版中文版的時候，因為時間稍微有了些寬裕，所以筆者就泡在外務省的外交史料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一張張的翻查從1938年到1942年左右的情報。還是找不到與“岩井英一”“潘漢年”“胡越明”等關鍵詞有關的信息。有記錄說岩井曾經以從自己名字的發音“IWAI”由來的“一〇一”作為代號來傳達情報。日語的“〇”也可以讀作“WA（輪）”。不過還是找不到。

於是筆者就找外交史料館的館員商量，在說明情況之後，館員告訴筆者“說不定在支那事變的資料中會有相關情報”。聽到“支那事變”這一詞，在中國出生成長的筆者就感到天生的反感——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厭惡。日本人所說的“支那事變”，指的是侵華戰爭中從1937年7月7日發生的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到1941

年12月9日中國對日本宣戰的這一段時期。沒想到他們居然以這個詞作為分類。館員說：“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情報都被整理在了一起，請去翻一下那邊的資料。”

既然有各地分門別類的情報，那麼也許上海的情報都被歸類在了一起。在經過仔細的調查之後，終於發現了名為“昭和十五年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關於支那事變狀況的報告 支那各地報告 上海情報”（第二卷）的一大堆資料——厚厚的，接近10厘米。太好了！這裡一定有，終於找到了！（昭和十五年是1940年）

筆者壓抑著激動的心情，一件件地翻看資料，留意到日期是1940年3月23日的“機密第795號”情報。這是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三浦義秋發往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三浦總領事是於1940年3月21日從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長白袖榮松手中收到了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號”。

這份機密情報的標題是“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

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一書中寫道，岩井認為他收集的關於重慶政府和中共的情報，特別是通過特務行動獲得的情報，只給自己一個人看太浪費了，所以不光是把情報翻譯成日語轉發給大使館和各地的總領事館、事務所，還發往上海的陸海軍相關機構以及憲兵和警察機關。

潘漢年和岩井第一次見面是在 1939 年的秋天，此後有一天，岩井突然委託潘漢年“寫一份關於中共內部情況和今後動向的報告書”，而在這不久之後就從潘漢年手中收到了報告書。這麼一算的話，岩井拿到報告書的時間，應該是在 1939 年末到 1940 年初。此後將中文翻譯成日語，大概需要一到兩個月。

翻譯成日語的報告被發往各有關部門，其中就包括警察署。報告發到警察署手裡，最早也要到 1940 年的 2 月到 3 月左右。

《機密第 795 號》的日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並且其標題，正是“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

這份日語文件有大約 40 張紙，一共 80 頁。中文版的長度也有幾十頁，和岩井所說的“很長的一份報告書”也吻合。

《機密第 795 號——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的開頭寫道：“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一部分的新編第四軍今後將會如何活躍，並且適合過渡階段的需求的報告”。潘漢年正是曾隸屬於新四軍。

報告書主要以 1939 年 3 月共產黨軍江南指揮部召開的參謀會議上，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所發表的內容為中心。項英一直反對毛澤東“為了壯大中共，打倒國民黨而進行國共合作”的基本路線，而持有“國共合作就應該和國民黨建立真正的統一戰線，聽從國民政府的命令”的意見。在國共合作之前的富田事件時，項英也強烈

反對過毛澤東殘殺有“AB團嫌疑”的黨員。所以經常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發生爭執，最後於1941年3月14日被自己的部下所殺害。

報告書中介紹了新四軍在江南地區，特別是安徽省皖南地區的活躍和今後的方針。前半部分對日軍的動態進行了分析，並且記錄了新四軍過去進行游擊戰的方法。其中記載了諸如反省日軍火力強大，決不能進行正面戰鬥；日軍正在離間人民群眾和新四軍的關係，先是通過威脅等強硬手段，而在這種方法失敗之後，就反其道而行之，給小孩子發糖，和當地的青幫等平民結拜為兄弟，給義母支付養育費等方法來收買人心等內容。

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強調“必須遵從蔣委員長”——蔣委員長，乃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委員長蔣介石。

例如，在機密檔案中有如下記錄。

158頁：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領導下，堅持在江南的抗戰並攻擊敵方陣地。

159頁：一定要向江南的人民群眾廣泛的宣傳蔣委員長在南嶽會議（1938年11月）上的訓詞以及國民政府的法令。

160頁：擁護國民政府的全國統一。成為國民政府的國防軍。

166頁：當以蔣委員長的訓詞作為我軍建軍的基本方針。

172頁：蔣委員長在南嶽會議上的十一項訓詞中，特別是第一、

二、三、四、五、六、七、九、十項尤為重要。

這些都和毛澤東的方針大相徑庭，很難想像，這是中共軍參謀會議上所討論的內容。這樣下去的話，項英必然要和毛澤東產生衝突。

以下的內容可以作為證據。例如——

184 頁：去年 6 月，提出了“反對輕視參謀工作”的提案，但是沒有獲得任何贊同。但是培養和教育參謀人才和其領導乃是非常重要的。

190 頁：需要著重培養革命軍人的“武士精神”。

這裡的“武士精神”乃是蔣介石在日本留學中向日本軍人學來的，很難想像這是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的共產黨軍的想法。

有很多這樣的表述，明確地揭示了共產黨軍內部的矛盾。這一矛盾最終導致了 1941 年 1 月共產黨軍和國民黨之間內戰“皖南事變”的爆發。同時，因為這是主張維持統一戰線的項英的報告，所以也可以從中看出國民黨軍的動向。

這些厚達十多厘米的資料還有好幾種，但是經過筆者多次前往外交史料館仔細的尋找後終於確定，從同時滿足“時期”“長度”“地點”“內容”這幾個條件上，可以判斷，這份《機密第 795 號》，正是潘漢年向岩井所提交的報告書。

在《昭和十五年 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關於支那事變狀況的報

告 支那各地報告 上海情報》的第一卷中,也有許多資料,但是卻沒有一個能夠同時滿足上述幾方面的條件。

筆者對這一系列資料中其它年份:“昭和十四年”(1939年)、“昭和十六年”(1941年)、“昭和十七年”(1942年),也進行了調查,雖然也找到了共產黨員名單和中國共產黨施政綱領等有趣的資料,但是都不能全面符合“潘漢年向岩井提交的長篇報告書”這一條件。

所以可以做出結論,《機密第 795 號》正是潘漢年向岩井所提交的報告書。

此外,非常有趣的是,共產黨員名單雖然長達幾十頁,列舉了主要的黨員名單,但是在第一位的卻不是毛澤東,而是朱德。

為何潘漢年會把關於中共內部的報告書提交給岩井?

其理由大概可以這麼考慮:

——通過向岩井匯報中共內部的情報來獲得岩井的信用。潘漢年真正的目的乃是下面所說的,爭取實現“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停戰”。所以,把和毛澤東的方針不一致的,也就是說與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大相徑庭的報告書,當作共產黨軍的方針提交給日方,對毛澤東來說不痛不癢,卻能博取岩井的信任。岩井懂得中文,所以在拿到潘漢年的報告書的時候,就知道其內容了,不需要等到翻譯完畢。也即是說,在 1939 年年末,他就知道了報告書的內容,那麼

接下來所寫的來自潘漢年的請求，大概可以判斷是在 1940 年 3 月汪精衛政權在南京成立之後的事情。

潘漢年向日軍提出停戰

令人震驚的是，潘漢年向日方提出簽訂日軍和中共軍之間互不侵犯的停火協定這一點。筆者想核實的正是這一情報。

讓我們看一看《回想的上海》的第 165 頁是怎麼寫的：

某一天，潘漢年通過袁殊主管，向我提出共產黨軍希望和在華北的日軍停戰，希望我能夠和日方聯絡幫忙進行交涉。我雖然對軍事的事情一竅不通，但是在華北地區日軍和共產黨軍隊戰線犬牙交錯，就算要停戰也會有許多具體如何實現的問題，我認為是非常難以實現的。但是我被人拜託事情的時候，就算是覺得不可能也不會一上來就拒絕掉，而是盡自己的努力幫忙。所以關於潘漢年的這個請求，我決定先去拜託影佐，看看他覺得可不可行，所以就在聯絡了他之後，讓袁殊帶潘漢年去南京的最高軍事顧問公館和影佐見面。最後和預計的一樣，似乎沒有顯著結果。並且當時，潘經過影佐的介紹也和汪精衛主席見了一面。估計他們之間可能商量的關於和汪精衛政府和平部隊之間停戰的事情，但是似乎也沒有什麼結果。

儘管如此，正如前面所寫的：在上海和張學良密會，為了讓蔣介石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到敵方佔據的南京和陳果夫見面，並且來到正處於戰爭狀態的日本掌控區域中，通過興亞建國運動的袁殊和陳孚木來接近我，又以在華北停戰談判的名義和當地日軍的重鎮影佐見面，甚至和新政府最高領導人汪精衛見面……從潘漢年沉靜的外表上，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他是哪來的勇氣，如此三頭六臂的活躍，實在是令人佩服。

已經不需要任何解釋了。

毛澤東的真正目的到這裡已經是水落石出。

從《回想的上海》第18頁的記錄也可以看出，潘漢年是接到了毛澤東的命令才提出的請求。

岩井很偶然的在日本戰敗的兩個星期前返回日本，所以沒有在中國作為戰犯被逮捕。而岩井在書中寫道，在日本戰敗後、共和國成立之前的某一天，岩井收到了來自周恩來的會面請求。

他在上海認識的一位叫李仲成的人，某一天前往岩井在日本的家登門拜訪。並且多次勸他：“中共的周恩來在戰後（日本戰敗後）第一次從南京來到上海的時候，就在找你。似乎有什麼事，你何不去見他一面。”

對此岩井在回憶錄中寫道“周恩來應該很清楚潘漢年拜託我

幫忙調停中共軍和日軍在華北停戰這一件事”，他認為戰後中共稱霸大陸只是時間問題，周恩來想必是想要和自己商量此後中日兩國建交的問題。

也就是說，岩井知道“提出停戰”乃是來自毛澤東中央的命令。

在研究中國的歷史學者中，也許會有人質疑潘漢年負責華中事務，所以不應該由他提出在華北停戰的提案。為此，筆者需要在此說明一下，毛澤東命令潘漢年和岩井英一進行接觸，應該不僅僅是為了華中的事務，而是為了整個共產黨軍的事務。

岩井英一在上海設立岩井公館，也不僅僅是為了獲得上海的情報，而是作為“日本”想要“中華民國”的情報，僅僅是地點放在上海而已。潘漢年也曾擔任過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1939年又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工作。所以說，太過於糾結岩井和潘漢年說話時出現的“華北”這個字眼，並不適當。

《毛澤東年譜》1939年3月19日的記錄中，毛澤東做出了“鞏固重於華北”，“發展則應著重魯、蘇、皖、豫、鄂五省”的指示。因此，應該可以認為潘漢年像岩井所記錄的一樣，接到了避免和華北日軍發生衝突的指示。

另一方面，汪精衛政權於1940年3月成立，而從“汪主席”這一稱呼可以推測出，潘漢年提出停戰要求，應該是在1940年3月

之後。

並且影佐禎昭在成立梅機關之前只是大佐，之後才升為少將、中將，並且在汪精衛政權成立一個月之後，於 1940 年 4 月就任其最高軍事顧問。那麼岩井讓潘漢年前往最高軍事顧問室，就應該是 1940 年 4 月以後的事情了。

也就是說，按照前面所做的分析，潘漢年之所以把寫有中共內部情報的報告書交給岩井，其目的是為了獲得岩井的信任，以便能夠提出“停戰”的要求，這一結論在這裡也獲得了佐證。

但是，岩井是外務省的人，沒有資歷，對軍事也是一無所知。他只是為了讓兩國之間獲得和平，為此而獲取蔣介石國民黨軍方面的情報。中共說潘漢年行動的目的是為了接近岩井公館，“從日本獲得日軍的軍事情報，為中共軍在抗日戰爭中獲得勝利作出了貢獻”。然而岩井沒有任何可能性直接向潘漢年提供日軍情報（因為他對日軍的軍事情報一無所知），而日軍也不可能向潘提供對日軍不利的情報，並且就像接下來所說的一樣，中共反而從岩井手中獲得了巨額的情報報酬。

不管怎麼想，都不可能是從日本獲得日軍的軍事情報。

中共方面的資料中說，“岩井是為了中日親善和平運動，所以引薦潘漢年和影佐見一次面”，並且在關於潘漢年的一系列書中，都寫道：“只在六三公園和影佐見了一次面”，“彼此只是泛泛地說

些符合自己身份的客套話而已”。

這也和事實不符。潘漢年和影佐第一次見面，是在最高軍事顧問公館，此後又在六三公園多次碰頭。六三公園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於 1890 年購入大片土地後建造的，不光有飯店，還有娛樂中心等社交場所，相當於現在的高級俱樂部。

在中共方面的資料中，還說潘漢年是“事出意外，被（李士群）挾持會見汪精衛”。而潘漢年之所以被逮捕入獄，則是因為事後沒有向毛澤東報告秘密會見汪精衛，所以才著重筆墨描寫為什麼會和汪精衛見面的過程。在中方的記錄中，潘漢年是於 1943 年和汪精衛見的面，然而從日本這邊的內部記錄來看，這一點也很值得商榷。

雖然很對不起想要恢復名譽的潘漢年及其友人，但是我必須說，事實恰恰相反。而且筆者堅信，把真正的事實書寫下來，絕對不會是對潘漢年名譽的毀損。因為顯而易見，他只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行動而已。但是中國卻沒有勇氣承認毛澤東和日軍同謀這一“令人恐懼的事實”。但是就像謝幼田在他的著作中所寫的一樣，紙包不住火，這已經是無法被掩蓋的事實了。

1968 年由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所編纂的《戰史叢書 北支的治安戰》〈1〉（朝雲新聞社）第 384 頁，也有 1940 年 10 月 1

日由“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所撰寫的“關於國共關係”一文，其內容大略如下：

——中共方面最終的目的，乃是打倒重慶政府，取而代之掌握全國政權。但是中共目前的實力還非常薄弱，並沒有取代國民黨奪取政權的實力。所以共產黨軍現在的任務乃是讓日本和重慶政府盡量陷入長期的戰爭，並且在這期間積蓄力量。因此，國共兩軍衝突不利於擴大自己的軍隊，在表面上服從重慶政府，私下卻為了讓重慶政府不和日本議和，進行阻擾。因為如果日軍和重慶政府戰鬥的時間不夠長的話，共產黨軍就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壯大自身。

從和岩井英一等外務省一派不同的視點，卻和岩井英一導出了同樣的結論，實在是很有趣。這也和謝幼田的分析完全一致。但是《戰史叢書 北支的治安戰》這本書中，有大量內容是基於日本戰敗後中宣部所提供的情報，儘管如此，這本書中還是寫有中共想要拖長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這一點很重要。

而在《回想的上海》一書中，也記錄了潘漢年為了不讓日本和重慶政府議和而做出的努力。

汪精衛政權 1940 年 3 月成立，而在這之前的 1939 年 12 月，日本軍部內部一派認為汪精衛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實現中日兩國之間

的和平，認為還是應該和重慶政府的蔣介石直接進行和平談判，所以開展了新的“和平工作”，秘密派遣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謀今井武夫大佐，前往香港和澳門，摸索和蔣介石直接溝通的方法。

這時候擔任重慶政府代表的是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宋子文在孫中山亡故之後曾經擔任過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在侵華戰爭爆發之後，在遷移到重慶的國民政府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孫中山遺孀宋慶齡和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都是他的姐妹。

日本軍部（參謀本部和陸軍省）認為既然宋子良是宋子文的弟弟，那麼肯定有接觸蔣介石的渠道，就在私下裡全力投入通過宋子良的和平工作，也就是“桐工作”。

然而有一天，潘漢年讓岩井“趕緊來香港一趟”。

岩井心想潘漢年特意讓自己去香港，想來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就趕去了香港。潘漢年對岩井這麼說：

——現在，日本陸軍和重慶的各代表之間，正在香港、澳門兩地為了中日兩軍的停戰乃至全面和平進行秘密的交涉，並且準備在湖南省長沙舉行蔣介石和板垣總參謀長的會談。然而重慶代表宋子良完全是個假貨，派這個假貨來當代表，乃是因為這個和平會談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如果被這些人說動，讓板垣去長沙談判的話，則會陷入危險。

岩井聽到這一點，大驚失色，馬上返回上海向阿部大使匯報。阿部大使也馬上向板垣參謀長傳達了潘漢年所說的事情，於是“桐工作”就以失敗告終。

可以看出，中共方面是如何想盡一切辦法阻擾中日（日本和重慶政府）之間的和談。因為無論如何，如果不讓抗日戰爭長期持續下去的話，中共就會缺少壯大自身的時間。如果抗日戰爭很快就完結的話，共產黨軍將無法在之後的國共內戰中獲得勝利。為了壯大到能夠打敗國民黨軍的程度，所以才希望日軍和蔣介石之間一直戰鬥下去吧。

毛澤東奪取天下的路線圖就是這樣。

人類不能永遠被欺騙。我相信中國人民也有正視真實的勇氣。

證據還有許多。

提供情報的報酬是多少錢？

稍微回溯一段時間，就像前文所述，潘漢年於1939年4月離開延安，5月到達香港，目的是為了治療眼疾。這時候提出讓他去香港治療眼疾的，正是康生。

康生原本一直追隨著毛澤東的宿敵、共產國際代表王明。1933

年王明作為團長、康生作為副團長前往莫斯科，在間諜頭子貝利亞手下接受間諜訓練。貝利亞是斯大林大清洗計劃的主要執行者之一，手段凶狠毒辣，殺害了許多政敵。

而康生回到中國之後，在王明受到重視的時候就追隨王明，而毛澤東掌權、王明下台之後就立刻倒向毛澤東，對王明發起猛烈的攻擊，並且在延安撮合自己以前在山東時接觸過的江青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來博取毛澤東的歡心（康生安排江青毛澤東延安相識並結婚的內幕，參見師哲口述、李海文著、九州出版社《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這時候毛澤東雖然有妻子賀子珍，但是卻被在上海以藝名藍蘋出道的江青所吸引。和延安革命的氛圍迥然不同、充滿了都市情調的江青，想必是讓毛澤東耳目一新，深深地吸引了他。

賀子珍是毛澤東在井岡山上殺害的袁文才的同伴賀敏學的妹妹，而和她結婚的時候，毛澤東的妻子仍然在世。他和恩師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生有三個兒子，然而卻已多半不會再見的理由，和賀子珍結了婚。楊開慧於1930年被國民黨逮捕，在被捕後拒絕了國民黨讓其和毛澤東離婚並發表聲明批判毛澤東的要求，而被槍斃。而毛澤東卻於1928年楊開慧還在世之時就和賀子珍結了婚。

這次毛澤東又要拋棄賀子珍和江青結婚，遭到了周圍的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的強烈反對。自稱“藍蘋”的江青在上海被叫成

“爛蘋果”的“爛蘋”，乃是因為她不斷地出軌和離婚，是一個全身上下都是醜聞的女人。不少人都因為毛澤東現在還有妻子、江青又是一個淫蕩的女人而反對這場婚事，但康生表示贊成。這時候毛澤東的合法妻子賀子珍正在莫斯科留學，而康生則能夠控制她。所以毛澤東才會重用康生，並且主動採用他的貝利亞的肅反手段。

而正是這位中共中央情報部長、毛澤東的左膀右臂的康生，讓潘漢年去上海治療眼睛的同時，“順便”在香港建立中共的革命據點，在那兒集中進行間諜活動。這當然也是毛澤東的指示。這時候潘漢年就已經收到了“和支撐即將成立的汪精衛政權的間諜組織（76 號）的李士群接觸，分裂主張中日和平的汪精衛政權，讓抗日戰爭拖久一點”的指示吧。如果抗日戰爭太早結束的話，中共就會沒有壯大自身的時間，所以抗日戰爭拖得越久，對中共來說就越有利。

這是毛澤東下的一盤大棋。也是和政敵王明之間最大的對立之處。毛澤東和康生聯手，給臥病的王明投慢性毒藥，讓其身心俱損，以實施和日軍同謀的戰略。

中共當時已經在香港皇后大道中 18 號“粵華公司”設立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經營茶葉生意掩人耳目，並由廖承志負責。

中共政權誕生後，所有的間諜都被逮捕入獄，只有廖承志得以倖免於難。因為他出生並成長在日本，回過一次中國，但是之後

又回到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能操一口流利的、有朝氣的江戶口音的日語，在日語能力方面當時無人能出其右。所以毛澤東才認為廖承志是“有利用價值的人”，而讓他活了下來。中共建政後邀請舊日軍訪華，和高碕達之助之間建立 LT 貿易等等，都是因為廖承志才能夠得以實現，從這一點上，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正如在序言裡所寫：LT 貿易，正是取自廖承志 (Liao) 和高碕達之助 (Takasaki) 二人英文名的首字母。

毛澤東唯獨讓廖承志活下來還有別的理由。

廖承志不像潘漢年等人一樣直接打入了日軍或汪精衛政權之中，而是在香港的間諜據點，借國共合作之便，為中共擴大其勢力而獲取物資和經費，所以不像潘漢年等在第一線工作的人員一樣，知道太過於赤裸裸的事實。

而且廖承志派遣了多名中共間諜打入岩井公館，鳩占鵲巢。其詳情將會在下一章進敘述，而這一點乃是可以光明正大地留在中共黨史上的功績。所以讓廖承志活著對毛澤東也有有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有記載，會見岩井後很快就返回香港的潘漢年，在經過認真考慮後，決定利用岩井這個關係，把香港的情報攤子再擴大一些，並且讓袁殊向岩井提出要求：“每半個月向岩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要求他們每月供給我們 2000 元

港幣作為情報費用。另外，辦刊物還需要一筆開辦費（10000 元港幣），也要請他們事先提供”。

和當時的一般勞動者的收入做一下對比：2000 元港幣，應該大約相當於當時華人警官 5 年的工資（《20 世紀早期香港華人的職業構成及生活情況》第 211 頁有記載：1939 年香港華人警官的年俸是 396 元港幣）。

袁殊立即將潘漢年的這個計劃通過日本駐香港領事館向岩井作了報告。岩井很快批准了這個計劃。他指示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小泉清一，和袁殊一起再去會見潘漢年，並帶去 10000 元港幣作刊物開辦費用。

在岩井的回憶錄裡沒有關於經費的詳細描述。首先岩井這個人不是很在意金錢，並且因為所有的經費都是非正常地從外務省機密費中所出，所以他也許不願意公開這一點。本書的日文版中根據岩井模糊的記憶有給出大致的金額，但這個數字需要經過根據外交史料館等處所藏的資料進行具體的分析，然而因為是機密費用，找不到相關的記錄，所以就不在這裡給出具體數字了。

但是岩井對中共方面可以說是求必應，要多少給多少，這個數字想來是非常龐大。岩井自己也寫道，在戰爭中用了最多的外務省機密費的正是自己。並且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岩井才被降級從上海調到了廣州。

若每個月提供一次相當於華人警官 5 年工資的情報費用，那麼，中共一年內就收到了相當於一個香港警官 60 年工資的報酬；此外，中共還打著創辦雜誌等名義，不斷地向岩井索要巨額金錢。

以廖承志為首的香港間諜據點，把這些都花在中共的宣傳工作上，為增加黨員、強化中共做出了貢獻。

謝幼田的這本書，書名《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取得真好——正是如此！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之所以會越來越強大，乃至能夠在日本戰敗後戰勝國民黨軍的最大謎團之一就在這裡。

如果沒有日本侵華的話，那麼我們的鄰國將不會是共產主義政權，而是國民黨政權了吧。也許蔣介石在世的時候還會持續獨裁，但是一定會像現在的台灣一樣，逐漸變成民主主義的國家。

這些機密費用都是日本國民血汗的結晶，逼日本國民禁止浪費、節衣縮食，甚至還餓死了不少老百姓，然而收上來的國民的血汗錢，卻被源源不斷地注入到中共那裡。

我們必須要感謝岩井英一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從這記錄裡能看出來的，不光是毛澤東和日軍同謀的事實，還有日本國民的血汗錢讓中共壯大，乃至誕生了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確鑿的事實。

第五章

與汪精衛政權同謀

在岩井公館鳩占鵲巢的廖承志
支持著汪精衛政權的日本軍人們
被近衛內閣的“南進政策”所救
針對特務機關 76 號的李士群
和汪精衛之間的密約, 另一個證言
潘漢年和汪精衛再次會面

在岩井公館鳩占鵲巢的廖承志

中共往岩井公館派遣間諜並不是中共方面的誇張，岩井英一也在《回想的上海》中“組織政黨準備工作正在進行，選定本部主幹人選”（118頁～121頁），也承認了這一點。以袁殊為中心，其轄下幾乎所有的幹部實際上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或中共間諜。岩井在戰後寫回憶錄時，雖然參考了金雄白所著《同生共死的實體——汪兆銘的悲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池田篤紀譯、時事通訊社、1960年），但是岩井本人在影佐委託他組建新黨的時候就對袁殊說過，“共產黨員也沒關係”，想來當時就已經知道這件事了吧。在此參照中共方面的資料，列舉一下當時在岩井公館的中共間諜幹部的名字。

●翁永清：又名翁從六。中共間諜。興亞建國運動機關報紙《新中國報》總經理。掌握著財務相關權限。日本戰敗後回歸中共。死於汽車事故(?)。

●劉慕清：筆名魯風。中共間諜。興亞建國運動機關報紙《新中國報》總編輯。中共建政後，於50年代初期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投入獄中，消息不明——消息不明的意思就是死於獄中了。

●惲逸群：又名惲介生。中共間諜。擔任興亞建國運動的新

聞出版編輯。中共建政後，於 50 年代初期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投入獄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受盡摧殘。文革後沒多久即去世，死後被恢復名譽。此外還有擔任編輯業務的人和秘書周靜等多名中共間諜。

●劉人壽：又名楊靜遠。在岩井公館地下設置了無線電。在深夜和延安進行聯絡。因為沒有在岩井的回憶錄中出現此人，故認為岩井對此事並不知情。

●陳孚木：曾任蔣介石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受廖承志之託參加岩井公館興亞建國運動的中共間諜。按其本人的記錄所述，曾於 1944 年 11 月與當時總參謀長兼上海陸軍部長川本芳太郎密談。日本戰敗後加入中共的新四軍。在中共政權成立後的 1959 年病死。

興亞建國運動的幹部們幾乎全是中共間諜這一點可以說是一目了然。這些人都在廖承志的指揮下，獲得潘漢年的協力進行活動。

廖承志上面有周恩來、葉劍英和毛澤東，毛澤東的影子下隱藏有死刑執行人貝利亞的弟子康生。周恩來不用說自然是從中共建政後到去世為止一直擔任國務院總理（曾兼任外交部部長）的人物，葉劍英則在抗日戰爭中擔任過八路軍參謀長及中共中央軍

委總參謀長等職務，在文革中擔任國防部長。

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後把自己的地位讓給毛澤東，讓毛澤東成為了最高軍事領導人；而葉劍英則在長征中毛澤東和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發生爭執的時候，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過他。

實際上這時候有一個只有毛澤東和葉劍英才知道的陰謀（太長所以不在此詳述），葉劍英則作為軍人對此守口如瓶，向毛澤東效忠。所以毛澤東送給葉劍英兩句詩“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兩句詩是說，諸葛亮一生最重要的就是謹慎，而呂端（北宋初期的宰相）不拘泥於小事，但是大事不會糊塗。毛澤東把知道自己陰謀的人全部抹殺掉，而葉劍英為何能夠得以逃過一劫呢？因為軍隊高級將領大部分都被投入獄中，而為了掌控軍隊，把他們全部殺害也不現實。所以軍人之中只有毛澤東認為守口如瓶的葉劍英才活了下來。

雖然葉劍英看上去和間諜活動沒有什麼關係，然而為了能夠和日軍同謀，控制汪精衛政權的軍事動向，他是不可或缺的人。就像後文中王明在手記中暴露的一樣，毛澤東不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是私下裡向軍人發出極密指示。

潘漢年於1939年晚秋被派往上海進行間諜活動。

我們需要從更高的視點來看這時候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1939年8月23日，德國和蘇聯之間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斯大林和死對頭希特勒，居然攜手，簡而言之即是，他希望納粹政權的矛頭指向西歐各國。德蘇兩國之間按照條約保持了兩年左右的和平，最終在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撕毀了條約，入侵蘇聯。

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最大政敵蔣介石所率領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則和德國進行合作，試圖讓軍隊和國防產業近代化。蔣介石於1928年終於打倒了割據各地的軍閥們，成功北伐並統一了中國，然而因為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距離真正的國家統一越來越遠。在這種情況下，中德兩國之間加強合作，對蔣介石國民政府和德國希特勒政權來說，在反共這個目標上是有共同利益的。

希特勒打算依靠日本來對抗蘇聯的共產國際，於1936年11月25日締結了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然而中華民國政府卻於1937年8月21日和蘇聯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希特勒一怒之下，就和敵人斯大林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其結果導致毛澤東也順手推舟做出了“反蔣聯日”的方針。想必毛澤東這時候認為這是打敗國軍的好機會。潘漢年於1939年晚秋和岩井第一次見面，這是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按照《毛澤東 真實的故事》一書中所述，斯大林在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後，就裁減了對毛澤東的金錢援助。這也導致了毛澤

東更加傾向於和日本攜手，以便能從日方獲取不足的資金。

潘漢年從此和岩井英一的關係越來越緊密，而在他們的延長線上則有汪精衛政權。

此外，希特勒於 1941 年 7 月和重慶國民政府斷交，並承認南京的汪精衛政權為正式的“國家”。

支持汪精衛政權的日本軍人們

然而，就像前文所述一樣，熟知中共地下黨員行動的周佛海，已經得出“岩井公館已徹底被中共間諜滲透”的結論，並且向影佐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停止整個興亞建國運動。他堅持如果不停止興亞建國運動的話，汪精衛政權將會無法成立。最終影佐讓岩井放棄組建新黨，並要求其停止進行興亞建國運動。名義上岩井公館在成立一年之後就被解散，並為汪精衛政權的東亞聯盟所吸收。

這裡我們來就汪精衛政權究竟是什麼樣的存在，以及毛澤東打算怎樣利用汪精衛政權進行分析。為此，需要先知道汪精衛究竟是怎樣想的。

汪精衛政權於 1940 年 3 月 30 日正式成立，汪精衛的政治目標是“和平”，並且他相信“和平”絕對不意味著賣國求榮。這是

基於孫中山於 1924 年在日本神戶舉行的“大亞洲主義”演講的精神，汪精衛不是貪圖權勢，而是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理解和繼承了孫中山的人。以下簡單介紹一下孫中山的這篇全長 6202 字演講的內容——

歐洲列強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而我們東洋向來輕視霸道的文化。還有一種文化，好過霸道的文化，這種文化的本質，是仁義道德。而要復興亞洲就一定要貫徹以王道為中心，打抱不平，團結亞洲受苦民族的“大亞洲主義”。

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這次戰爭的影響，便馬上傳達到全亞洲，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一個極大的希望。亞洲國家學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是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大致就是以上這些內容。

汪精衛記錄了孫中山的遺囑，並且特別重視其中“（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部分。

而汪精衛在傳記中寫到他期待並且願意相信日本能夠平等對待中華民族。然而實際上汪精衛為建立政權來到日本時，感受到日本軍部傲慢的態度，發現實現這一點的可能性非常小。也許他已經很後悔要建立新政權，但是已經無路可退。於是只能揮淚宣讀了遷都式——“遷都”的意思是，自己才是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者，所以要把首都從重慶遷回南京。

而輔佐汪精衛的二號人物周佛海之所以要阻止岩井的興亞建國運動，也正是因為其有違孫中山的這一精神。

汪精衛對當時的陸軍參謀影佐禎昭大佐（後任少將、中將等）表示自己是為和平而來，如果和平來了，他並沒有抓住權力不放的打算，無論是誰來掌權都無所謂。影佐深為汪精衛所感動，並且其本人也是嚮往和平的，因此為了支持汪精衛政權，在上海梅花堂成立了組織來支持他，這就是後世所稱“梅機關”。然而影佐在他所寫的“曾走路我記”（1943年12月13日記於新不列顛島拉包爾）一文中，強調“梅機關”並不是特務機關，而僅僅是為了幫助汪精衛樹立政權並且和日本之間進行溝通的機關（1966年，美篤書房《現代史資料13 日中戰爭5》所收錄）。

按照影佐的說法，“梅機關”乃是由陸軍、海軍、外務省以及民間人士所構成，其經費是由各自所屬（軍隊或者省廳）擠出來的。然而在軍隊中也有人將梅機關當成特務機關，影佐在書中對此表示十分遺憾。

說到特務機關，上海有“上海特務機關”，南京有“南京特務機關”，各自有規定的轄區，名副其實地在進行特務活動，所以影佐在《曾走路我記》中斷言“上海的梅機關並不是特務機關”。影佐也主張“汪精衛政權並不是日本的傀儡政權”，並且以其本人和汪精衛政府之間的種種妥協及對日方的交涉來說明自己的行動目的。然而，在汪精衛政權建立之後，梅機關由晴氣中佐主管，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特務機關，故而本書中也稱呼它為特務機關。

中國現在認定梅機關是最為心狠手辣的特務機關，而岩井公館則是大間諜岩井為了蹂躪中國人民而設立的組織，把岩井和影佐當成了邪惡的化身。所以才會在近年開始製作相關的電視劇，比如說習近平上台之後，2013年，在中央電視台 CCTV 播放了描寫袁殊一生的電視劇，給人一種時到今日還要再來洗腦一遍的感覺。

然而毛澤東自己已經看穿了汪精衛政權的本質，注意到梅機關在汪精衛政權誕生的同時消失，影佐則成為了汪精衛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這一點。

對毛澤東來說，不管是哪派國民黨軍，都不能讓他們獲得和平，需要讓他們盡量長期和日本戰鬥並消耗，才能讓共產黨軍最終獲得勝利，這樣才能迎來毛澤東的帝王時代。需要讓侵華戰爭拖得越長越好，所以需要讓汪精衛政權內部分裂，阻止和平的到來，讓日軍不要攻打共產黨軍。這正是毛澤東的戰略。

第四章所介紹的，岩井在回憶錄中所記錄的來自潘漢年的“向日軍提出停戰”的要求，正是在這個時期。

謝幼田在他的著作《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中，用銳利的目光仔細地追尋了潘漢年如何把情報傳遞給岩井。他認為對岩井來說潘漢年的利用價值很大，在書中多次寫到，“正因為潘提供的情報有價值，所以和日本情報機關的交換能夠長期維持”。大概是因為《潘漢年傳》和《潘漢年的情報生涯》都是潘漢年的朋友在他死後，為了幫他恢復名譽才寫的書，所以作者也有可能不知道潘漢年、或者說毛澤東究竟想要從岩井身上獲得什麼。

然而事實很簡單，毛澤東希望日本“不要攻打共產黨軍”，所以才對日本提出“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秘密締結停戰協議”，並且作為合約的報酬，把重慶國民政府的軍事情報賣給日軍，這是一個確鑿的事實。

日本一邊正在侵略中國，一邊又有提倡“和平論”，追求和平、

希望盡快和中國締結和平友好關係的日方的岩井和影佐，今天看來實在是充滿了矛盾。但是中日雙方都是基於偉大的革命家和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信念而行動。

汪精衛是認真地想要建立基於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和平政權，岩井和影佐在和日本本部逐漸疏遠的同時為和平而行動。日本軍部卻歪曲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斷章取義地解釋“孫中山希望亞洲成為一體”，而無視廢除不平等條約，立場對等的部分，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權益而侵略中國。

岩井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在書中多次寫下“那是侵略”的句子。在《回想的上海》的第242頁也明確記載有“最近從原總軍高級參謀岡田芳政那裡聽說，和石原莞爾一起策劃了滿洲（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大將，也承認滿洲事變是日本的侵略戰爭”，並且認為“從中國看來，兩國之間的戰爭的確是日本對中國領土和國家主權的侵略”。從岩井和影佐的性格上可以看出，他們絕對不是像中共方面所說的一樣因為“看重潘漢年的能量”，而是因為潘漢年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對岩井說自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所以岩井才相信他，並且一直到最後都保護他。

而實際上，對毛澤東來說，“和平運動”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抗日戰爭“是不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反而無關緊要。因為在毛澤東的心裡，只有和日軍之間“停火議和”，讓日軍不要進攻共產黨

軍，以保存有生力量，最終達到打敗蔣介石國民黨軍的算盤而已。

不正視這一事實，就無法看見歷史的真相。只有鼓起勇氣正視這一段歷史的真相，才能夠看清楚日本鄰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所以孫中山的演講和遺言是解讀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和現在中日兩國關係的關鍵因素。

然而，在岩井公館快要被關閉的時候，袁殊已經頻繁地被汪精衛召見。袁殊比岩井更早知道興亞建國運動將會消失，並被東亞聯盟所吸收。岩井對自己被蒙在鼓裡感到十分震驚。

梅機關也隨著汪精衛政權的建立而解散，而隸屬梅機關的海陸軍軍官以以下的形式成為了汪精衛政權軍事委員會的軍事顧問（出自《曾走路我記》）：

影佐禎昭少將：軍事委員會最高軍事顧問。

須賀海軍少將：海軍首席顧問。

谷荻陸軍大佐：軍事顧問。

川本陸軍大佐：軍事顧問兼協助丁默邨（特務總部 76 號的主管）轄下社會部業務。川本大佐就是川本芳太郎，中共間諜陳孚木曾經與其接觸並密談。

原田陸軍大佐：軍事顧問。

岡田陸軍主計大佐：軍事顧問。應財務部長周佛海之邀兼任

經濟顧問

晴氣中佐(以及輔佐他的塚本少佐):軍事顧問。協助李士群的特務工作。但是晴氣中佐及塚本少佐在軍事委員會中沒有明確的定位,所以就沿用過去的名稱,把事務所改名成了“梅機關”。這時候的“梅機關”毫無疑問是特務機關。

其他還有許多人,不過就先舉例到這裡。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中寫道,周佛海這時候對他自暴自棄地說:“這是辻政信搞的鬼,是進一步的侵略組織”。

而正是這樣的成員,才讓其對毛澤東來說變得更有利用價值了。

被近衛內閣的“南進政策”所救

潘漢年按照在延安的毛澤東的指示,先通過袁殊掌握了特務機關 76 號的動向。袁殊這個時候很受掌控 76 號的李士群看重,被提拔為南京政府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雖然袁殊被看成是中國史上罕見的五面間諜,但是本人實際上是小圓臉,身材矮小而微胖,身材和表情看上去都不像是間諜。為人友好又低調,甚至可以說是有些膽小。正因為如此,每一方都很喜歡並重視他,才能成為五面間諜吧。儘管實際上哪一方都

沒有真正的相信他，但是因為他有深入各方的經驗，所以手中的情報量的確是非常的豐富。

這時候對中國來說，日軍今後是要北上還是南下，乃是非常關鍵的情報。北上的話，日軍將會和蘇聯作戰，而蘇聯則會遭受到日德的兩面夾擊，這對和蘇聯合作的中共來說是不利的。並且，蔣介石國民黨軍會趁機向中共施加軍事壓力，而毛澤東則有可能會陷入孤立無援而被消滅的危機之中。

在《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中記載，毛澤東為此頻繁地聯繫共產國際，徹夜難眠。

實際上，1941年6月德國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入侵蘇聯。而日本陸軍也針對蘇聯，於7月7日以軍事演習（關東軍特殊演習）的名義在偽“滿洲國”蘇聯邊境上集結了70萬兵力，打算看蘇德戰爭的形勢趁機入侵蘇聯。

日軍是南下還是北上？

不光是毛澤東，包括蔣介石一方在內的全中國有關人員都在等待其結果。

而潘漢年的間諜網發揮其能力的，正是在這一次。袁殊在其遍布各方的間諜網中，終於發現了重要的情報。這就是1941年9月，近衛內閣排除了主張北上的松岡外相，組建新內閣並在御前會議上，通過了《帝國國策實施綱要》，決定讓日軍南下的消息。

雖然此前在 7 月的御前會議就已經決定了南下的基本方針，英國的電訊報也對此進行了報導，但是這時候的決議還有北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決定性的。與之相比，9 月御前會議則完全消除了北上的可能性。

毛澤東聽到這一消息一定高興得跳了起來。

日本的“南下政策”再一次挽救了中共。

當然在近衛內閣的知情人裡有蘇聯間諜佐爾格，和佐爾格關係緊密的《朝日新聞》記者尾崎秀實當上了近衛內閣的智囊，不能否定有佐爾格通過尾崎誘導近衛，讓事態按照蘇聯所想要的方向發展的要素。

《潘漢年的情報生涯》書中說，在收到這一密電後，延安的中共馬上就發電報告訴了蘇聯。蘇聯應該早就從佐爾格那裡收到了消息，在中共來電時已經開始把駐扎在遠東的蘇軍調離，命令了他們前往莫斯科集結並向西部戰線進發。

日本總是在最關鍵的時刻能幫上毛澤東。

所以毛澤東才會感謝日本吧。

中國一般的看法正是，日本在決定南下的瞬間就走上了敗北的道路。

針對特務機關 76 號的李士群

同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國之間發動了太平洋戰爭，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其對手是美、英、荷蘭等同盟國，而日本這一邊則只有德國和意大利這兩個法西斯軸心國。蘇聯和日本之間於1941年4月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但因為中華民國已經在和日本作戰，所以自然成為了同盟國之一。

這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好消息，因為己方多了許多幫手，而日本的戰場從中國擴大到東南亞及美國等地，導致其部署在中國的兵力突然減少。

對毛澤東來說就有些複雜了。

至少日軍放棄北上而開始南下是一個好的方面，這樣共產黨軍以及蘇軍就不至於被消滅了；然而日本的對手從蔣介石變成了全世界，這對蔣介石又是個好消息。所以毛澤東把目標放在了汪精衛政權上面。

對汪精衛來說，日本擴大戰爭的範圍，導致和平論就此破產。日本已經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霸道之路，更不要說孫中山所提出的大亞洲主義了。汪精衛終於明白自己相信日本的選擇是錯誤的，於是精神開始變得不安定，在自己召集的議會上甚至嚎啕大哭。

這時候雖然他的手下還有60萬兵力，但是政權內部已經分崩離析。

當時掌握財政大權，盡心盡力輔佐汪精衛的黨內二號人物周佛海對金雄白吐露“自己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日本擴大戰爭後，自己就成了賣國賊了”。金雄白在書中寫道，所以周佛海才开始和重慶政府的軍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首領戴笠私下接觸。

而在潘漢年傳記等書中，也提到握有特務機關 76 號實權的李士群，也在向他曾經歸屬的中共暗送秋波。

李士群生於 1905 年，年輕時成為中國共產黨員，於 1928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翌年回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然而卻於 1932 年被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兩大間諜組織之一中統所逮捕，為其所說服加入了國民黨。並且和國民黨的丁默邨等人一起在上海工作。1938 年接到重慶中統前往南京潛伏的指示，卻違反命令前往香港投靠了汪精衛。此後為日本陸軍土肥原賢二中將所說服，把丁默邨拉入汪精衛一派，在上海設立了特務機關。在汪精衛政權誕生前則在極司非爾路 76 號準備設置特務機關，抓捕中統的間諜並逼他們投靠汪精衛。

然而，他卻和汪精衛政權的二號人物周佛海關係不太好。李士群的權力慾望太強，總是在內部爭權奪勢。這些情報都通過袁殊交給了延安的中共中央。

1939 年晚秋，潘漢年在上海和岩井英一見面之後，收到了署

名葉劍英的一封密電。其內容是讓他把一名叫關露的女作家送到汪精衛政權的特務機關76號李士群的手下去。關露才華洋溢，曾經為多部電影的主題曲作詞。其文學性漸漸偏向左聯等左翼文學，後來被引薦成為了中共的地下黨員。被派來的關露，一直為李士群擔任秘書，直到41年末；後來潘漢年本人繼任了這一職務。這也意味著間諜行為愈演愈烈（順便一提：關露於1955年潘漢年被逮捕入獄的時候也被牽連逮捕，最終精神衰弱，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而死）。

《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中，潘漢年和李士群見面是在1942年春天。而1997年出版的《潘漢年傳》中則更具體地寫明是1942年2月。無論如何，都是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的事情。在潘漢年被迫和影佐在六三公園閒聊（前面已經說了這是謊言）的時候，他向影佐提出和李士群見面的要求。而影佐馬上表示同意。

《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中對這段的描寫很長，充滿了辯解“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的感覺，但是就像本書所引用的岩井的回憶錄所記載的一樣，想來應該是為了掩蓋“潘漢年向岩井提出中共和日軍停戰的要求，而岩井則介紹影佐給他”這一事實。

為了恢復潘漢年名譽，在中共審查下出版的書，是不可能寫下這麼可怕的真實吧。1年後出版的《潘漢年傳》第210頁，為了保

護潘漢年所編造的、與岩井所記載的事實越來越遠的辯解如下。

不僅岩井很重視，而且引起了日本在華的最高特務機關的頭目影佐禎昭的注意。……岩井曾向影佐談過，並要求潘漢年去和影佐見一次面。潘漢年不便拒絕，便應約前往。這次見面是在上海“六三花園”以吃飯的方式進行的。岩井和袁殊都在座。影佐一般性地詢問了潘的情況，潘則向影佐談了一些大後方的消息和香港方面民主人士的情況。潘漢年表示，可以為“和平運動”做些事。影佐表示歡迎。在談話中，潘漢年乘機提出要求說：汪精衛政府的江蘇省長李士群是他的老朋友，他應當去打個招呼，希望能和李見見面。影佐表示同意。

這一段和《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又長又充滿矛盾的辯解比起來，辯解的成分要稍微低一些，但是讀者是否注意到：因為事情的描寫更加具體，才出現了破綻？這裡說潘漢年對影佐表示“可以為‘和平運動’做些事”。

寫得越詳細，字裡行間就一定會露出真實一角，正是如此。潘漢年是為了“和平運動”和影佐以及岩井見面。

和平——。

敵我雙方討論和平，稱之為議和。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毛澤

東是為了“議和”也就是讓日軍和共產黨軍停戰，才對潘漢年下達了命令。潘漢年所說的“和平運動”一詞，正好和岩井在回憶錄裡所寫的“來自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戰要求”這一事實相吻合。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基於潘漢年傳記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字裡行間一定隱藏著真相。

經過袁殊從中聯繫，李士群也表示願意和潘漢年會見，會見地點就約定在愚園路李士群的公館裡。這是1942年初的事。一天傍晚，潘漢年由袁殊陪同按約乘車到了李士群公館，李士群已派其助手胡均鶴在門口迎接。

李士群和潘漢年兩人過去是相識的，見面之後，李即對潘漢年表示“中共和新四軍方面有什麼需要他幫助的，他將盡力”。同時又對潘漢年說“希望你們對我也多加幫助”。潘漢年當即回答李士群說“我們歡迎你的這一態度”。隨後他們商定：今後他們之間的聯繫，潘漢年仍將通過袁殊，李士群則委派他的助手，現任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試驗區區長胡均鶴負責。

隔了一段時間後，李士群又主動邀潘漢年在上海愚園路公館見面。潘漢年又踏足李士群的公館，李士群有意識地向潘漢年透露了下一步“清鄉”行動的某些計劃，並告知日偽軍即將在蘇北地區有所謂“掃蕩”行動，希望新四軍及其地方政權能有所準備。潘漢年對此表示了謝意。在會見結束時，李士群又將一本偽儲備

銀行的支票簿送到潘漢年面前，說潘隨時可以取用。

該書之所以要強調李士群是“主動”接近，就是為了將潘漢年再次和李士群見面，說成是李士群為討好中共，主動向潘漢年洩漏內部情報，來幫助共產黨軍。也就是說，絕不是中共主動接近李士群，而是李士群積極地接觸潘漢年，以此來維護潘漢年的清白。

當時的共產黨軍主要在農村和山溝這些日軍不去的地方展開活動。另一方面，日軍主要控制的是大城市和鐵道要衝等“點”，或者是點所連成的“線”。而在線所圍成的廣闊的“面”上，日軍的勢力卻十分薄弱，而共產黨軍則正好在這裡開展思想宣傳活動，用讓民族熱血沸騰的宣傳來動員以農民為中心的大眾，試圖壯大中共的勢力。

毛澤東用源自書經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個詞來形容他對農民大眾的動員。“燎原”乃是“火延燒原野”之意，整句話的意思是“無論多小的火種，一旦點燃了原野，就會勢不可擋地延燒開來”。在日軍沒有掌控的農村這個“面”上，中共用思想武器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對毛澤東來說，應該是想告訴李士群，只要這一點不被妨礙的話，那麼當李士群陷入困境的時候中共是可以接受他的投靠的。

其證據就是之後所述的，1943 年春天潘漢年通過李士群會見了日本陸軍的都甲大佐，並且與他進行了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互不侵犯的談判。

這時候岩井英一能夠自由動用的外務省機密費已經見了底，岩井本人也漸漸被外務省排擠，但是這時候還有在上海總領事館的權限。

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並且開始南下之後，於 1941 年 12 月 25 日攻占了香港。所以潘漢年等人就撤離了香港，借助岩井、影佐以及李士群等人的庇護，把香港的情報力量轉移到上海，在上海開展間諜活動。

潘漢年為此要求岩井給他發一張“特別證件”來保護他的安全。岩井當即表示同意，第二天，潘漢年便拿到了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上面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察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潘漢年為此十分高興，因為這就等於是一張“護身符”了。

到了 1942 年 9 月，延安中央指示留在香港和上海當間諜的潘漢年等人撤回新四軍根據地。潘漢年拜託李士群掩護，於 1942 年 11 月順利回到了淮南的新四軍根據地。這想來也是毛澤東派潘漢年接近李士群的原因之一。

和汪精衛之間的密約，另一個證言

此外，在源自潘漢年的情報之外，還有別的資料留下了毛澤東向汪精衛政權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的記錄。汪精衛政權二號人物周佛海的兒子周幼海在 2004 年團結出版社（北京）所出版的《汪精衛與陳璧君》（程舒偉、鄭瑞峰著）一書中關於父親的“回顧錄路”欄目中提到過。其概要是：1942 年春夏交接的時候，潘漢年來到了蘇州和李士群見面，並和李士群一起前往南京見了周佛海。並且約定在上海不要互相攻擊，使用暴力。

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指示，那麼潘漢年不可能和本應是敵人的汪精衛政權締結這樣的密約。一定是毛澤東對汪精衛政權提出議和，以便雙方協力打倒共同的敵人蔣介石。

實際上，在《周佛海日記》1943 年 3 月 2 日的日記中，有以下一段——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段日記在《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中被用省略號隱去，筆者在《周佛海日記全編》（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 年）中才找到這一段內容。

筱月（筆者注：周佛海的財政關係的部下邵式軍字筱月）來，談共產黨不滿渝方，欲與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漢年在滬與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無力量，改派筱月之戚來此，與余相見等語。

因身體不適，後改期再談。

這裡最重要的是“欲與我政府合作”這段。也就是說，毛澤東想要和汪精衛政權合作，一起打倒蔣介石的重慶國民政府。加上“前曾派”和“改期再談”可以看出，關於這個話題，中共和汪精衛政權之間至少進行了三次接觸。關於其子周幼海所寫的42年春夏之交的事情，筆者沒有在《周佛海日記》裡找到與之對應的部分。也許是因為要寫日記的事情太多，所以沒有記下關於潘漢年第一次來訪時的情況。

顯而易見，真正和日軍對峙，站在抗日戰爭最前線的，只有蔣介石。這一點也沒有告訴中共下層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士兵。他們連這一點也不知道，只是服從命令，進行破壞鐵路等小規模的游擊戰，並且在革命根據地對其戰果進行大肆宣傳。

毛澤東是語言的天才。在動員人民群眾時讓民族情緒熱血沸騰的話語，真正的打動了民心，讓大量的人民群眾加入了八路軍和新四軍。士兵們都相信毛澤東的口號，認真的走向抗日戰爭戰場。然而那些知道口號和實際行動之間的差距的中共上層人士之間，也有不少人對其欺騙性保佑不滿，和毛澤東漸漸離心（然而大多數都在發現不滿情緒時就被暗殺了）。

另一方面，作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元首，蔣介石只能讓重慶政府

的國民黨軍和日本軍在第一線正面作戰。別忘了國民黨軍士兵也屬於“中華民族”。而把重慶國民黨軍的軍事情報賣給日本，削弱國民黨軍的行為，只能說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

毛澤東在背後和日軍及汪精衛政權暗通款曲，在表面上又高呼抗日救國，吸引了諸多中國民眾倒向中共一方。卻又同時幫助了讓日軍殺害同為中華民族的同胞！

潘漢年和汪精衛再次會面？

1943 年春天，香港和上海緊張激烈的間諜活動告一段落，潘漢年是在比較平靜和輕鬆中度過的。

然而不久，即在 1943 年春末夏初之際，形勢驟然變得有些緊張起來，有消息說汪偽軍又將有大規模的“掃蕩”根據地的行動。於是中共華中局的領導饒漱石便提出要加强對敵情的搜集，並要求潘漢年對此作出部署。潘漢年只好親自再去敵占區一趟，直接找李士群獲取第一手有關“掃蕩”情報。而獲取有關“掃蕩”情報，說白了就是讓其不要攻擊新四軍的議和之事。這裡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從第 158 頁到 160 頁，用很長的篇幅令人費解地描寫了潘漢年是怎樣立馬前往上海去見李士群，然而

到了上海之後發現李士群在蘇州，到了蘇州後又聽到李士群已經去了南京，趕到南京之後被帶到李士群的家裡，李士群又不在家，最後掉進了李士群的圖謀，被挾持和汪精衛會面的過程。

當然潘漢年第一次見到汪精衛，像岩井所寫的一樣，是在1940年3月汪精衛政權剛誕生的時候。岩井把潘漢年介紹給影佐，並且最終見到了汪精衛。所以，就算《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所寫的1943年春天“被挾持會見汪精衛”確有其事，這也是潘漢年第二次和汪精衛見面。

袁殊向岩井介紹潘漢年的時候，說是“和周恩來地位相當的中共幹部”。所以對日軍和外務省以及汪精衛政權來說，潘漢年應該是“中共高級幹部”的定位。汪精衛本人與其見面，從職位上說，並不奇怪。

《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的第160頁到161頁，《潘漢年傳》的第222頁到223頁，都非常詳細地描寫了汪精衛和潘漢年之間的對話，但是這只是為了“保護潘漢年的名譽”，並且為了掩飾“毛澤東試圖和汪精衛政權議和”而已，所以在這裡就不詳細分析他們之間的對話。然而重要的是，這兩本書中都有這一段：汪精衛說：“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中略）汪精衛又說：“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和我們合作才能救中國。”

汪精衛早就看透了中共背後有共產國際，所以與中共分道揚鑣，追求民主。雖然他的理想和實際所作所為有所不同，不過他自己想必不會說“只有和我們合作才能救中國”。

這反而是毛澤東想要傳給汪精衛的話，更讓筆者確信：潘漢年正是為此而去見的汪精衛。

前面所說的《周佛海日記》已經完全的證明了這一點，而從下一章中都甲大佐和潘漢年的密談中也足以看出這一點。

此外，從 2013 年 5 月 16 日開始，在中文網絡上出現了《1942 年春毛澤東寫給汪精衛的信找到了》的文章，在網上引起了爭論，在中國大陸的網上不斷擴散，至今未被刪除乾淨。

文章一開始有這一段內容：

汪主席兆銘先生：近安！

自民國十三年廣州一別來，距今已有十八年整矣！民國十三年國民黨一大時，潤之承蒙汪主席提攜，以布衣之身虛添中央宣傳部長之職，先後多次聆聽汪主席教誨，讓潤之受益終身。

“潤之”是毛澤東的字，但是字一般是用來尊稱對方，本人自稱的時候，一般不會使用這一稱呼。民國十三年乃是公元 1924 年，也正是本書前述孫中山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

且第一次提倡國共合作那一年。毛澤東坐在 39 號席位並且發言，當時很受汪精衛的照顧。這裡所說的就是那時的事情。

這封信的落款是“潤之 民國 31 年暮春於延安拜上”。民國 31 年乃是 1942 年，“暮春”是晚春的意思。

在信的最後有一段附言：“此信由我黨潘漢年同志親呈，此人忠信欠缺，看後請立毀此信！切記！切記！”

而信件的主要內容，乃是“還望汪主席敕令部署，互不侵害。勿使中華國防力量流失”，另外還加上了“另我部醫藥奇缺，望汪主席有所周濟”這一請求。

因為本信在稱呼上（用“兆銘”直呼長輩，用潤之的字自稱）、時間上（例如信中提到的項英，他早已於 1941 年 3 月 14 日死亡）、以及附言（很明顯是知道潘漢年此後的遭遇而編的），都有很明顯的漏洞，所以可信性並不高。但是在這個時間出現這一信件，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第六章 與日軍同謀 以及政敵王明的手記

和日本陸軍都甲大佐的密約
中共和岡村寧次大將進行接觸
潘漢年被逮捕的經過
與政敵王明之間爭論的記錄
王明對毛澤東的看法
知道真相的人全都被封口

和日本陸軍都甲大佐的密約

潘漢年的傳記中，寫到潘漢年在“被李士群挾持與汪精衛見面”之後，又被介紹給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陸軍都甲大佐。受到中共審查的書為什麼要深入反覆地描寫這些日方都不知道的事實呢？筆者推測，是為了強調潘漢年是被李士群強迫見到汪精衛的證據，被迫和日本陸軍大佐見面，更充分地體現了李士群的強硬。

在《潘漢年的情報生涯》第161頁到162頁，以及《潘漢年傳》第223頁到224頁，都詳細描寫了他與都甲大佐之間會談，或者說是“密約”的情況。

特別是後出的較厚的《潘漢年傳》寫得更為詳細，就像筆者所推測的一樣，明確地要傳達潘漢年“是被李士群挾持去見都甲大佐”的意思。特別是增加的“這次上海、南京之行，歷時不過半個多月，收穫不多，卻引起了心中的諸多疑慮和不快”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來看一下《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是怎麼寫的：

潘漢年在南京只呆了兩天時間，便仍由胡均鶴陪同返回上海。李士群回到上海後又邀潘漢年見一次面。他向潘介紹了日偽軍隊

暫時不會有大規模軍事“掃蕩”行動的情況。同時又表示，今後還希望和新四軍方面加強聯繫，交換情報。(中略)在上海期間，潘漢年還由李士群介紹會見了他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李士群說，都甲是日本軍方人物，專管津浦、滬寧沿線的“清鄉”任務。可以和他談談。潘漢年沒有拒絕。他正想從都甲那裡直接聽一聽日本軍方對目前軍事形勢的看法。於是，仍由胡均鶴陪同在一座日本軍官的公寓裡會見了都甲。會見中，他們交談了一些情況並各自說明了自己的看法。

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社會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鐵路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

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要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重要交通據點。日軍方面要給新四軍有一定的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襲擊和破壞鐵路交通線的。

兩人的對話大致如此（下劃線由筆者所劃）。

一年後出版的《潘漢年傳》中，下劃線的部分卻大相徑庭，辯解道：“他（李士群）剛剛將潘介紹會見汪精衛，這件事對日本人也應打個招呼，以免日本人對他有什麼猜疑”。與都甲見面的理由被

改來改去，正說明其想要隱藏什麼東西。想要隱藏的正是“毛澤東派潘漢年去見日軍”這一事實。沒有毛澤東的指示，潘漢年不可能擅自行動。

光從這裡所介紹的文章就不難想像，說白了，毛澤東早就看上了汪精衛政權軍事委員會中作為軍事顧問的日軍。正因此，他才會命令潘漢年通過李士群接近都甲大佐，讓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直接進行互不侵犯的談判。

潘漢年傳記的作者（以及協助者），為潘漢年被用“沒有向毛澤東報告與汪精衛見面”這樣的理由遭到逮捕、並死於獄中而感到不平，為了恢復潘漢年的名譽，出於友情，在傳記中這樣描述。

然而卻事與願違。本想把事情描繪成“潘漢年被挾持會見汪精衛”，卻多餘地把與都甲大佐之間的會談也寫了進去，這反而更加鮮明地體現出毛澤東的意圖，並且也讓潘漢年的行動——儘管是受毛澤東之命——增加了賣國賊的要素。

誰都可以看出來，都甲和潘漢年之間的對話正是“議和”。

——難道，潘漢年相關書籍的作者希望讀者能從字裡行間看出真相，所以拼命發出這樣的信號？

這麼一想，就會發現：雖然沒有明說，這一段的字裡行間，充滿了明顯只能解釋為是“毛澤東命令潘漢年與日軍及汪精衛同謀”的情報。

和潘漢年同時被逮捕的中共間諜揚帆，也是接到毛澤東的指示，和岡村寧次的部下進行接觸，不過，其事實較為複雜，在進行慎重的檢證之前，無法斷定是出自日方還是中共方主動提出。

不過，如果像中共所宣傳的“提議是出自日軍”的話，就不應該有把揚帆逮捕入獄以封其口的必要性了吧。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拋開偏見進行分析。

中共和岡村寧次大將進行接觸

在第四章中，我們介紹了2013年5月15日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中刊載了《抗戰期間，中共秘密接觸日軍岡村寧次總部真相》一文。寫這篇文章的人叫趙連軍，但是不要因為是以個人名義就認為這僅僅是一篇普通的博客文章。因為他的單位是江蘇宿遷市紀委派駐紀檢七組。紀檢委員會是審查黨員是否違反中國共產黨黨規的組織，最高組織是中共中央紀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其書記乃是王岐山，習近平政權的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之一，現在負責反腐敗領域。

在文章一開始的“辯解”中，就提到1989年5月，在中共嚴格審查下的北京群眾出版社所出版的《揚帆自述》。書中所載新四軍和日本陸軍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接觸一事，並且說“當年確

有中共和日本最高軍政總部接觸之事，但不是去‘議和’，更沒有達成過什麼協議”。

1912年出生的揚帆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文學青年，於1937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在中共新四軍搞了一段時間文娛活動，並於1944年10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上任不久便受命與日本侵略軍岡村寧次總部接觸，然而卻於中共建政後，1955年被毛澤東下令逮捕入獄。毛澤東逝去之後，揚帆於1980年被恢復名譽，雖然得以倖存，但是惡劣的獄中生活給他造成了身心兩方面的損害，雙目失明。最後通過口述、由他妻子記錄下來《揚帆自述》這本書，於1989年5月（“六四”事件的前一個月）由北京群眾出版社所出版。

在這本書中，揚帆如此回憶（以下省略所有尊稱，職位和人名以《揚帆自述》為準）——

1. 有一天，（中共中央華中局代理書記兼新四軍政治委員）饒漱石來找我，要我負責接待審查一位從南京監獄放出來的叫紀綱的人。他自稱是我們的情報工作幹部，這次是南京日軍的“華中派遣軍總司令部”岡村寧次那裡派他來的，說有重要信息要向我們轉達。饒漱石要我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麼鬼把戲。

2. 一九四五年六月間，紀綱從南京帶來了岡村寧次總部的三個

日本人，他們都改穿了中國便服，按照我們事先的安排來到六合縣竹鎮附近的一個村子。（中略）日本人為首的叫“立花”，（中略）曾任憲兵隊長，後任岡村寧次總部參謀處二科對共工作組長；一個叫“原”，一個叫“梅澤”。我方首席代表是彭康（華中局宣傳部長，曾留學日本），梁國斌（軍保衛部長）。

3. 日方提出他們奉命向我們談“局部和平”的意向，我們拒絕了。日本人以為我們嫌來人身份低不信任他們，因此又提出希望我們派遣負責關於官員去南京和岡村寧次總部首腦直接談談，表示絕對來去安全。為了取信於我，甚至表示他們願意留下作“人質”。

4. 軍部決定派我去，而且決定讓這三個日本人同走，（中略）我和紀綱夫婦及那三個日本人渡江到鎮江，然後坐火車去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將校（級）軍官招待所內。到南京的第二天，日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部”參謀處二科主任參謀（代理科長）喬島代表尾崎大佐設宴歡迎，以中菜招待我們。並且說，他的上級專門批准撥給四百公升汽油，作為專供我們坐的汽車的消耗之用，我們可以在南京到處轉轉。

5. 翌日，日軍華中派遣軍的副總參謀長（也是主管特務工作的）今井武夫在中山路原國民黨政府鐵道部的那所大樓裡和我們見面，表示歡迎，談話中以茶點招待。（中略）他主動提出，有一個皖南新四軍的政治幹部押在南京，問我們是否要帶回去，（中略）我知道日

方提出的這個幹部是一個可恥的叛徒，我托詞拒絕了。他接著提出日方希望在華中和我們達成局部和平協議，甚至願意讓出八個縣城給我們。並且還說，華中局勢不要很久就會有變化，希望我們將來能和日方合作來共同對付美英和蔣介石軍隊……。 (中略) 當時我們向日方說，我可以聽聽你們的建議，但是我現在不願意具體討論這些問題。

6. 今井武夫見談不下去，第四天又由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以岡村寧次代表的名義出面見我們，並設宴以西餐招待我。(中略) 他知道要具體談判已不可能，便向我說：“我們雙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具體問題先不談，希望保持聯繫。”

寫的如此具體，也許和事實相去不遠。但是，揚帆書中登場的日方軍人的名字，有些正確，也有不少是錯誤的。並且歸根結底，名叫紀綱的人物，是否真的是日軍所釋放並派往中共方面講和，沒有和日方資料進行對照比較之前，難以作出判斷。

所以筆者查閱了今井武夫之子今井貞夫所著《夢幻的日中和平工作 軍人今井武夫的生涯》(今井貞夫著，中央共論事業出版，2007年)、《支那事變的回想》(今井武夫著，美篤書房，1964年)、《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 岡村寧次大將》(舩木繁著，河出書房新社，1984年)、《岡村寧次大將資料 戰場回想篇》(稻葉正夫編，

原書房, 1970 年) 等書。然而, 哪本書裡都沒有《揚帆自述》中所說的日本方面和新四軍接觸的內容。

只好採取最後的手段, 聯繫今井武夫之子今井貞夫, 拜託他調查是否有這件事情。今井貞夫手中有今井武夫所留下的 5000 多件資料。最後收到了下面的回信:

“您所託付的事情, 我調查了很久, 但是找不到關於這一件事情的記錄。特別是關於先父今井武夫本人, 我認為應該沒有這一件事情。”

今井武夫留下了非常詳細的資料, 但是在其中卻完全沒有關於揚帆所寫的事情的記錄。那麼可以推測, 可能性之一, 就像今井貞夫所說的一樣, 是並沒有這一件事情; 並且就算有這麼一件事情, 至少可以推測並不是從今井武夫這一方提出的提案, 這件事情看上去非常詭異。

實際上, 在《揚帆自述》第 34 頁, 還寫道: 紀綱“和一個日本的進步記者中西功經常交換日偽方面的情報, 這名日本記者後來被日方發覺逮捕了(1942 年佐爾格事件), 供出了紀綱、汪錦元、陳一峰、鄭文道等同志的關係, 因而也均被捕”。紀綱在中國被逮捕後, 一直被收押在岡村寧次總部的監獄中。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 年 5 月 15 日的文章中, “中西功”不知為何變成了“西里龍夫”。中西功和西里龍夫都曾作為中共地

下組織的成員，向延安的中共中央提供關於日軍的情報。兩人都在東京警視廳被嚴刑拷打，什麼都沒有招，後被判處死刑。死刑執行前日本戰敗，被美國佔領軍所釋放，並且留下了筆記。從他們頑強的抵抗，很難想像會輕易吐露同伴的名字（因為一句都沒有吐露，才會判處死刑。一般來說，如果供出這麼多同胞的名字的話，能避免死刑。）。這麼說來的話，南京的岡村總部特意從監獄釋放紀綱派往新四軍的前提，也就頗為值得玩味。

其證據是，在《揚帆自述》的第38頁，有一段記錄：中國新四軍、華中局“在聽了美國廣播，知道日本政府照會美英蘇中四國政府，宣告接受《波茲坦公告》後，14日，華中局立即要我趕去南京找岡村寧次談判受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德意三國聯盟，早在1943年10月因意大利的脫離和投降而分崩離析，而納粹德國也於1945年5月投降，三國聯盟不復存在。只剩日本一國在和全球聯手的同盟國進行戰鬥。日本的投降已經只是時間的問題。

毛澤東不可能沒有看到這一點。日本戰敗之後，其武器到底是被蔣介石所獲得，還是被毛澤東所獲得，將會是改變此後國共內戰形勢的重大關節點。不光是武器，毛澤東所想要獲得的還包括日本軍人們。所以計劃由中共而不是國民黨來接受日軍投降，乃是理所當然的行為。

當揚帆到達南京的時候，已經是8月15日，日本天皇已經廣播了終戰詔書。這時候揚帆和紀綱採取了奇妙的行動。揚帆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華中局敵區工作部部長，其地位遠較紀綱為高。如果是想要正式接受投降的話，當然應該由揚帆本人前往，然而揚帆沒有直接去找岡村寧次總部，反而住在地下黨一位同志家裡，並派紀綱先去試探日方態度。紀綱見了日軍指定和新四軍聯絡的立花等三人，提出朱德總司令向岡村寧次下達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軍繳械投降。日方答覆說：根據《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日軍只能向國民政府投降，希望新四軍方面諒解。

筆者是這麼想的：為了能夠從馬上就要戰敗的日軍手中獲得武器，毛澤東才會讓揚帆等人去和日軍接觸。

另一方面，在上述《岡村寧次大將資料 戰場回想篇》的第13頁有以下的記述。

共產黨軍的大本營在陝西省延安，其勢力遍布中國北部和蒙古新疆一帶，而新四軍則盤踞在江蘇省北部，但是中國中部和南部則沒有中共的勢力。

8月15日下午4點左右，就有自稱新四軍使者的一名叫章克的男性來到南京派遣軍總司令部門前，要求會見總司令官。而接到這一報告的今井副總參謀長派衛兵司令去問他有什麼事情，對方回答

說來商量接收日軍兵器之事，於是我方拒絕見面讓他離去了。

新四軍的使者的確來到了岡村寧次總部，但是使者的名字不一樣，其目的乃是接收兵器。在同書中，岡村大將還記下了許多起“中共方面在各地要求敗象漸濃的日軍上繳武器”的事例。

也就是說，揚帆等人如果和日軍總部進行接觸的話，其目的無非就是在抓住日本戰敗的那一瞬間，儘早從日軍手中繳獲武器，才會盡量在日軍佔領區附近潛伏，以待時機。因為他們也需要掌握日軍陣地的情況。而為了讓他們在潛伏的時候不被日軍攻擊，所以共產黨軍才會判斷和日軍“局部和平”比之前更為必要吧。

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開這一謎團的要點，在於饒漱石這一人物。我們需要注意到，無論是揚帆還是潘漢年，都是某一天突然接到了饒漱石的命令。而中共建政後，從饒漱石開始，潘漢年、揚帆等無數參與過這一事件的人、與日軍以及汪精衛政權接觸過的人都被一網打盡，逮捕入獄。如果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問心無愧，沒有出賣中華民族，沒有賣國的話，為何要把所有相關人員全部囚禁、封口呢？

潘漢年被逮捕的經過

派遣間諜的秘密命令系統之關鍵人物是饒漱石。

饒漱石和被稱為“東北王”的高崗一起，於1954年被定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進行了“分裂黨的活動”，並且於1955年遭到逮捕。具體來說，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此後開始了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強烈批判，而高崗則於1954年8月17日自殺。被軟禁的饒漱石於1955年4月1日遭到正式逮捕，3天後，又被認定為是“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

在這場政治風暴中，心驚膽顫的潘漢年擔心自己也會遭到牽連，所以找舊友陳毅商量。當時從1955年3月21日到31日正在北京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正好和上海市市長陳毅一同上京開會。

據說是因為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聽到毛澤東的發言，潘漢年才下定決心主動坦白自己的問題。潘漢年向陳毅詳細地談了自己1943年和汪精衛見面卻沒有向毛澤東報告的事情，並且把與汪精衛見面的經過，以及沒有向中央報告的原因，寫成材料交給了陳毅（《潘漢年傳》347頁）。而陳毅則於4月2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並將潘漢年所提交的材料交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在材料上寫道“此人從此不可信用”，並且立即下令逮捕潘漢年。

4月3日的夜晚，潘漢年正在人代會為他準備的北京飯店301房間休息，接到一個讓他下樓的電話。下樓之後就被當場逮捕，關押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潘漢年從這一瞬間開始就失去了自由，直到死亡。

潘漢年被逮捕入獄的消息暫時遭到了封鎖，於4月5日由陳毅向上海代表團進行了內部通知。這時候陳毅的發言很值得注目。

他說：“（1943年以前，）他做過許多工作，都是黨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潘漢年傳》351頁）。

潘漢年和揚帆雖然時間上錯開了兩個星期，但是都於1955年因為“通敵賣國”而幾乎同時被逮捕入獄，袁殊也被連坐。這時候被連坐的人數達到1000人以上。

如果中共方面的資料所寫的是事實的話，那麼至少不需要把揚帆也投入獄中。

關於毛澤東和日軍的同謀以及饒漱石在其中擔當的角色，毛澤東的政敵王明，在死前留下的與毛澤東談話的實錄，向我們揭示了事情的真相。書中記載了毛澤東通過饒漱石發出命令私下和日軍接觸這一事實。

在進入這一實錄之前，筆者想先介紹一件在調查揚帆問題時發現的趣事。2013年在網上出現了一張“毛澤東和岡村寧次的賣國密約”舊報紙的照片，出自1947年7月24日的《時事公報》，網上為此鬧得沸沸揚揚，但是岡村寧次在1947年7月23日的日記中說這篇報導是捏造的——似乎是因為中共方面發表了太多虛假的消息，所以國民黨系報紙的年輕記者才發怒寫了這麼一篇報導。

與政敵王明之間爭論的記錄

在中國，王明（1904年～1974年）被稱作教條主義者和左傾冒險主義者，批判成“極惡的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中的“教條主義”，指的是“無視歷史情況，機械地套用原則”，然而卻不知所云。非要說的話，那就是“毛澤東最討厭的人物”吧。

為什麼毛澤東這麼討厭王明？因為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典型精英分子，不光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語，而且也十分聽共產國際的話，比毛澤東晚五年入黨，卻先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討厭共產國際，也討厭蘇聯斯大林的毛澤東，自然看不慣莫斯科的忠誠使者王明。

然而就像本書在第三章所提到的，王明起草了“八一宣言”，

並且讓中共總的戰略方針，從“反蔣抗日”向“聯蔣抗日”轉換，最終引發了西安事變，對毛澤東來說，應該是十分值得感謝的。儘管如此，毛澤東和王明之間的對立十分激烈。

王明害怕自己將會被殺害，所以 1956 年以治病為借口去了莫斯科，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實際上，他拖著病體（這也是因為毛澤東在延安時授意給他投慢性毒藥的緣故），在生前留下了包含和毛澤東爭論的手記。竭盡他人生最後的力量，最終則口述讓妻子筆錄，1974 年他嚥下了最後一口氣。毛澤東之所以殺害了如此多的革命同志卻放過了王明，大概是因為有莫斯科的眼線盯著吧。

王明手記於 1975 年由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以俄語出版，書名是《中國共產黨 50 年和毛澤東的背叛行為》，其內容非常直白而激烈。

在中國當然不能用這個標題出版，所以被改名為《中共 50 年》，於 2004 年被翻譯成中文，在北京由中共官方的東方出版社所出版。雖然是內部出版，僅限部分黨員閱讀，但是人之常情，越是這麼限制就越有人想看，便有許多的中國人都讀到了這一本書。

《中共 50 年》的第三編“‘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方針”的第三章，寫的是“毛同帝國主義合作的現行方針的根源”。這裡的帝國主義指的是“日本帝國主義”。

其 186 ~ 190 頁，以對話的形式記錄下了毛澤東和王明的爭論。在這裡先說明一下對話的背景。

1940 年 10 月的一個夜裡，延安《新中華報》（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3 日刊）編輯部的一名編輯把第二天該報要刊登的材料送給王明審閱。編輯部文章的標題是《論德意日蘇的聯盟》。王明問編輯：“這篇文章是從哪裡來的？”編輯回答說：

“毛澤東同志送來的。今天下午他主持了有報社編輯和中央宣傳部門的一些同志參加的會議。會上他宣布國際舞台上必須貫徹一條建立德意日蘇聯盟的路線而在國內則要建立同日本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會上他宣稱已經寫好一篇《論德意日蘇聯盟》的社論，並囑咐刊登在最新一期《新中華報》上。問題這麼重大，難道他事先沒有和政治局的同志進行過討論麼？”

“好吧！我去和他談談。”

王明這麼說，就去見了毛澤東。毛澤東承認，他的確召開過這樣一次會議。此後王明和毛澤東開始了爭論。以下為爭論的記錄。

毛澤東：“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議成立英美法蘇反對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事態的發展證明這是錯誤的。應當作的事不是去搞什麼英美法蘇聯盟，而應搞德意日蘇的聯盟。”

王明：“為什麼？”

毛澤東：“德意日他們都是貧農。和他們作戰有什麼好處？即使我們戰勝了，同樣是無利可圖。英美法是富翁，特別是英國，你看它有多少大塊的殖民地啊！如果把它打敗，那末僅從瓜分它的殖民地中就可得到很大的收穫。這你可能會說我是主張親法西斯路線的，不是嗎？這我不怕。至於中國應當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統一戰線，以反對蔣介石，而不應當建立你所建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以你也錯了。”

王明：“我錯在哪裡？”

毛澤東：“反正我們不能戰勝日本人，那為什麼要和他們打仗呢？最好聯日聯汪打蔣介石。你看蔣介石在西南、西北還剩下那麼多的地盤，如果打敗了蔣介石，我們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塊地盤，那就算獲得暴利了！我知道，你會說我執行親日民族叛賣路線。我不怕。我不怕當民族叛徒！”

王明：“你沒有任何權力對這麼重要的國際、國內政策問題單獨做出決定。我和我的爭論同樣也不能形成決議。我建議按黨的正常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即把你的意見發電報告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並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這些問題。”

毛澤東：“現在不能發這個電報。這樣的電報可能引起這兩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的憤怒。這不是開玩笑的。同時我也不同意馬上

就在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

王明：“為什麼呢？”

毛澤東：“時機尚不成熟。”

王明對毛澤東的看法

兩人的對話還在繼續，不過因為是關於會議手續的方面，所以不再詳述。

讓我們來看看王明對這段對話的解說和分析。王明写道：

來分析一下為什麼毛澤東主張成立德意日蘇聯盟的目的何在。他所追求的目的在於掩蓋他的親日民族叛賣路線，同時利用這一口號作為借口，來為他對部隊所下的停止抗日軍事行動的命令和加劇國內軍事衝突的做法作辯護——因為日本正在和“中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作戰，而如果日本和中共的同伴蘇聯聯手的話，中共也就理所當然地可以和日本攜手了。

另一方面，毛澤東打算通過提出德意日蘇聯盟，來破壞蘇聯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的威信。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台，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

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汪精衛都不會相信毛澤東能成為“汪精衛第二”。（中略）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共宣傳。幸好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所以蔣介石集團很難使人們相信在中共領導人中會出現秦檜和汪精衛這一類的民族叛徒。因此他們利用上述事實作為反共宣傳的嘗試未能達到任何結果。（中略）

1955年毛澤東藉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處決了。（《中共50年》中文版，東方出版社，2004年，190頁。中文譯文原文如此，但所述潘漢年職務並不準確，他也沒有與胡均鶴一起被處決。）

（中略）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

還有比這更厲害的證言嗎？已經不需要再說什麼了。

岩井英一驚訝於潘漢年向他提出“中共和日軍停戰”這一提案，並把其記錄在回憶錄中，而王明的這段證言則和岩井英一的

證言同樣鐵證如山。

王明最後已經沒有力氣執筆，在病床上通過口述留下了這段證言。可謂是拼上性命也要留下的記錄，令人欽佩。

王明的分析能力、邏輯的高度令人讚歎。這也是毛澤東無論如何都要排除王明的原因吧。

關於毛澤東所說的“德意日蘇”同盟，實際上這時候擔任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外務大臣（1940年7月～41年7月）的松岡洋右，也在摸索把蘇聯拉到軸心國這邊的四國同盟。其結果是，1941年4月13日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在關於“德意日蘇”同盟的“日蘇”部分是正確的。“日德意”三國同盟加上“日蘇”同盟，就相當於“日德意蘇”的四國同盟了。

日蘇中立條約對國共合作抗日的蔣介石來說，是最大限度的背叛行為。因為蘇聯和敵人日本攜手，就相當於中共和日本締結了同盟。因而毛澤東的主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確的，而王明對毛澤東“聯日聯汪打蔣”的批判也是正確的。

蔣介石在其日記及《蘇俄在中國——蔣介石回顧錄》（蔣介石著，1956年）一書中，具體地描寫了許多共產黨軍和日軍同謀的事實。

比如說1941年5月在山西省晉南中條山發生的日軍和國民黨政府軍的戰鬥中，山西北部的八路軍和日軍一起夾擊了國民黨

政府軍。這就是因為潘漢年對岩井英一提出“中共和日軍停戰”這一提案，並把重慶的國民黨政府軍的情報高價賣給了日本方面。

蔣介石在回憶錄中，明確地記有“中共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劃，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

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和王明的手記，以及蔣介石的回憶錄，三者從不同角度證明了毛澤東是如何和日軍同謀，出賣中華民族。而這三人只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記錄在各自的回憶錄裡，無從知道別人寫了什麼，其內容卻如此的一致，這難道不是很可怕嗎？

還有比這更確鑿的事實嗎？

如果中國人民連承認這一點的勇氣都沒有的話，只能說他們缺少“正視歷史的勇氣”了吧。不論是日本還是中國，我們都需要“正視真實的勇氣”。

第七章 我感謝皇軍

——歡迎舊日本軍人的原因

蔣介石太過專注於讓日本軍民回國而落入被動

“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

毛澤東和舊日軍軍官遠藤三郎之間的對談

受夠了左翼的“謝罪”

毛澤東和蔣介石，爭奪岡村前大將

關於對歷史的認識

蔣介石太過專注於讓日本軍民回國而落入被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誕生，但是我們先要回顧一下從日本戰敗到中共建政之間國共內戰的歷史。

共產黨軍把中國重慶政府的國民黨軍軍事情報賣給日本，來換取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密約，並且在日軍佔領區大肆動員群眾。而日本戰敗之後，共產黨軍則要求日軍解除武裝。為了能夠奪取日軍的武器，當日本形勢漸頹時，共產黨軍已經漸漸潛入了日軍佔領區，近乎於與日軍“同居”。如果共產黨軍和日軍之間沒有停戰協議的話，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毛澤東不允許共產黨軍進行大規模正面戰鬥，而是進行小規模游擊戰並對其成果進行大肆宣傳，成功奪取了民心。而趁日本戰敗的瞬間從日軍手中奪取武器的戰略也在著實的進行。

《岡村寧次大將資料 戰場回想篇》一書中如此描寫戰爭剛結束時中國的情況。

中國中部（除了江蘇省北部）和南部在戰爭結束後聽不見一聲槍聲，然而在中國北部和江蘇省北部的我軍卻為了防衛來自共產黨軍的攻擊，出現了七千人的傷亡。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共的不合理的要求和攻擊是如此之多。

岡村的文體比較古老，不過簡單來說，就是“中共採取何等激進的手段要求投降的日軍交出武器”的意思。

在《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是對中華民國投降。日本於1945年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公告》，所以必須把武器交給重慶的國民軍。

8月15日，日本天皇發表“終戰詔書”的一小時前，蔣介石對中國全境和全世界發表了“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的勝利宣言。其中回顧了全國同胞們自抗戰以來，八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在希望這一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戰爭的同時，禁止對敵國無辜人民（日本人）加以污辱和報復。這就是被稱為“以德報怨”的演講。蔣介石指示日軍原地待機等候國軍來解除武裝，禁止把武器交給共產黨軍。

岡村寧次深深地為蔣介石的演說所打動。美國總統杜魯門說“我們絕對不會忘記珍珠港”，蘇聯斯大林說“報了日俄戰爭之仇”，而與之相比，蔣介石多麼體現出東方高尚的道德，令人尊敬啊。所以他果斷地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嚴令所有日軍停止戰鬥並且把所有武器上繳給中華民國重慶國民政府軍。而蔣介石也因為這一命令被徹底遵守，感謝岡村寧次，並和他成為了好友。

1945年9月9日，岡村寧次向重慶政府國民黨軍的何應欽正

式簽字投降。何應欽曾經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上學，是岡村寧次的後輩兼好友。岡村在書中寫道，他能夠向中國的最親密的好友何應欽投降，乃是不幸中的萬幸。

蔣介石為了不讓岡村等人感到屈辱，不稱他們為俘虜而稱“徒手官兵”。也就是沒有武裝的將士的意思。並且為了讓 100 多萬的前日軍和當時在中國的 130 萬日本人能夠回到日本，委任岡村擔任“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讓敗軍之將岡村能夠保持尊嚴。

此後大約一年間，蔣介石為讓前日軍和日本人返回日本盡心盡力。然而因為這一活動抽調了國民黨軍調動和補給所必需的火車和船隻，導致之後國共內戰爆發之時，在起點上落後於共產黨軍。

何應欽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說，當時中華民國為了日軍復員，動用了八成船隻，火車也有七八成用來遣返日本人和日軍。

蔣介石自己也說，能夠如此保護敵軍俘虜並在一年後把超過 100 萬名俘虜全部送還本國，在世界上也是史無前例。但是，不難想像，這一年的落後，給抗日戰爭中在第一線戰鬥，身心俱疲的蔣介石軍帶來了多大的打擊。

蔣介石當時專注於讓前日軍復原軍人和在華日本人返回日本，乃是導致我們的鄰國——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

生的原因之一。日本人絕對不應該忘記這一事實。

而且這也是正關係到本章標題所說的“毛澤東歡迎舊日本軍人的原因”。關於岡村寧次的事情，我們會在本章的最後，再一次進行詳細的描述。

“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

蔣介石的處境每況愈下。

戰爭期間，美國的羅斯福政權內部有共產國際的間諜（總統行政助理勞克林·柯里、財政部副部長亨利·迪克特·懷特等人）活躍在幕後，而前往延安去見毛澤東並對其推崇有加的記者們（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等人）也對羅斯福造成了很大影響。

羅斯福徹底地倒向了共產黨陣營，所以才會相信蘇聯，希望蘇聯對日參戰，並且背著蔣介石在雅爾塔會議上締結了雅爾達密約。作為蘇聯對日本宣戰的交換條件，羅斯福把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等日本領土劃給了蘇聯。現在在日本和俄羅斯之間還沒有解決此北方領土問題。

對蔣介石來說，無論如何都不願意把滿洲（今中國東北地區）讓給共產主義陣營。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中共就會獲得勝利。但是蔣介石卻不知道美蘇之間的雅爾塔密約。而蘇聯則按照密約，

於二戰馬上就要結束的8月8日，撕毀日蘇中立條約，在9日零點剛過時進軍滿洲。

當時筆者身在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現在的吉林省長春市）。

在“新京”還沒有把名字改回“長春”的時期，先暫時用“新京”來進行稱呼。

當時的關東軍司令部在新京市稍微往西的地方，但是關東軍卻放棄了在中蘇邊境上超過130萬人的開拓團和留在新京的日本人，逃往南方。在還沒有知道日本戰敗之前，關東軍的司令部就已經空無一人。關東軍中似乎也有人提出要保護開拓團，但是最後還是拋棄了他們。

這些都是筆者親眼所見，對國民黨軍、蘇聯軍和共產黨軍行動的親身體驗，並以此來如實描繪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歷史。

筆者之所以在新京市出生，是因為父親發明了能夠治療麻藥中毒患者的藥物，為了治療中國的鴉片中毒患者來到中國。

新京接下來恢復了長春的名稱，而被蘇聯驅趕南下的開拓團難民則充斥了整個長春市，一部分被收容在當地的小學中，而父親則讓那些沒地方住的難民住在他的製藥工廠裡，並且照顧他們。

蘇軍佔領長春後，在筆者在工廠二樓的家對面，隔著興安大路設置了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 GPU，“克格勃”國家安全委員

會的前身)的據點。沒過多久,本應和共產黨敵對的國民黨軍也開進了長春城。這支軍隊本來是由舊偽滿鐵石部隊(偽滿末期因為日本士兵人數不足,所以僱傭了中國人來填補空缺。當時偽滿稱這些中國人的部隊為“鐵石部隊”。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按照偽滿的說法,是因為日軍教給了他們“鐵一般的軍規”。)以及他們收編當地國軍而成的小部隊,但是也自稱“中央軍”,構成了當地的國民黨政府。父親的工廠被國民黨政府所徵用。

蘇聯軍隊每天燒殺搶掠,市民們陷入了恐怖之中。他們的手腕上刺有編號,據說很多都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犯人。

到了1946年後,興安大路上出現了許多向北駛去的巨大的蘇軍軍用卡車。蘇軍用這些卡車,把長春及近郊所有工廠的配件、重型機械,全部搬了個空。雖然蔣介石禁止搬走日軍所留下來的設備,但是蘇軍根本不理會他。

市民們都屏住呼吸,預感到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槍聲打破了這種可怕的寂靜——毛澤東率領的共產黨軍,也就是八路軍開始進攻。

巷戰快要結束的4月16日,筆者的手上中了八路軍的流彈,昏了過去。

醒過來的時候,長春市已經被八路軍所佔領。這時候有30名左右的八路軍進工廠來,說“什麼都不拿,麻煩提供飯菜和睡覺

的地方”。母親們拼命準備飯菜，把二樓所有的房間提供給八路軍，還鋪上待客用的緞子面料被子來招待他們。第二天八路軍離開的時候，卻脫掉了破舊的衣服，穿上父親和僱員的衣服，並且從鞋櫃裡挑出合腳的鞋子揚長而去。母親反應過來走上二樓一看，發現廚房裡的罐頭等儲藏的食物全被帶走，而緞子面料的被子上，居然有大小便。

母親一邊哭一邊收拾。後來有人告訴我八路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然而我知道這不一定是真的。

入城的八路軍的首領叫林楓，和父親意氣投合，成了好朋友。林楓這時候擔任中國共產黨長春市委員會書記，兩年後則當上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的高位，文武全才而又為人謙虛，喜愛文物，在文革中被投入監獄。林楓向父親道歉說“那是剛參軍沒多久的農民兵，希望你能原諒他們”，並且推薦了“值得信賴”的一名姓趙的年輕八路軍來到我家。

日語流利的趙大哥對在巷戰中負傷的筆者這樣說：

革命的紅旗是由鮮血所染成的。而你這次也為革命的戰鬥流了血。所以那紅色之中也流淌著你的血的顏色。你是我們的同志。是小英雄。中國共產黨是太陽，偉大的毛澤東同志是太陽。就像太陽必然升起一樣，毛澤東必然會高高照耀，帶給受苦受難的人民以

幸福。

他是真心的相信毛澤東，相信中國共產黨。他的眼睛友好而又熱情。許許多多的人民都是聽到這些說法後加入了中共的軍隊。在點與點所連成的線所圍成的“面”之中，有許多的人民群眾被胸中這股熱情所驅動，加入了八路軍和新四軍。

他們和長春這種相當於“點”的大城市格格不入。也許是接到毛澤東的指示，所以八路軍到了5月22日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踪。

而代替他們進來的則是國民黨的正規軍，是配備有最新的美式裝備，在緬甸作戰過的精銳部隊。父親的工廠這次又被這些國民黨政府軍所佔領。

治安暫時恢復之後，那一年夏天，開始遣返日僑，這就是葫蘆島日僑大遣返，其總人數超過100萬。這時候前日軍的復員軍人似乎也抵達了日本。

然而父親被認為是政府所需要的技術人員，遭到留用，不允許他返回日本。

第二年夏天又遣返了一批日本人，國民黨政府留下了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日本技術人員，並遣返了其他人。這時候父親也沒被允許返回日本。

而把這次遣返的最後一批日本人送走的 10 月，長春突然斷了電，沒有水也沒有燃氣。

長春被八路軍圍得水洩不通，斷水斷糧。

長春的糧食都依靠近郊提供，所以立馬就陷入飢荒之中。

最開始通過以物易物，還能換到一點糧食來果腹。但是很快整個長春市已經沒有了糧食，餓死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當時長春的冬天有過攝氏零下 38 度的記錄，10 月份之後突然溫度就降到零下。沒有能夠取暖的柴火和煤，很多中國人把日本人撤離後留下的空房拆了當燃料取暖，不這樣做就會被凍死。。

最後我同父異母哥哥的孩子被餓死，接著哥哥也被餓死。

直到 5 月份長春的花草開始發芽。

去採摘之後，就能獲得一點食物。奮起幾個月都沒走過路的身體，邁著像幽靈一樣的步伐，向屋後的興安胡同走去。胡同到舊滿洲中央銀行宿舍之間有一段沒有鋪設過的道路，雜草叢生。到那裡一看，已經有許多市民趴在地上採摘嫩芽。無論是怎樣的政治勢力，也無法奪走這天地間的偉力。因為沒有人能夠阻止陽光照耀大地。

但是嫩芽也很快就被採摘一空。

這時候改名為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共產黨軍定下了“久困長圍”的戰略，決定長期封鎖長春，斷其糧路。1948 年 5 月 23 日，林彪等

人向毛澤東提出了圍困長春的辦法，並且於6月7日獲得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批准。筆者在本書第二章就提到過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缺少武器的共產黨軍正是要包圍國民黨死守的“點”也就是城市，分割他們來消耗其實力。

而這時候毛澤東則下達了“要使長春成為死城！”的命令。文獻上因為這個命令是由林彪所公佈的，所以有人說這是林彪下的命令，但是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林彪沒有權限做出這種命令，並且林彪在1948年9月9日發出《關於圍困長春情況向毛主席報告》，在報告中說“餓死者太多，影響亦不好。不讓饑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饑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釋的。饑民們會對我表示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希望毛澤東能夠解除圍城的命令。

另一方面，國民黨軍的蔣介石則看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這一段話。所以才要死守偽“滿洲國”的首都“新京”也就是長春，來向國際社會證明領土的主權究竟在誰的手中。

從二樓往下看，興安大路已經變成了死亡之城。

街道兩側的樹木下面全是沒有被搬走的餓殍，在死去的父母

的屍體旁邊，兩三歲的嬰兒在哭喊。野狗在嬰兒附近轉悠。變成野狗的家犬不光要吃屍體，還想要把失去父母的嬰兒當作食物。

在舊城區的中國人聚集地裡，據說還有人肉市場。

父親去見長春市市長。希望能夠解除留用，允許自己逃離長春。市長看見已經不成人形的父親，馬上簽了解除留用的證書，並且給了父親一些松子和少量的國民黨軍隊的便攜食物。

國民黨通過瀋陽空投的物資來果腹。然而市民只要接近空投物資就會被槍殺。但是飛機如果低空飛行的話，也會被八路軍擊落，所以空投的高度越來越高，最後來往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所以對國民黨政府來說，也是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市民能夠離開長春的。

包圍長春的包圍網被稱為“卡子”，在卡子上有“卡口”，可以從這裡出入。

1948年9月20日，筆者一家終於下決心逃離長春。

在這前一天，筆者最小的弟弟被餓死了。

卡口上有國民黨軍隊在確認每個人的身份，告訴他們“出了這道門，就別想再回到長春市內了”。

然而，那道門並不是出口而是通向真正地獄的入口。

圍繞長春一共有兩層鐵絲網。內層鄰接長春市內，是國民黨在看守著；外層的包圍網則鄰接中共占領區，有共軍在把守。而

這之間則是國共兩軍的真空地帶。這段被夾在中間的地區才是真正的卡子——卡子既有關卡或卡哨的意思，也有被夾在中間的意思。

餓殍盈野，無立足之地。

四肢瘦骨嶙峋，只有腹部的腸子腐爛之後像氣球一樣膨脹起來。有些餓殍的肚子就這麼炸開，腸子流了出來。巨大的銀色蒼蠅就撲了上去。附近有難民經過的話就會“噏！”地一聲飛起。

到了能看到外層包圍圈的鐵絲網的地方，八路軍也越來越多，開始引導難民找地方坐下。在屍體較少的地面上鋪上被褥露天而眠。太陽已經下山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之後感到驚訝。才發現被褥下面硌得慌的居然是餓殍的腳。

有新的難民加入之後，像死了一般躺在地上的難民就一起爬起來，圍著新來的難民搶奪食物。解放軍的士兵只是默默地看著，並沒有阻止。而解放軍所看守的通往解放區的門則一直緊緊關閉。難民被關在這一片真空地帶之中。

是要我們死在這裡嗎？

在紅旗之下戰鬥的解放軍，難道不是站在受苦受難人民群眾這邊的嗎？

筆者因為太過強烈的恐怖而昏了過去，失去了記憶。年僅 7

歲。

第四天上午，父親終於得到通過卡子的許可。因為他持有能夠治療鴉片中毒患者的特效藥的特許證書。而解放區為了建設新政權需要技術人員。

長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攻占，乃是一個月後 10 月 19 日的事情。國民黨中有來自雲南的第 60 軍，八路軍知道他們遭到國民黨中央的歧視，食物比嫡系部隊要差，所以就偷偷的給第 60 軍送食物。用食物誘惑他們向中共倒戈。第 60 軍於 10 月 17 日“起義”、19 日，長春的國民黨軍首領鄭洞國表明降意，並於 21 日正式舉起了白旗。

進入長春的解放軍中的一員在幾十年後告訴筆者，他在看見無立足之地，堆積成山的餓殍之後，不禁停下腳步沉思：“在這之中有幾名軍人呢。難道不全是無辜的老百姓嗎？”

中共方面公佈的餓死者人數為 12 萬到 15 萬人。而國民黨方面則宣布有 65 萬人。

至少，在圍困長春中，不管是共軍還是國軍，都是忽視老百姓的生命和尊嚴的。

關於長春的食物封鎖和卡子，在拙作《卡子——沒有出口的大地》（中文版，台灣樂果文化，2014 年）中詳述。

中國東北地區以長春、瀋陽為中心的國共內戰，被稱為遼沈

戰役，而在其南方則有平津戰役、淮海戰役。正是在攻占長春之後戰局逆轉，共產黨軍一氣呵成地佔領了全國，並且把所有的都市也即是“點”收入囊中。到這時候為止一直被禁止與日軍在前線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共產黨軍，所積蓄的能量突然爆發。這種勢頭和士氣遠非國民黨軍能比。

結果，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此後，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 1971 年取代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為止，中國大陸民衆習慣上用“新中國”來稱呼這一國家。

毛澤東和舊日軍軍官遠藤三郎之間的對談

毛澤東於 1956 年會見了舊日本軍人遠藤三郎（舊陸軍中將），對他“感謝日軍侵華”的發言非常有名。本書在獲得遠藤三郎的孫女遠藤十九子的許可後，閱讀了狹山市博物館所收藏的遠藤三郎的手寫日記，並且在這之後閱讀了《舊軍人眼中的中共》（遠藤三郎、土井明夫、堀毛一磨合著，文理書院，1956 年）、《將軍的遺言 遠藤三郎日記》（宮武剛著，每日新聞社，1986 年）、《廖承志與日本》（吳學文、王俊彥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年）以及《毛澤東外交文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年）等多部著作進行比照驗證。

中共政權誕生後的第二年，也就是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掉進了北朝鮮的金日成和蘇聯的斯大林的陷阱，被迫出兵參加朝鮮戰爭，而被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認定為“敵國”，並且形成了對中國的包圍圈，所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非常少，於是毛澤東就試圖接近日本。

廣島原子彈 10 週年紀念日——1955 年 8 月 6 日，世界和平會議在廣島召開，而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作為新中國的代表出席了會議。大會結束後的 8 月 20 日，在劉寧一行所住的王子酒店（Prince Hotel）中，1954 年 1 月成立的“憲法擁護國民聯合”召開了晚會，遠藤三郎也受邀參加。遠藤三郎在戰爭時期雖然隸屬於陸軍，但是卻是強烈反對日本擴大戰爭的人士之一，戰爭結束後參加了“世界聯邦建設同盟”，和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湯川秀樹以及前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較為親密。並且被前首相片山哲和前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邀請，參加了憲法擁護國民聯合。女性作家平塚雷鳥也參加了這次晚會。

在王子酒店的晚會上，遠藤三郎和劉寧一暢談，其內容大致如下。

雖然夫妻吵架其他人不應該插嘴，但是如果吵到不可開交，上刀上槍影響周圍的人的話，就不能不出手管了。和這一樣，台灣問題雖然是你們國內的問題，但是如果打起仗來的話，我們也不能袖手旁觀。因為有可能會使用核彈，這就會讓周圍的國家困擾。雖然我們因為對你們國家造成了很大的損害，沒有說這個話的資格，但是如果打仗的話，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所以還是盡量希望和平解決。

劉寧一聽到這段話很感興趣，回國之後上報給了中央。

於是沒過多久，中華人民外交學會會長張奚若就給憲法擁護國民聯合的會長片山哲寫了一封信，邀請他訪華。以片山哲為代表的憲法擁護國民訪華團於同年11月6日從羽田機場出發，途經香港於9日到達北京。在訪問了中國各地之後，於11月28日和毛澤東會見。

毛澤東先說近期打算分幾次釋放六七百名戰犯，詢問訪華團訪問戰犯的結果，並且問他們有什麼意見。這時候遠藤三郎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在戰爭結束後的第三年作為戰犯嫌疑人被關入美軍拘留所。那時候給我發的鞋子兩隻都是右腳的。右腳的腳尖朝左，左

腳的腳尖也朝左，走路的時候就不能筆直向前，老是往左拐。而在我之前訪問的戰犯中有我的老朋友，他說發給他的衣服很合身，是新做的。這和只有右腳的舊鞋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遠藤三郎說的這段話引起大家的笑聲，而毛澤東則這麼回覆他：“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們更願見到右派人士，特別是遠藤先生這樣的軍人。”毛邀請他可以單獨率領一個舊軍人代表團來訪。

遠藤三郎雖然覺得是在說笑，但是在訪華團回國的11月30日，廖承志來機場送行的時候，特意向他轉達說，周恩來總理希望他儘早率領舊軍人代表團再次來訪。

這位廖承志，正是潘漢年在岩井英一那裡活躍的時候，在香港的革命據點負責為中共籌集物資和資金的人。中共建政後，擔任過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主席等職務，沒有像潘漢年一樣被投入獄中。本書前面也說過，這是因為廖承志能夠操一口日本的江戶小子（純粹的東京人）也比不上的流利日語，對毛澤東來說很有利用價值。

遠藤三郎回國之後，馬上就開始邀請舊軍人參加“訪華舊軍人團負責人會（訪中元軍人団世話人会）”，最終有200多名舊軍人愿應邀加入。因為訪華費用是由中國所出，所以人數太多了也

不行；日本國內也開始警惕他們這樣大規模的行動，日本政府也不情願給他們發護照。輿論也開始批判他們“用中共的錢搞間諜活動”。最後，舊軍人訪華團的人數被減少為 15 名，於 1956 年 8 月 12 日到達了北京。

代表團訪問東北後，廖承志在 1956 年 9 月 4 日給毛主席寫報告稱“為能使他們進一步擴大對日本的影響，主席接見他們一次確實是有極大好處的”。

毛澤東看了廖承志的報告之後，當天就同意和訪華團見面。當天傍晚代表團突然收到會見的通知，十分驚訝。

會見地點在毛澤東會見外賓時使用的中南海勤政殿。這是清朝康熙帝所修復的明朝建築物，共和國成立之後再次修繕，整備得十分光鮮。雖然 1958 年人民大會堂建成之後，會見國賓應該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但是毛澤東本人不太喜歡那裡，如果人數不是太多的話，一般都是在勤政殿接見外賓。

本來在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在哪裡建立首都的時候，也有人說南京，但是毛澤東卻堅持要把首都設在北京。想來是因為他想要坐在歷代皇帝所坐過的中南海當“皇帝”吧。

廖承志帶領舊軍人代表團來到勤政殿後，毛澤東等人已經等在那裡，和他們每個人握手。《廖承志與日本》一書中這樣記錄當時的場景。

毛澤東開場第一句就是：

“感謝日本軍閥進攻了我們（中國），否則我們今天可能還到不了北京。雖然過去你們和我們打過仗，一切願意再來中國看看的舊軍人我們都歡迎”（筆者注：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沒有用“侵略”一詞，而是用“進攻”這一中性的字眼）。

毛澤東接下來幽默地說：

“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侵華），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

在《廖承志與日本》中，當然是基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不惜犧牲一切，奮勇誓死抗擊日寇，才成為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的“抗日神話”這一背景來解釋這段發言。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和潘漢年一起在香港革命據點工作過的廖承志當然是對此一清二楚的。

受夠了左翼的“謝罪”

毛澤東於1956年9月4日會見遠藤三郎等人時，潘漢年已經

被投入獄中。潘漢年於 1955 年 4 月逮捕入獄，目的是為了封口。

毛澤東不願意談論過去的事情也許也和這件事有關。

和遠藤三郎一起訪華的舊陸軍中將堀毛一磨在筆記中寫道，毛澤東等政府要人總是一個勁地強調“忘掉過去、一起探討未來”，令人印象深刻。

這和毛澤東生前完全沒有提過“南京大屠殺”，以及沒有慶祝過“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想來是同樣一種心態。總而言之，毛澤東就是不希望老是提到蔣介石帶領國民黨軍在第一線作戰的“過去”，所以對日方訪華人士一個勁的“謝罪”非常厭倦。

毛澤東想要聽到的不是謝罪。

1961 年 1 月 24 日，毛澤東在和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黑田壽男的談話中，這樣說道：

日本的南鄉三郎見我時，一見面就說：日本侵略了中國。對不住你們。我對他說：我們不這樣看，是日本軍閥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麼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中略）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願“感謝”日本軍閥。（《毛澤東外交文選》460 頁～461 頁）

然而，很有趣的是，毛澤東於1964年7月10日和日本社會黨佐佐木更三和黑田壽男等社會黨一派訪華代表團見面時的談話，在《毛澤東思想萬歲（下）》（東京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會譯，三一書房，1975年）中也有記錄，但是毛澤東本人使用的“進攻”等詞卻全被翻譯成了“侵略”。

也就是說，日方有“侵略”的概念和贖罪的意識，但是毛澤東卻一直迴避了“侵略”這個字眼。佐佐木等人還是一直謝罪，所以毛澤東開始提到從中華蘇維埃區逃到延安的長征的事情。他說：

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我們眼前可以浮現出毛澤東不要再說、“不要讓我繼續說這件事”的神態。

毛澤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非常實誠的人。

抗日戰爭正式爆發（1937年）反而是蔣介石再次合作（1936年的西安事變）的原因，這一奇妙的倒因為果曾經讓筆者糾結了許久。然而毛澤東不但毫不猶豫地承認了這一點，並且坦言共產黨

軍正是因為有了抗日戰爭才會變得強大。毛澤東肯定已經厭煩了開口閉口都是謝罪的親華日本人，他所希望邀請來的乃是岡村寧次。然而岡村卻拒絕訪問中國。

為什麼毛澤東如此希望岡村寧次訪問中國呢？

毛澤東和蔣介石，爭奪岡村前大將

毛澤東無論如何都希望岡村寧次訪華的理由，乃是因為他知道岡村寧次和蔣介石聯手，打算反攻大陸。岡村寧次因為被蔣介石和何應欽的仁慈所感動，所以在返回日本之後，為了蔣介石組建了軍事顧問團“白團”。

岡村寧次於1949年1月30日從上海港口出發，並於1949年2月4日晨返回日本。他作為戰敗一方的總司令官卻能無罪回國，乃是因為蔣介石為此做了許多不同尋常的努力。

日本簽字投降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9月10日，岡村接待何應欽總司令官拜訪，並與之會談。何應欽對岡村說：“日本已經沒有武器了，現在開始才能夠真正的中日和平攜手。希望我們都能把這一點放在心上。”而本來就不認為應該擴大戰爭的岡村也感激地表示“這樣終於能夠實現年輕時就夢想的真正的和平友好了”。同年12月23日，蔣介石特意和岡村直接會見，進行了以

下的談話：

蔣：你身體健康嗎？生活上如有不便，請勿客氣地向我或何總司令提出，盡量給予方便。

岡村：深感厚情，生活蠻好。

蔣：從何總司令處得悉，接收順利進展，殊堪同慶。日本僑民有何困難，也請提出。

岡村：目前沒有，如發生困難，當即奉告。

蔣：中日兩國應根據我國孫文先生之遺志，加強協作，實為至要。

岡村：完全同意。（出自《岡村寧次大將》。在此引用原文）

岡村在日記中還說“蔣委員長特意安排了這次會見，以好言相慰、和藹近人，深感敬佩”。

遣返 105 萬復員日軍回國，一般來說需要花費五年時間（岡村和蔣介石都這麼認為），然而卻在 1946 年夏天就基本完成。因為領海的關係，美軍提供了許多坦克登陸艦來運輸被遣返人員。而在中國的約 130 萬日本人的遣返，也從夏天開始到秋天就基本完畢。

這樣，再也沒有讓岡村留任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長職位的

理由。然而，蔣介石想方設法延長岡村在中國進行軍事裁判的日程，讓他能夠晚一點回到日本。因為在東京正在進行軍事審判，岡村返回日本後一定會作為戰犯，承受嚴重的處罰，中國國內也開始大肆談論岡村的戰犯問題。再也無法拖延下去的時候，岡村突然高燒 39 度——長年以來的肺結核終於惡化。他被送進上海的醫院，之後接受了約 10 個月的療養。

直到 1948 年 4 月，日本東京審判還沒有完畢，而在中國的軍事法庭也有許多日軍戰犯被處以死刑，終點越來越近。無法進一步拖延對岡村的裁判，何應欽終於在 7 月 8 日被迫開始審判岡村的戰爭罪行。8 月 14 日，岡村出現在軍事法庭，並被關入戰犯監獄。然而這時候他又突然發作心臟期外收縮，於是被假釋並接受緊急治療。在這段時間內東京裁判結束了。

蔣介石終於在中國的軍事審判中對岡村做出“無罪”判決：岡村擔任對華司令官已經是 1944 年 11 月，並沒有參與南京大屠殺，而南京大屠殺責任人已經被處以死刑；岡村在戰敗後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即刻讓舊日軍停戰，並且為能將所有的武器和生產設施都交給國民黨軍一方，做出了很多努力。

公判結果宣布後，法庭內一片喧嘩，記者蜂擁而上，但是岡村已經從後門溜出，乘上了停泊在港口的美國船隻約翰·W·維克斯號，船上有軍官湯普森（Commander William Lewis Thompson）等

幾百人在監視他。

毛澤東點名說岡村是第一號戰犯，這時候的國民黨政府代理總統李宗仁則違背了蔣介石和國民黨，以把岡村交給中共為交換條件和中共議和，命令重新逮捕岡村。

約翰·W·維克斯號的日本人船長告訴岡村“剛才東京的廣播裡說，中共對國民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之一，就是要求把岡村交給他們”的時候，這艘船已經開出了中國領海。千鈞一髮。

蔣介石為何要如此費盡心血來保護岡村呢？

這不光是因為友情，而是因為其高度評價岡村大將的軍事能力。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期間，深受蘇聯和美國派來的軍事顧問之苦。每個國家的軍事顧問都只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一點也沒把中華民國的利益放在眼裡。蘇聯的斯大林只想著要擴大共產主義的勢力範圍。美國的羅斯福被共產國際的間諜所惑，也站在中共一方。

蔣介石所想要的是不被任何國家支配的獨立的中國。而這樣下去中國只會變成共產國際的屬國之一，孫中山的夢想無法被實現，自己則會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要歷經苦難走到這一步而充滿悔恨。

然而岡村卻不一樣。他是認真地尊敬並感謝蔣介石。其作戰能力之高，在抗日戰爭最後階段的戰鬥中就能看出。加上他還是敗軍之將，不可能打著征服中國的算盤。

另一方面，毛澤東則爆發出在抗日戰爭中積蓄的實力，向蘇聯所佔領的滿洲進發，並且無視蔣介石的命令，在向東北進發的途中解除沿途各地日軍的武裝，不光是武器彈藥，連製造飛機的工廠也不放過，把前日軍軍人和技術人員據為己有。

比如說在 1945 年 10 月，共產黨軍包圍了前日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並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大隊長林彌一郎所率領的部隊把武器交給了共產黨軍。共產黨軍——具體的說，是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中共東北局書記彭真——用白米、蔬菜和雞肉來款待日軍俘虜的代表，以此來收買人心。並且單刀直入地提出“共產黨軍沒有空軍。希望能夠幫助我們建立航空學校”的要求。林彌一郎一開始對居然讓俘虜做這種事情感到很困惑，但還是點了頭。

於是以前日軍的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 20 名飛行員，24 名機械技術員、72 名製造技術員等 200 人為骨幹，於 1946 年 3 月 1 日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

蘇聯和中華民國之間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政府在本條約及附件中做出了以下三條約定（下文

中，“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東三省和現在的東北三省範圍基本一致)。

一，蘇聯政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分，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並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條約第五條所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蔣介石在其所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寫道，這些條約不但沒有被遵守，而且在毛澤東和重慶進行和平會談的同時，中共也在同時緊鑼密鼓地進軍，準備打倒國民黨軍。日本戰敗之後，蔣介石想要避免內戰，所以約見毛澤東，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答應。最後蔣拜託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赫爾利，終於把毛澤東拉到了重慶，進行和平建國的會談。1945年10月10日，在紀念辛亥革命的雙十節，發表了《雙十協定》。

在宣布不會進行內戰的同時，另一方面毛澤東卻發出了緊急命令發動內戰。

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如此寫道：

從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軍佔據城市二百座；在膠

濟、津浦、隴海、平綏、北寧、德石、平漢、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據點，妨害華北和華中的交通要道；並威脅了山海關到杭州的海岸線，自垣曲到武陟的黃河沿岸，及蘇皖兩省的長江沿岸和運河線。

九月十一日之後的一個月，正好是國軍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的時期。在全國分成十一個地區接受總數一百二十五萬五千的日軍投降，並按照同盟國軍總司令部的規定將其返送回日本。然而共產黨軍卻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及江蘇省北部包圍了近三萬名日軍並對其解除武裝，並且沒有把他們返送回日本。（103 頁～104 頁）

在這種情況下，逃往台灣的蔣介石為了“反攻大陸”而向岡村寧次求助，可以說是毫不奇怪。

舩木繁在《岡村寧次大將》一書的尾聲裡寫道：

歸國後，岡村大將接受了蔣介石總統的請求，拋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考慮，而僅僅是為了報答終戰後的恩情，於昭和二十五年（1950 年）二月，把以富田直亮為首的十九名陸軍參謀送往台灣。這個軍事顧問團被稱為“白團”，持續了十五年，其團員人數總計達八十三名。之所以被稱為“白團”，乃是因為其團長富田直亮（舊日本陸軍少將）的中文名字是“白鴻亮”。（345 頁）

舩木繁本人是前陸軍少佐，曾經擔任過中國派遣軍參謀一職，也是岡村寧次的部下。所以這可以說是非常值得信賴的情報。舩木於1984年出版了《岡村寧次大將》一書，2009年中國共產黨官方發行的《世紀》雜誌上刊載其內容之後，其詳情在網絡上被不斷轉載，現在還在繼續擴散。

其中非常有趣的是，關於“白團”的情報“於1951年春天被香港的報紙所報導”這一事實。廖承志於1940年前後正是把八路軍的情報根據地設置在香港。本來是地下活動，但是日本戰敗、香港重新變成英國領土之後，間諜活動愈演愈盛。所以中共自然不會放過這一情報，應該馬上就通過廖承志上報給了毛澤東。

所以中共才會想盡一切辦法要讓岡村寧次訪問中國，讓他倒向毛澤東這一邊。

雖然已經把蔣介石國民政府趕到了台灣，但是對北京政府來說，國共內戰並沒有完結。要對台灣發動攻擊，不能缺少空軍和海軍。雖然讓前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等人倒向中共這邊，並成立了航空學校，但是隨著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徹底偏向台灣，並把第七艦隊派往台灣，代表“中國”占據聯合國席位的是“中華民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還沒有獲得國共內戰的最後勝利。

特別是在國共內戰後期本應該已經放棄蔣介石的美國，卻因

為朝鮮戰爭的爆發，突然改變了對台灣的態度，試圖讓蔣介石向中國大陸的東海岸發動游擊戰，來削弱朝鮮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兵力。所以美國才會打算讓蔣介石去打海南島，然而蔣介石並不太贊同這一戰略。

美國得知蔣介石設立了白團，並且接受舊日軍的支援之後勃然大怒。因為美國對戰敗後日本的基本方針是“徹底解除武裝”和“絕對不讓日本再次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在1946年制定的日本憲法第九條裡明確地規定了這一點。然而因為1950年爆發了朝鮮戰爭，所以美國突然開始把日本定位為守護遠東的橋頭堡，並且要求日本設立警察預備隊並締結日美安保條約。美國對日本的軍事行動的態度，在這個時候就有其內在的矛盾。

蔣介石也有在抗日戰爭中為美國所派遣的軍事顧問所煩惱而虛度三年時光的痛苦經驗，所以才沒有聽從美國的忠告，而把賭注押在了岡村寧次所率領的白團上面吧。但是如果美國也願意幫忙的話，也沒有拒絕的理由。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後，毛澤東開始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兵力針對台灣集中。1954年9月3日，解放軍向駐守金門島的中華民國國民黨軍炮擊，因此同年12月2日中華民國和美國之間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此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參謀長張愛萍率領軍隊，於

1955年1月18日進攻並佔領了中華民國勉強防守的浙江省一江山島。

然而中華民國在台灣本島和澎湖列島之外，還死守福建省的金門島和馬祖島，以謀求反攻大陸的機會。所以毛澤東從1955年到56年緊鑼密鼓地中國大陸東海岸鄰接中華民國所控制的金門島的地方建設飛機場和軍用道路，以及鋪設能夠搬運物資和兵力的鐵路，以備不時之需。

實際上毛澤東認為日軍是最強的。因為在朝鮮戰爭中，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和美英聯軍作戰過的彭德懷，就告訴他世界上最強的軍隊是日軍，英美只能算是二流。而彭德懷也評價日軍的總司令官岡村“很厲害”。另一方面，岡村也很尊敬在百團大戰中交手的彭德懷，盛讚在中共也有厲害的將軍。

毛澤東想要邀請原日軍大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國。

日本戰後處於GHQ（General Headquarters，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統治之下，所以中國人認為“日本被美帝國主義變成了殖民地”，而發動了激烈的反美運動。對中國來說，沒有比朝鮮戰爭後建立對中包圍圈並且支持台灣的美國更壞的國家了。筆者當時在天津上小學，路上貼著“杜魯門和吉田茂手持滴著血的美元和炮彈”的海報，學校裡也高喊各種打倒杜魯門的口號，還出現了批判杜魯門的歌曲，每天讓大家唱。

所以毛澤東才會明言包含釣魚島的沖繩縣乃是日本領土，並主張美國應該放棄把沖繩作為殖民地而歸還給日本。

從屬美帝的政治家是“壞人”，而戰敗後仍然敵視美國的舊日本軍人則受到毛澤東的歡迎。從這個意義上，毛澤東也希望岡村寧次能夠訪問中國。

所以 1955 年 11 月 28 日毛澤東在和遠藤三郎見面時，才會邀請他單獨率領一個前軍人代表團來訪，希望他能夠帶大將級別的前軍人訪華。在中國提供的希望邀請的名單中，明確寫有“岡村寧次”的名字。而遠藤三郎雖然想盡辦法邀請岡村寧次訪問中國，但是岡村卻以“自己和台灣有關係”而斷然拒絕。

1950 年代，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愈加緊張，充滿了不可測的因素。所以毛澤東才會熱烈歡迎舊日本軍人，所以才會不想聽到左翼來訪者的謝罪了吧。

毛澤東在得知通過遠藤三郎無法邀請到岡村寧次之後，開始邀請前陸軍大佐辻政信。辻在敗戰之後長袖善舞，於 1952 年當上了眾議院議員，所以毛澤東認為他有一定的力量。然而辻樹敵太多，岩井英一也對他抱有怨恨。因為他後來知道辻雖然一時投靠自己並出入岩井公館，卻在私下背叛了自己，並且在岩井被從上海左遷到廣州這件事上出了力。辻把他和中國領導人的會談記錄在《動亂之眼——與亞洲・阿拉伯的指導者對話》（辻政信著，每日

新聞社, 1958 年) 一書中, 然而本人卻於 1961 年在訪問寮國的時候失蹤了。岡村寧次當然也拒絕了辻的邀請。

辻被日本的歷史評論家嘲弄為“昭和的愚將”。毛澤東連對這種人物也“只要是舊日本軍人, 都希望能拉來中國”, 這讓知道辻的日本人十分驚訝。

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導致了大規模的飢荒, 而蔣介石則認為這是反攻大陸的好時機, 於 1962 年和白團一起策劃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 然而美國卻反對全面開戰。想必對蔣介石來說, 美國的支持一直到最後都讓他感到縛手縛腳, 十分糟心。1966 年岡村寧次去世之後, 白團也自然消失, “反攻大陸”也隨著蔣介石逐漸年老以及美國對中國大陸態度的微妙變化, 變成了一句空話。

如前所述, 蔣介石所想要的是不被任何國家支配的、獨立的中國。看到中蘇對立的蔣介石, 也許認為“這樣就好了”吧。畢竟, 如果中共還是在王明等“28 個半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話, 那麼正像蔣介石所擔心的一樣, 中國只會變成蘇聯的附庸國, 中華民族的驕傲將會被踐踏。所以毛澤東不是堅持馬列主義, 而是提出馬列主義的中國化, 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執政, 可以說是正確的選擇; 而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所提出的“毛澤東思想”, 從“讓中國不變成蘇聯的附庸國”這一點上來說, 也是正確的選擇。

但是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寫道, 共產黨所支配的國家必

定會變成獨裁，進而謀求霸權。並且從這個意義上預言“共產主義國家，最終必將毀滅”，並且非常堅決地批判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中國。

這一分析難道不是正中目標嗎？

在朝鮮戰爭於 1953 年停戰之後，毛澤東開始遣返在中國包括留用技術人員的日本人盡快回國。筆者一家也於 1953 年 9 月被半強制地遣返回日本。相隔數十年後，1990 年代，當筆者和天津的小學老師重逢時，他對筆者這麼說：

“其實啊，那時候遣返日本人，是因為毛澤東擔心日本人這樣呆在中國的話，會變得討厭中國，所以才下的命令。”

他偷偷地告訴筆者，即使教科書中沒有寫，但是因為抗日戰爭時代中共宣傳得太過火了，所以中國人民變得無比憎恨日軍的殘暴行為。

關於對歷史的認識

日本軍部曾經做出多麼愚蠢的行為，對中國韓國等周邊國家的人們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並且最後對日本國民自身也造成了多大的危害，這一點時至今日已不必多言。但是與這樣的日軍同謀殺害國民黨軍士兵的，正是現在肖像還掛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而

對中國共產黨政權做出貢獻的，不是別人，正是日軍。

我們應該怎樣面對和消化這一諷刺的事實呢？

日本的確在日俄戰爭中成功阻止了西方列強想要把日本殖民地化的企圖。不光是孫中山和蔣介石，連毛澤東也高度評價這一點。如果日本在這個時候能夠不再擴大戰場的話，中共絕對無法獲得壯大自身的機會。那麼現在日本的鄰居“中國”想來就不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中華民國”了吧。這一點連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所以他才會“感謝皇軍”。

那麼現在共產黨政權的中國對日本不厭其煩地打出“歷史牌”究竟是什麼呢，我們終於開始面對這一問題。當然本書的目的絕對不是要給侵華戰爭“正名”，而是要在明確這一點之後看清歷史牌的真相。

正像序言和第三章裡所提到的一樣，毛澤東一次也沒有對日本提出過歷史問題，在其生前，一次也沒有紀念過所謂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中國開始討論歷史問題，正是在毛澤東逝去的幾年之後。在這之前，連南京大屠殺都不太為中國人民所知。雖然在《人民日報》上是寫著因為80年代初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才導致中國國內廣泛認識到“南京大屠殺”，但是中國大陸的網絡上也有通過舊日本軍人及日本左翼記者知道的情報。不管是哪一種，都可以說

是由日本所提供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江澤民的父親曾經擔任過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副部長，所以他自然無從得知毛澤東老練的戰略。江澤民在抗日戰爭時代，作為日本軍閥一方官僚的兒子，過著奢侈的生活。所以才會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中，很罕見地既能跳舞又能彈鋼琴。雖然江澤民在日本戰敗後急忙的倒向中國共產黨這邊，但是他一定很害怕如果讓中國人民知道自己出身的話，那麼別說是國家主席，連共產黨員的資格都會被剝奪吧。所以江澤民才會拼命展現自己是多麼反日，並在 1994 年開始的愛國主義教育中不斷地煽動反日情緒，來掩蓋自己的出身。

在全國範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是從 1995 年開始。同年 5 月江澤民被邀請到莫斯科參加“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50 週年紀念慶典”，受到很大的衝擊。為什麼不能把“中國”定位為和中華民國一起作戰的反法西斯同盟國的一員呢？在這之前雖然中蘇交惡，但是 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邀請中國參加這一慶典，極大地刺激了江澤民的自尊心。

1995 年 9 月 3 日，中國首次在全國範圍內盛大舉行了“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的慶典，而江澤民把抗日戰爭定位為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開始強調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戰爭中做出了多大的貢獻。

曾經通過土地改革讓革命成功的中國共產黨，向反抗地主的農民灌輸“如果革命不成功的話，你們將會受到地主的報復”的恐懼。這一恐懼深深地紮根在大地之中，並且導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的大規模屠殺。就像這一樣，踩了反日情緒這一地雷的中國，如果不一致高呼反日的話，就會被打成賣國賊，已經沒有了退路。

這既是大地之法則，也是在大地中脈動的血管——筆者稱之為“大地的創傷 (Trauma)”：如果不猛烈地批判對方，保證自己一直處於批判者一邊的話，自己就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當年為了不被打成反革命，現在為了不被罵做賣國賊，所以才拼命地高呼革命、高呼愛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也一樣。這就是大地的心理創傷，是中國共產黨開始鬧革命之後對老百姓灌輸的恐懼心理。

江澤民所煽動的反日，正是讓中國人民踩了這一地雷。

毛澤東本人甚至討厭“愛國”這個詞語。共和國誕生前的愛國，愛的是“中華民國”：“現在談愛國，那是愛誰的國？蔣介石的國吧？”毛澤東曾經這麼說道。就連這一點也不知道的江澤民，因為1989年6月4日所發生的天安門事件而進入中央，並且為了保護自己的目的，把本來不是反日的愛國主義教育變成了反日的“心理創傷”。不管老百姓還是政府，為了避免被罵作賣國賊（或賣國政府），拼命地高喊反日。

而最受這一點影響的，乃是這之後共產黨的領導人們。前國

家主席胡錦濤為了填補愛國主義所喚醒的“大地的創傷”，為了修正“稍微親日就被罵做賣國賊的精神文化”，讓馬立誠撰寫了《對日關係的新思考》——馬立誠當時是《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而《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沒有胡錦濤的批准，馬立誠不可能寫這種敏感文章。

可是連馬立誠和胡錦濤本人都被罵作“賣國賊”和“賣國政府”，所以不得不慌慌張張地偃旗息鼓。而接替他的習近平政權，想來已經沒有了退路。2015年9月3日，在中共建國後首次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進行了閱兵——雖然在“抗日”兩字的前面有“中國人民”一詞，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正確的。

但是中國卻逆歷史之流而上，彷彿倒退回到抗日戰爭剛結束的時候一樣狂熱——距離抗日戰爭結束之日越久，變得越來越狂熱。2015年7月7日（七七事變之日）到9月3日之間，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每天都以“歷史不容遺忘”為名，在新聞聯播之後連續播放抗日戰爭的紀錄片。其激烈程度彷彿中國人民現在正在進行抗日戰爭一般，而9月3日晚上舉行的晚會中，以南京大屠殺為首的劇目，則讓人聯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激烈。

這意味著什麼呢？難道不正意味著一旦踩了“大地的創傷”這一地雷之後，就沒有了退路，只能在反日這一條道路上一直走到黑嗎？在習近平政權誇耀“打敗了日軍的偉大中國共產黨”“抗

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中國共產黨”等，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大舉閱兵之際，就已經沒有了回頭之路。

中國為了共產黨的政權正當化，提高凝聚力，此後還會一直採取歪曲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的歷史、讚美自己並且一直批判日本的手法吧。這樣只會讓互相之間的憎惡逐漸增大，對中日兩國來說絕不是一件好事。這樣下去的話，中日兩國關係只會陷入危險的漩渦之中，無法脫身。並且中國共產黨強迫中國人民接受這一意識形態，也有著限制甚至壓迫中國人民的言論自由和思考自由的一面。這乃是對中國人民尊嚴和權利的侵害，這樣下去人民是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的。而為了擺脫這一結局，我們必須擁有客觀地去檢證事實的勇氣。同樣也需要再一次堅定不再邁向戰爭道路的決心。

為了中日兩國之間能夠真正的互相理解，為了不要再一次引起戰爭，為了兩國人民將來真正的幸福，中日兩國都一定要正視真實的歷史。

希望本書能夠對此作出一些推動。

尾聲
毛澤東到底殺害了多少
中國人民？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毛澤東為了保持自己“王位”的穩定，立刻開展政治運動對殺害、鎮壓中國人民。

其手法源自中共建政前1941年至1945年初展開的延安整風運動。

1941年9月，毛澤東在延安對王明說：“我想建立毛澤東主義。一個領導人如果沒有自己的‘主義’，他在生前就可以被別人推翻，而在死後他甚至會受到攻擊，如果有了‘主義’，情況就不同了。”他想要把中國共產黨思想變成毛澤東主義，說好聽點就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的確，列寧主導的俄國革命是以都市勞動者為中心的革命，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則是第一次以農民為中心的革命。其意義大相逕庭。

但是按照王明的說法，毛澤東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目的，是為了發展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讓自己的地位變得更加牢固。王明在《中共50年》書中，記錄了毛澤東是如何崇拜秦始皇，如何渴望自己不光是活著的時候，死後也想要成為“永遠的帝王”受人崇拜。

毛澤東不光是圖謀脫離來自莫斯科的支配，對自己沒能參加的1919年五四運動也持反對觀點。二者的共通點都是“知識分子”。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知識分子在他面前擺架子，也討厭以北京大學學生為中心擴散到全國範圍的愛國民主的五四運動。

其結果是，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穩固，試圖用以“個人崇拜、集團主義”的毛澤東思想，來取代馬列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和五四運動精神。

當時的劊子手正是康生，用的是學自蘇聯貝利亞的手法。1943年又掀起了“搶救運動”，讓大家互相告密揭發，美其名曰“搶救”，導致中國到現在告密文化根深蒂固。

延安整風運動的成功案例在共和國成立之後還在不斷地重複。

在這裡簡單的分析一下毛澤東究竟殺害了多少中國人民。因為中共中央想來也不會給出正確的數字，而要嚴格地來檢討這一數字的話，足以寫上整整一本書了，所以本書在這裡只說一下大概的數字。

首先從1951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開始，到1952年發展為“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在被統稱為“三反五反”的這些運動中，大約有200～300萬人被逮捕入獄。三反五反的目的是為了肅清朝鮮戰爭中蠢蠢欲動的國民黨分子。毛澤東對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下達了“那時時機還不成熟，如果提出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也打起來了，因此不能浪費了這

個時機”的命令，並且“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這時候筆者在小學教科書中學到的是“我國有六億人口”（確切來說是 5.6 億），算下來 300 萬人實在是太多了。當然，大多數人都死在獄中。

接下來毛澤東震驚於 1956 年 2 月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懷疑“自己死後莫非也會遭到批判”，於是發動了讓大家暢所欲言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然而在發現有很多知識分子批判共產黨並且擔心毛澤東的獨裁化後，便於 1957 年展開了“反右派運動”，把自由發表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批鬥、囚禁和勞改。中國政府方面公佈的是 50 萬人，而筆者的一位朋友乃是現存少數經歷過“反右派運動”的“五七老人”之一，告訴我當時有 300 萬人被整肅。

還有許多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搖擺，改投共產黨的前國民黨員或者是支持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中，有許多人經歷過“三反五反”之後對共產黨的統治抱有恐懼。而毛澤東在把這些人都打成“右派”一起肅清了之後，接下來為了向國內外證明自己擁有快速實現社會主義路線的能力，於 1958 年發動了“大躍進”。要求在 15 年內鋼鐵產量超越英國，動員所有農民大煉鋼鐵，在煉出來大量不能用的廢鐵的同時，導致了田地荒蕪，造成據說有幾千萬人餓死。

毛澤東於 1959 年為了“承擔責任”被迫辭去國家主席一職，對接替他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恨之入骨。他為了把劉少奇拉下國家主席的寶座，讓自己恢復權力絞盡腦汁，終於於 1966 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慘無人道的暴力和屈辱，最終於 1969 年在獄中去世。而毛澤東的憤怒卻沒有因此而消退，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澤東死後的 1976 年才畫上休止符。葉劍英在 1978 年 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指出：“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 2000 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 1 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 8000 億人民幣”。最近西方的一些研究說死者並沒有達到 2000 萬人，但是這只是誤差而已。很難想像葉劍英會把數字往多了說。

文革開始後毛澤東打算取消國家主席一職，所以這一職位一直都空著，1978 年 3 月就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葉劍英，乃是實際上的國家元首。而這位葉劍英則正是潘漢年等人在香港和上海進行間諜活動的時候，派遣女性作家關露作為間諜，潛入汪精衛政權的特務機關 76 號李士群手下的人物。

中共建政後，光是害死中國人民的數量，大致一算就超過 7000 萬人。

如果加上筆者親身體驗的卡子中餓死的人數，把軍事情報賣

給日本導致國民黨軍人的死亡人數，這數字還會更多。在中國也有人在批判毛澤東的文章中說，毛澤東所害死的中國人民的數量，如果算上被殺害的那些適婚男女的孩子在內的話，甚至超過一個億。

就算少算一點也有 7000 萬人，退一步就算只有 5000 萬人，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屠殺了如此多自己國家的人，大概只有毛澤東一人吧。

這還是戰爭結束之後屠殺的本國人民的人數。

這是並非為了戰爭，而是在和平年代，本應該建設國家、帶給國民幸福的時期，害死的本國人民的數目。如果考慮到這一事實的話，那麼不難想像，在抗日戰爭中把中華民族出賣給日軍，對他來說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已吧。

儘管如此，毛澤東在中國還是像神一樣受人崇拜。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毛澤東的帝王之術獲得了成功。從結果上來看，毛澤東思想成功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政權維持至今，也可以說是“結果好一切就好”。

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中反覆強調“毛澤東罪大惡極”，儘管如此，筆者實際上並不這麼認為。

毛澤東乃是一位“窮極帝王之術的人物”，他敏銳地判斷局

勢，並且實施了獲得勝利的戰略，而是否要把這種行為定位“罪大惡極”，乃是作者主觀上的問題。從筆者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包括他的“虛假宣傳”在內都充滿了戰略，並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誠實”的，所以筆者對他甚至抱有敬畏之念。

但是為了把不利於自己的歷史真相永遠掩蓋，中宣部不得不創造“神話”來歪曲歷史。現在進行時的“創造神話”的中宣部，完全可以說是罪大惡極。當然，人民在目睹現在共產黨政權所導致的腐敗和不平等之後，也正是因為這一神話導致他們反而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認為那個時候雖然貧窮但是人人平等，比現在好多了。想必習近平政權也對這一“紅色懷舊”現象大傷腦筋吧。

儘管如此，從 80 年前的西安事變，時至今日，一直都對人民群眾洗腦、灌輸“中華民族的夢想、共產黨的夢想”的中宣部的力量不可小覷。

筆者自從 1946 年 4 月，當時的長春市委書記林楓所派遣的趙大哥那裡，聽到他對革命和毛澤東的熱情讚頌之後，很長時間內心中一直都有這樣一種火焰在燃燒著。這種洗腦的感染力和滲透力是如此可怕。

當時那位年輕的八路軍究竟是誰？

在執筆本書的時候，突然開始在意“趙安博”這個名字。趙安博是本書第七章中所寫的，毛澤東在會見日本客人時的一名翻

譯。一位是廖承志，另一位就是趙安博。

日語流暢又姓趙……

筆者急忙在網上調查趙安博的過去，發現他曾經於 1945 年 10 月在長春負責接管“滿洲映畫”（偽滿電影協會），並且在這之後擔任日僑管理委員會在中國的負責人。

趙安博當時正在長春！

和父親非常親密的林楓在 1948 年擔任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而趙大哥則是林楓直接派來的八路軍。在當時大多是泥腿子出身的共軍中，趙大哥是能說日語的知識分子。笑起來眼睛眯起來，表情溫柔的“年輕八路”。

他當時只有 27 歲。曾經在東京帝國大學留過學。

筆者一直被他所說的“你是小英雄”的話語所鼓勵，在天津的小學度過的那段時期，無論怎樣作為日本人被欺負，心中都被這句話所支撐著。另一方面，在卡子中卻又怨恨“趙大哥說謊”、“什麼毛主席、什麼紅太陽”，心中一直在鬥爭。

那位趙大哥就是趙安博嗎？

我把自己的人生定位為“未完成的革命”，一直都沒有畫上句號戰鬥至今，然而現在終於感覺可以畫上句號了。不僅是因為知道了趙大哥是誰。雖然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因為知道了當時那股火熱的“革命”，其面紗之下原來是像這本書中所

寫的一樣。

在點和點、線和線所圍成的面之中，心懷熱情的中國人民——他們是真心地相信革命，相信毛澤東。連我也被趙大哥的一句話所感動，掙扎著度過了一生。

在那個絕望的時代，就像趙大哥一樣，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士們也是拼命地相信著這一點。為了他們的名譽，我必須在這裡說明，他們是真心地為中國著想，在戰鬥的時候也是十分勇猛果敢的。

遠藤三郎的孫女遠藤十九子、狹山市博物館館員以及《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 岡村寧次大將》的作者舩木繁的夫人在筆者在執筆本書的時候，給予了很多的幫助。在這裡對他們表示感謝。《夢幻的日中和平工作 軍人今井武夫的生涯》的作者今井武夫的兒子今井貞夫在百忙之中，於 5000 多份資料中幫筆者尋找與揚帆相關的資料，令人感謝不盡。

實際上，新潮新書的橫手大輔很早就讓筆者寫一本關於毛澤東的書，但是筆者因為要寫其他的書，也有許多演講，一直拖到現在。最終開始執筆本書之後，發現意想不到地找到了自己一生課題的答案，這都要感謝橫手先生的熱情和誠意。筆者一直對自己說，只要中國不承認卡子的事實，“我的革命戰爭”就沒有完結，並且一直和中國問題搏鬥至今，但是也許應該更早一些著手對毛

澤東的分析吧。在分析毛澤東的心理變化的同時，徹底地追逐當時的事實，終於讓筆者內心的搏鬥畫上了休止符。從心底感謝橫手先生。

作者附注：筆者不是歷史專家，並沒有充分的知識。如果有不確之處，還請多多包涵，如果能夠告訴筆者，將不勝感激。本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描寫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此外的細節有所省略，還請諒解。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中下卷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6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

《毛澤東傳 1893——194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

《粟裕戰爭回憶錄》(粟裕著,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聶榮臻回憶錄》(陳漢明編,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我的回憶》(張國燾著,東方出版社,1998年)

《歷史的回顧》(徐向前,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

《潘漢年的情報生涯》(尹騏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潘漢年傳》（尹騏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
- 《揚帆自述》（揚帆著，群眾出版社，1989年）
- 蔣介石親筆日記原文（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
- 《汪精衛與陳璧君》（陳舒偉、鄭瑞峰著，團結出版社，2004年）
- 《廖承志與日本》（吳學文、王俊彥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
- 《現代稀見史料書系 中共50年（內部發行、僅供研究）》（王明著，徐小英等譯，東方出版社，2004年）
-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高華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
- 《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戴向青、羅惠蘭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謝幼田著，明鏡出版社，2002年）
- 《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戰策略之研究》（梅良眉編著，正中文庫，1977年）
- 《剿匪戰史》（蔣中正著，國防部史政局編印，1962年）
- 《中共黨的策略路線》（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56年）
- 《中共史論》第三冊、第四冊（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中文叢書系列第 60 冊) (郭華倫著,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出版, 1969 年)

《何應欽將軍講詞選輯》(何應欽將軍講詞選輯編輯委員會, 何氏宗親會, 1969 年)

《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周佛海日記全編》(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3 年)

《歷史塵埃》(高伐林著, 明鏡出版社, 2006 年)

《毛澤東: 真實的故事》(亞歷山大·潘佐夫著, 林添貴譯, 2015 年 5 月,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歷史巨人身邊: 師哲回憶錄》(師哲口述, 李海文著, 2015 年 2 月, 九州出版社)

【日文文獻】

《回想的上海》(岩井英一著, 《回想的上海》出版委員會發行, 私家本, 1983 年)

“上警高密第一五二〇號 昭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日本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機密第七九五號 昭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機密第一四九一號 昭和十四年五月六日”(日本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報三機密第二〇二號 昭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日本国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究竟在做什麼——被掩蓋的歷史的真實》(謝幼田著,坂井臣之助譯,草思社,2006年)

《支那事變的回想》(今井武夫著,美篤書房,1964年)

《夢幻的日中和平工作 軍人今井武夫的生涯》(今井貞夫著,中央共論事業出版社,2007年)

《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 岡村寧次大將》(舩木繁著,河出書房新社,1984年)

《岡村寧次大將資料 戰場回想篇》(稻葉正夫編,原書房,1970年)

《現代史資料 13 日中戰爭 5》(參考了其 349 頁~ 398 頁影佐禎昭所著《曾走路我記》)(臼井勝美編,美篤書房,1966年)

《影佐禎昭 汪精衛政權之父》(人物群像・昭和的軍人們 第十四回)(雜誌《經濟往來》1980年5月號)

《遠藤三郎手書日記原文》(狹山博物館所藏)

《日中十五年戰爭和我》(遠藤三郎著,日中書林,1974年)

《將軍的遺言 遠藤三郎日記》(宮武剛著,每日新聞社,1986

年)

《蔣總統秘錄》1 ~ 14 (產經新聞社著, 產經新聞社出版局, 1975 年~ 1977 年)

《蘇俄在中國——蔣介石回顧錄》(蔣介石著, 每日新聞社外信部譯, 每日新聞社, 1957 年)

《是敵是友——蔣介石總統對日言論》(東亞問題史料叢書一, 東亞出版社, 1952 年)

《同生共死的實體——汪兆銘的悲劇(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金雄白著, 池田篤紀譯, 時事通訊社, 1960 年)

《周佛海日記》(周佛海著, 蔡德金編, 村田忠禧、楊晶、廖隆幹、劉傑譯, 美篤書房, 1992 年)

《延安日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 高橋正譯, 同步出版會, 1973 年)

《戰史叢書 北支的治安戰》〈1〉&〈2〉(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 朝雲新聞社, 1968 ~ 1971 年)

《動亂之眼——與亞洲·阿拉伯的指導者對話》(辻政信著, 每日新聞社, 1958 年)

《中國一直隱藏的毛澤東的真實》(北海閑人著, 廖建龍譯, 草思社, 2005 年)

《在革命的上海: 一個日本人中國共產黨員的記錄》(西里龍

夫著,日中出版,1977年)

《毛澤東思想萬歲》(上・下)(東京大學近代中國史研究會
譯,三一書房,1975年)

(僅為了確認把毛澤東所說的“進攻”翻譯成“侵略”的部
分)

《鴉片王一代 中國鴉片史的帝王・裡見甫的生涯》(千賀基
史著,光人社,2007年)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